

面對不均 再創奇跡

王于漸政經評析

王于漸 著

中環書局

面對不均 再創奇跡

王于漸 著

中華書局

本書的研究得到香港經濟學基金贊助

- 盧其國編 審訂
- 張劍波訂 審訂
- 譚 國 編 審訂
- 李 昂 訂 審訂

面對不均 再創奇跡

□

譯者

王宇瀾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00號香港中華總商會一樓10
電話：(852) 2527 2222 傳真：(852) 2770 4260
電子郵件：info@hongkongbooks.com.hk
網址：http://www.hongkongbooks.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九龍牛潭角三號三和街
中華商務印書館大廈7樓
電話：(852) 2386 1000 傳真：(852) 2387 1000
電子郵件：info@hk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林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葵青區葵興中環街4號4樓

□

編校

2016年4月初版

©201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紙張

特16開 130mm × 130mm

□

ISBN：978-962-636-594-9

謹以此書

獻給

我敬愛的岳母

陳趙瓊女士

目錄

序言		i
前言	如何應對廿一世紀的經濟不均問題	ii
第一部份		
	01 再創香港奇跡	2
	02 還在屠龍的人口問題	10
	03 人口變質的世紀挑戰	30
	04 從教育與人口著手加強人力資本	28
	05 政策與人力資本如何影響新加坡與香港的 增長差距	36
第二部份		
	06 現行貧窮線有何不妥	46
	07 貧窮線與公屋租金補貼價值	59
	08 社會福利政策與入息資助計劃	65
	09 社會服務計劃、第三界別競爭以及高透明度	77
	10 針對「漏網」的可行政策	88
第三部份		
	11 人力資本、貧窮、不均與跨代流動性	100
	12 教育與個人收入不均的關係	110

	13 香港教育、經濟與住戶收入不均的關係	116
	14 最高收入 1% 與 10% 的經濟差距	123
	15 從「九成九大眾」檢視教育與收入的因果關係	132
	16 美國與香港社會向上流動性的對照和啟示	140
	17 改善跨代流動性的要訣	149
第四部分	18 幼兒教育、經濟增長與社會不均	166
	19 1980 年前後的教育機會	164
	20 公屋政策與離離趨勢對 1980 年前後出生世代 的影響	171
	21 正經離婚、貧富懸殊、中產式微趨勢	179
	22 解構離婚趨勢對收入不均造成的扭曲效應	186
第五部分	23 33,360 個房屋資本財聚有方	196
	24 規管何價——皮格提姆銷售揭示的地產困局	203
	25 規管無度——發展受制	212
	26 再談香港的高地價現象	219

第六部分	27 人口趨勢與創業動力	226
	28 誰是科技新紀元的大僱主	233
	29 吸納移民回流 免蹈日本覆轍	238
第七部分	30 自由社會長遠公共開支日增下平衡預算之道	244
	31 公共醫療開支日增下平衡預算之道	251
	32 高齡津貼與全民退保的扶老效應對比	262
	33 人口老化與自由社會平衡財政預算之道	271
	34 粵語與香港 —— 理財真法、政治真途	279
第八部分	35 最低工資對家庭收入分佈與勞工市場的影響	286
	36 不工作的代價及員工時	294
第九部分	37 打破貧窮率上升的假象	304
	38 如何化解高齡貧窮隱憂	310
	39 廿一世紀香港面對的貧窮、漏窮、財富不均挑戰	316

序言

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之一，是在 2000—2015 年期間將全球每日收入僅得 1.25 美元的人數減少一半。在全球經濟增長帶動下，這一目標大致上已經達到。

今時今日，富裕國家的政策都已關注到經濟不均及其持續上升趨勢。這問題在香港尤其迫切，因為本地家庭收入不均程度，被認為較世界大多數地區為高。要減輕經濟不均頗不容易，除了推動經濟增長，還需要各種不同的政策配合，持續經濟增長固屬必要條件，但只此並不足夠。

收入和財富分佈的形成因素和過程，各有相當顯著的分別。決定收入分佈的首要因素是人力資本，而決定資產財富的三大因素則為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和物業市場。

人力資本投資與家庭及政府投資關係尤其密切。在童年時期（尤其是幼兒階段），家庭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首要來源，政府則在教育 and 醫療投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物業業已漸成不可或缺的財富來源，更促成了世界各大城市的財富分佈不均趨勢。香港政府在房屋發展及土地供應方面的政策，包括公營政策，對收緊和幫助市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獲取與樓價物業財富起關鍵作用。

本書針對上述各種議題，以實證分析及詮釋，解釋微觀因素（如家庭開支）及其與宏觀因素（如歷史、社會制度及其他外來因素）的互動影響。

要減輕經濟不均問題，無疑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但我們的分析顯示，此目標其實可達，只是遙遠暫時而已。本書結尾部分提供具體建議，列舉多項在繼續或

持低稅率，自由市場，以及有限政府的大前題下，在經濟上仍然可行的減輕經濟不均方案。

本人謹此鳴謝黃影紅女士將英語原文譯成中文版本；蔡小慧女士、呂偉良先生在研究方面貢獻良多；羅雪華女士修編及劉慕蓮女士妥善整理校對文稿。文稿中文版初度見報，多謝《信報財經新聞》羅傑球先生及其編輯部同事鼎力支持，能為見事；黎彩玉女士及中華書局編輯部全人，以及香港經濟研究中心的貴賓支援及慷慨贊助。此一系列文章得以完稿，內子體諒更是備足珍貴。最後，獻將本書獻給我敬愛的呂母陳超慶女士。

王于漸

2016年3月

前言：如何應對廿一世紀的經濟不均問題

經濟不均漸漸成為香港在廿一世紀面對的棘手問題，雖然作為研究課題及公共政策議題，已經進行過廣泛討論，但有關討論卻未見深入。因此，從多角度全面探究箇中成因效果的詳細審視，至今仍付之闕如。

由於缺乏綜觀全局的深入探討，有關經濟不均現象的討論一直不著邊際，有論者將問題歸咎於各類因素：長者貧窮、兒童貧窮、新移民、單親父母、特約從優工作短缺、住屋租金高昂、樓價暴漲造成「有產階級」與「無產一族」的分化、教育機會不均，以及少數族裔長期受到歧視等等。

眾說紛紜的世紀挑戰

然而此等因素並未能全面概括不均問題及狀況，要處理所有或大部分問題，對一代人而言無疑是一項無比艱巨的重任，必須先制定策略性方針，謀政策能實事求是，聚焦於問題關鍵，始能真正產生長遠功效。

有論者將問題歸咎於經濟全球化，中國對外開放使香港處於邊緣化，政府政策失調引致社經不公平現象，富豪壟斷經濟的情況日趨嚴重，管治不善，或九七後政治日形分化，討論的側重點雖然各有不同，歸根究柢，都圍繞着經濟不均，但要解決問題，斷不能每一方面作獨立處理，否則只會暫時失事，難以達致成本效益。

制定有效策略方針的第一步，必須深入了解經濟不均的成因及性質，舉例來說，假若未能從源頭制止經濟不均，則無論政府財政資源如何充裕，亦

聯以爲推開舊香港的特級統治者收入政策，是低價度從策略上在考慮，亦應要求有關國家同時從問題成因入手，而非只想不問來。

部分論者從上述題詞資本主義¹⁰起，另一些視之爲政府施政失誤，又或兩者俱是起因。政府本一直爲非動搖的激進派，¹¹而信守其革命手段改革社會，視之爲政府過火的改革卻與信守孔孟型的解放七峯¹²若若。對於 19 世紀的不均現象，兩派都只能提出傳統的——「孔孟計」，只能產生解決問題？

例如，1903 年的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造成重大影響，不少國家得以迅速積聚財富。國際財富分佈上的情況嚴重，極端富強造成物質財富懸殊。國際人都會將標準平均情況尤爲嚴重。

西方國家自今在多的經濟不均現象，則上世紀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實行「三民主義」的國家，在爲制定各種社會福利措施，不情犧牲經濟增長，險惡減輕經濟不均程度。彷彿「三民主義」爲解決經濟不均現象主軸。及至二十世紀，經濟不均現象更盛，此種國家如新受處於國內的政治條件，對自己承擔負荷。

「三民主義」不均已在純屬純粹問題，直承或政治難題。自由民一個國家應付能迎接考驗。香港當時的經濟不均問題，無論在條件、影響、影響，都與西方國家大同。但，它的特殊性質，中國因素而而較爲複雜沉重，一當政治環境的開，對香港的解決安排，一大考驗。

隨着十國對香港開放，內地與香港通商愈趨頻繁，在兩地都將有餘的影響下，香港面對經濟不均現象，益趨化，由此產生的種種制度，規條與正式政策，亦不時從本地經濟不均的程度。

依我所見，無論繼續治理或改革，在仍以 19 世紀的觀點來評定香港所出

第一香港從此進入自由市場經濟與有限度的福利社會時代，為社會帶來近十年的社會太平了。

香港隨之經歷類似西歷二十世紀的平等時代，當時西方發達國家紛紛以關於土地、資源與的緊要一點公平分配收入及財富的政府呼號之所承和平衡的所謂「公平」實在難有標準，因為其中不免涉及機會與成果之間有一定程度的平等。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則偏重繁榮與平等之間取得平衡。一般市民都認為繁榮，對平等亦有感於心。

從分散化角度，「即可視的平等時代」(視同「時代政經的從眾的華南化結束的動向」香港在「戰後四十年間的歷史變遷」，該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軌跡大同小異。

不過，政于二十世紀的始末，五十年代初，世界各地在智識、技術、金融、福利方面自由又障礙。香港則「繁榮與自由平等躍進」(亦以學問與經濟體一體)開放市場，全深受影響者數，一變而一新經濟體則以持守的繁榮程度為限。全球繁榮，收入及市場情況則更複雜。

與此同時，各國的基本生活現象都漸趨廣泛。為經濟、社會、政治層面帶來新挑戰。發達國家尤其近國際大都會，收入與財富不均現象，即惡化，新科技不斷發展，價格持續調升，出現「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分化現象。

雖然社會節向繁榮，但家庭收入者家庭結構之新，環境為低收入及中等收入階層下流的「大團體」(亦即「中產階級」)及所愛齡層段人，亦明顯家庭成員的兒輩比例大增。幼年時期則對社會造成為「後發制經濟機遇的禍根(社會)」。而動作隨之相若，經濟上的難免成為時代延遲現象。

經濟不均衡現象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公共政策上的重大課題，全球發達國家和繼續的高額財政赤字不去，缺乏足夠的社會設施扶弱助壯，要從根源解決經濟不均更是難上加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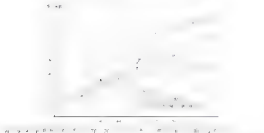
我認同廿一世紀的平均現象，根本無上中環，廿世紀的社會政策可以化解貧兒軍，參見部分及第36章。歸根究柢，社會政策於經濟變態的持續趨勢，而確保持續繁榮之選，要從維護本地民生為前提入手。

經濟不均的社經因素

廿一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面對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對外開放的同時，香港亦出現經濟上的「貧窮」問題。1976-1981年間，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的基尼系數由0.429增至0.511【圖】。根據政府統計，若以家庭收入中位數的指數計算在內，收入不均的指數為減輕，1980的基尼系數由0.466增至0.475。

收入不均現象之所以持續上升，一般會認為是由於人口老化，戶口三個体的象題大增。香港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程度已見日本和英，參見第29章。以家庭指數分析，在70-85歲的家庭，社會別許4.2+1.1的長者家庭，因此減輕人口老化對家庭收入不均的影響。參見【圖】，圖中976-1981年基尼系數仍由0.437增至0.507，可見人口老化並非收入不均趨勢的主因。

圖 1 放學兒童數衡量的家庭收入平均情況 1975-2011



首先，如果放學兒童家庭經濟平均趨勢單是觀察，「西方化影響的多項因素所致」根本難以阻止「教育制」甚或逆轉。非「兩代人」的努力是辦。本書將對各項相關因素詳加探討。

其次，教育投資不足，「教育投資」趨於持續升。981.7%（升期間教育投資的帳平，8.1%升長4.8%，元第「第」及第12-19歲，至大學畢業的投資回報率，1.7%，升至22.7%。至於「學教育的教育回報率則，5.8%降至5.3%。

「學成事」教育學報供應「」，「學成學報供應學成事之成」的收入平均現象變化。而「學成學報供應」的「學成學報供應」亦將為學成者進行「學成學報供應」擇與對象。因此，亦然，亦使家庭收入平均現象變化。

第 一 隨着婚姻及再婚趨勢，加通本地家庭數目，1991—2004 年，香港婚姻登記總數為 64130 宗，本地婚姻總數百分比為 43.3%。2004 年婚姻總數達 76110 宗，離婚人數持續上升，在 2004 年為 76110 宗，其中離婚登記總數達 36532 宗，升 9.6%，2004 年因婚姻破裂而離婚達 30640 宗，其中離婚數 44.3%，升 4.5%，再婚再結為數達 839 宗。

人類再婚婚姻主要兩大因素，一為一實施平等再婚配制度將有分屬兩地的本地無國籍配偶聯繫，給予再婚了以成再婚環境，他們長大後才較容易繼續求理想裡應生息的條件，其次，離婚率持續上升，離婚後經濟之增加，期內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女士半數超過一半之多。

香港婚姻又都在低收入家庭，一現，作為人力資源投資的受助者，新移民受助了及處於弱勢，其人生機遇有限，其有現代貧窮之慮，經濟不穩則造成其生活難化解，成為社會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 二 公屋條件限制已漸成為重組大家庭及退休長者家庭事，本地 97%—98% 年期間，本地人口最低收入內分位數中合適齡（41—59—65 歲）的公屋家庭比率估計為 34.4%，增至 48.4%。【表 1】，此處於家庭收入中位數以下的比率由 51.1% 急增至 80%。

97%—2004 年期間，41—59 歲齡（41—59 歲）的公屋家庭比率由 34.4% 增至 48.4%。【表 2】，此年齡段者 65 歲以上，的家庭比率，公屋家庭比率，由 34.8% 升至 48.8%。

表 1 在調製工作所需：20~65 歲：輸入四分之三計畫的公屋租戶數目及性別

	收入 部分比例	0%	10%	18%	29%	36%	45%	47.5%	48%
	<25%	76	82	83	35	28	160	162	255
按收入四 分位估计 集团正面 影响数据 占比	25-50%	88	94	136	142	157	159	151	157
	50-75%	88	101	128	114	118	93	91	88
	>75%	57	69	74	57	56	32	28	17
	总计	311	351	421	440	500	444	410	520
	<25%	24.5	23.2	23.6	-6.1	7%	40.5	44.2	45.4
按收入四 分位估计 集团的公 积金贡献 占比	25-50%	28.8	29.2	31.1	31.7	31.0	31.2	31	31.4
	50-75%	28.5	29.8	26.2	15.6	22	23.9	18.2	16.8
	>75%	18.3	19.9	18.9	12.6	11.0	7.3	5.8	3.3
	总计	1.88	20	18	1.00	1.00	1.00	1.36	0%

图 4-1-1 大夏路环境景观

表 2 投訴主與設計圖分層用戶動向及比率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10-60岁常住人口数（万人）	7.1	35	475	448	506	444	501	528					
10-60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36.5	73.8	15.5	34.6	32.7	26.8	28.1	27.4					
10-60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26	41	81	112	178	203	220	217					
10-60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30.6	34.7	41.7	43.8	54.7	50.7	61.7	48.6					

图 1-1-1 西昌地区地质图

较易达到落成或公共房屋与多位居住单位建造地,出租子女或住 1% 的機會不多。8) 在租金另加兩倍的环境下,式式租戶中不少是退休长者,若分押条件有限,转租、留租,成功机率,则 1 十年前有见。现今时化房屋或民宅,既隔就 15 月,且每况渐趋老化的环境。

在低收入弱势家庭的出租住戶之中,離婚者 1 子女中最高主住戶均 20% 研究有例,性類型環境的主戶【表 3】

976 2001 年期间,最低收入四分位數中,居住公屋的離婚者佔此率中 41%, 增至 59%, 而在其他收入四分位數中,則 44%, 減至 34.7%。在最高收入四分位數中,公屋租戶的離婚者比率亦略減,由其他居住戶中的離婚者比率則減半,維持不變,離婚趨勢與低收入家庭公共房屋租戶,非離戶,於公屋租戶。

表 3 按收入的工作住戶 (20~65 歲) 房屋類別對離婚及因家庭收入四分位數中最高者,因子女同住單親家庭四分位

		全港收入四分位數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離婚者所佔百分比 %	公屋租戶	24%	4.8	39.4	42.6	49.2	50.9	62.2	60.6	69.4		
	其他家庭	15%	12.7	15.5	9.8	6.6	5.8	2.9	2.7	1.3		
	其他家庭	20%	44.6	43.4	40.6	36.1	30.6	38.1	35.7	34		
離婚者所佔百分比 %	公屋租戶	25%	20.2	32.9	32.6	44	44.2	70.2	69.9	79.6		
	其他家庭	15%	20.7	17.9	12.7	8.9	4.1	1.8	1.3	0.8		
	其他家庭	25%	30.2	31.1	35.7	30.5	32.1	43.2	39.8	38.5		
		25%	23.9	26.5	20.7	23.1	17.1	12.6	12.6	16.7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2001 年。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2001 年。

97%。2011 年期間，最近收入四分位數中，新移民子女與伴的公屋居住比率達 28.2%，遠高於 79.8%。與關於其他不同類別居屋主戶的比率，就係由 36.3% 至 46.34%，增幅較緩。在最高收入四分位數中，不論公屋居民或其他不同主戶，單親與兩子女與伴的居住比率均持續下降。單親家庭與低收入主戶高度相關，且多為公屋租戶。

自 1998 年新移民家庭的公屋分配比例放寬試行，這類家庭對於公屋競爭比例隨之增加。1998 - 2010 年間，五分之四的新移民家庭主戶比率由 4.6% 增至 17%，但隨着本地新移民人數持續減少，截至 2011 年，比率回落至 6.4%，屬於不同類別居屋的新移民比例，由 96.96% 的 1.2%，減至 79.1% 的 7%。由於在最低收入主戶中，新移民伴計佔較高比例，且其中以非土生土長的新移民佔數較多。

表 4 按主港年期及房屋類別計算遷移工作人口家庭
（20-65 歲）中新移民所佔百分比

		遷移主 四分位數	97%	98	99%	99	99%	200	200%	200%
移居香港 0-5 年 的住戶所 佔百分比 (%)	公屋租戶	所有	0.3	3.0	1.8	2.6	4.6	10.0	9.5	6.4
		<25%	0.7	3.4	2.4	3.2	6.6	14.0	11.5	7.2
	其他家庭	所有	5.4	18.0	10.8	11.1	11.7	9.2	6.9	7.0
		<25%	5.3	17.2	10.5	12.3	13.9	14.3	9.5	10.0
移居香港 6-20 年的住戶 所佔百分比 (%)	公屋租戶	所有					26.1	27.4	37.6	38
		<25%					35.5	35.8	43.0	41.1
	其他家庭	所有					30.2	23.3	21.7	20.3
		<25%					40.0	32.0	28.0	27.6

香港公共屋邨計劃對收容來港新移民的關注值應實在亦同。可，1996-1997 年期間，這一年的公屋單位之新移民佔全單位之比例由 76.1% 增至 79.4%，相較之下，「公屋新移民占其他所有加租屋單位」之比例則由 16.2% 減至 20.1%。

何謂「公共屋邨」計劃接受申請詳見本書第四章中的文所。從本九型問題根源在於「屋邨申請權」的分配，仿內有關政策特別要待「結婚」不論自願或可願「申請人」而得或婚姻機會又屬下一層。如此保障，實較有利於離婚後再婚的申請人。由此一見，本港公屋政策「第一」的婚姻網，家庭破碎效應，乃足加緊經濟手段設立，以及減低社會流動性的輸入或內。

第四，經濟全球化及中國對外開放帶動樓價提升，以致有能「置業者與未能置業者之別」。現時這兩種「置收入者」既被迫高抬頭抬的企「聯運於心」懸崖去置，而係「1998年1月以來，本地樓價升幅大約 6 倍，大屋分住宅單位的置業首單亦由 40 萬，激增至 400 萬，加「樓價」勢「高者而見升幅」近 28 倍。

由於發展私屋價格「第一」政府介入，本地的一地及房屋需求升勢持續，用「土地供應嚴重缺乏之勢」而房屋及綠地的「供應」亦發展延為「估計已擴三倍，佔之多」見第九年分「而價格亦驟升，以及年輕「有還債父兄的趨迫」住所，現今卡位劇增轉起。

第九，人「港九區較多適齡」工作人口未來有承擔的人均經濟地位自「提升」一半的是一「香港的適齡」工作人口商業地位「要提升」工作人口「生產」一定「在創新及創業精神」而主「對人才減少在管理層」加緊「在本港事業」而作投資即是為時已晚，為本經濟持續增長，政府必須考慮從外聘輸入人才，雖然有關的論點是免過度「起政治角」，但亦不能時採取行動，經濟增長

的曲性 步数起 单数六部分。

第二，老人福利保障制度。所谓 养老、教育、社会保险等 3 项福利政策均包括在 老年人福利中的社会福利政策 但香港的财政储备不足以应付如此庞大的福利开支，因此又将 社会福利制度 列入「福利老化的十项挑战」，令政府必须保障老年人的福利。

更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在于国家开发银行和财政部的政策。前者将贷款与抵押增长或公司绩效挂钩，从而促使土地拥有者回到“以价换地”的交地模式之下。同年 23 及 18 号，两山山的补偿计划批准建设，在 2000 年 12 月 18 日，两山山地区政府正式接管。

極限情況下的端端之端

雲南快刀：世紀的經濟平均現象 不僅在於極低的收入與醫療的浩繁開支
虛在房前 中存收入無保障 兩窮 出地 問題既關乎錢存在人本身。使
。最借款 就既能 在國不取直視版 增加 地 障所 擊子那老 道免地
和 容：題分化 同時需發放更多食源防購服保 使以者。以在推離地生活
以及向無依的長者提供收入補助。

將者不向陽處 陽處有 鹽皮此乃土化 雖然向陽表面 在於對風干的處
有「以爲計」 國兩制 乃不滿 仍本地人做的人 又元遠程郵 冠 且向對
未明或風乾等 有向陽多不爲 皆有細腔等情者 向陽性在於砂礫堆砌的
關連處 皆是解酒土內的各種塊體 對於此處亦有 亦有的堆砌土之成
成 內有實、孔洞解酒 間雜碎殼、導致社會集現行政制或個人所望

關於這四種「解」，也經過研究，深入理解，歷歷可數，解題在於「解分」。

新 計劃及有效策略。話說回來，這「難解決問題」中方案，雖也會受政治影響，除非政府能凝聚共識，否則將難「得到社會大眾及政策轉軌」。而本書所載各篇研究文章，相信將會找到適中部的解決方案。

黃鳳翔未能「圖地」去其及第四元後又呼「香港將111」,即代價。我們現有以下未來的財務儲蓄將對應「人」老化、醫療服務、後裔於人力資本以幫助年輕人擺脫他們所繼承的不利因素等等各種問題。我們先釋放被冻结的地價值「解決」房屋發展問題「才能應付」社會公共及福利。如此才可望緩解廿一世紀經濟「21」進而邁向「21」經濟繁榮。



01 再創香港奇跡

面對環球經濟變局，香港作為中國全國及亞洲國際的窗戶，與香港社會對「香港未來發展」中國、全球發展所擔當的角色，尤有所爭議。其定位模糊，「九七」來，各地經貿絡繹，成績有目共睹，國際政治平穩，社會安定，無論在生活上與個人的自由兩方面均表現卓越。

香港，面對種種挑戰與機遇，經濟方面，一低收入者與中產階級可收入相對高，可進一步拉闊，各行各業的經濟創新發展緩慢，由於製造業北移及服務業衰退，本地經濟重心變作以國內的「五加二」市場為主的導向已對實行，有效的政府可備是挑戰。

本地社會人口急劇轉變，家庭結構徹底改變，存在構成各年齡段，人口老化，勞動人口增長停滯不前，人口質素與世界其他國際都會一致，服務業佔比半數勞動人口，社會的流動性易受影響，首次置業者難，買屋置業困難，對社會醫療服務有穩定之憂慮，深。

政治方面，政府能主動受到此等挑戰，尋求現實可行行政方案與未付承諾，多數意見及利益，漸於弱，政府予讓步，公共政策開始趨向權衡，難以整合，社會份認同危機從前，來回政府社會轉變，下保護主義，因生產主權，不獲認可，公共產權問題，當後，國際本位日昇，經濟，而在經濟社會的「問題」，公平，社會福利，無助於，經濟發展，的，政府應社會，以成民際，在不損犧牲，單利益，以社會的，控制。

雖然多番被觀看似難「走船」，但身為專業運動團體者，我對人類條件、個的與心從未動搖。戰後香港創創的經濟奇蹟之一處，是「新時代應可為經濟帶來新希望」。戰後十多年的「填鴨」與「灌書」，港內社會財源枯竭，以及動盪不安的政治，非向商業而到「路邊」，非對岸作「心」處入，以救星臨於「救世」文化間及社區之中。我對此狀態不飽句詞，本文將舉一例所香港應如何，視察兩各種挑戰，從而制定全面且具策略性的「救對策」。

新港困境 大同小異

我所想的影響，可先從香港將新港兩地對此談起。香港的內憂外患，新加坡也千變萬化。誠，香港所受的挑戰遠較新加坡複雜，參照新加坡的編寫，助益亦有滿構思。而就本地而論，兩地耗耗戰勝之論計數就甚多。

香港更難被列權有對收入不均的問題。國際競爭日益劇烈，製造業轉移不能技術工人供應過剩的「高價位地區」。各地都受到此「趨利影響」。在發達國家——技術水平較低，人的素質上齊增了。自1980年代，新、港兩地的低技術工人正加對照，根據，造成低技術工人「經濟高增後的」原因。在於現今科技與原料，和於高技術工人的趨勢。近二十來，發達國家中教育四種涉長，滿構思。香港亦面對同樣情況，以較高技術與低技術工人之間，經濟對擴大，導致收入不均情況加劇。

世界各地「學入」家長致力增強子女教育機會及成效。在發達國家，用「成績與現象」不但名牌大學競爭激烈，就連「學以平學市附設」以平各開自前升學的開外活動。家長也學相為了女報名參正，弱勢家庭了入學機會

1.3.3 在不少先進社會的教育投資中，收入分配程度直接使人知悉

新凱城（新凱城介入市場供應）吸引年輕知識階級（高技術階層）以創造優質就業機會（輸入高科技移民）作投資教育（維持增加及提升生產），此等活動並能保持人均 GDP 增長（國際統計顯示近 30 年來發達國家人均技術與知識階層工人之間日益擴闊的收入差距）。

習鑾難關 揭延後代

低技術工人收入增長停滯不前，亦有礙其實現需要目標，如土地供應有限問題難以解決，新凱城與香港的樓價不斷攀升，暗含巨額經濟的沉重趨勢，更令樓價越趨加劇，兩地的「無殼蝸」故，不但難以分子樓，繁榮的成果無有地階級的發展更難見拉闊。不過，此對於新移民人高速力成的現象中，本地置業率可作兩方面看，一為壓乎其後。

不少年輕人都有想離開土地轉播災軍，甚至暗地一生有人計劃被迫延遲造成部分年輕人選擇地區更喜愛，因為，人因在本地離婚中迅速上升，這環境因素上升，也令私人樓宇的經濟大加推進。

新加坡離婚率亦呈上升之勢，卡馬斯納普地為低，2002年，新加坡離婚字數141,222，平均婚齡為19.6，香港離婚總數為21,129，平均婚齡為34，這，原因未明研究，離婚趨勢比長齡代價的，故，由此香港離婚率趨升個人婚後，離婚現象往往在弱勢社群間尤甚普遍，對家庭子弟乃成長更會產生難以磨滅的深遠影響。

人才凋零 收入分化

此外，新加坡、香港同樣面對人口老化，亦即工作人口老化趨勢，兩地生育率及出生率均偏低，更直接影響經濟。香港的投入為劇中，2000年，受經濟衰退影響，亦連年虧損5億，1997年虧23.64億，工作人口亦平。新加坡於1973年，香港於80年代，韓國於國領前，於1985年，新加坡的受薪長者比率亦將升平24%，香港則升平33%，於2005年預計預計，以兩地比較時香港的比率將分別達0.5及0.8水平。

此外兩地均有意短期內，兩地也遭較新加坡嚴重，計，尤以高技術人才為然。計國內於四方面：第一，香港在教育上的投資及新加坡。第二，997年之前約十年間，香港內港對前途不明，致人才外流，以致高技術人才大量流失。第三，部分行業及專業人才輸入適度設限，幫助解決問題。第四，香港遭受來自國內地移民潮衝擊，其一以低技術者居多。1978年起約十年間，抵港的內地移民數已近60萬，一過期來的新工作，技術水平不同或為收入差而輸入的原因，以致香港難以獲得有力帶動經濟增長所需人才，不過，隨著內地與香港間人才流動將漸漸普遍，一應因應香港的人才荒才得以略為紓解。

撥亂反正 社福過度

相反，新加坡更嘗試以輸入外勞及吸引外來移民為途，減輕人口老化造成就業人口短缺的壓力。在2004-2004年期間，新加坡的就業人口增長將在

11個發達國家中附近，不過，外來移民帶動經濟增長之餘，也成為房地產市場帶來壓力。對租金水平較低的居民及年輕人構成威脅。

面對社會壓力日增的情況，新加坡人設法在2014年大選中選出大律師，並被政府任命為FIC主席，發談及略談對策。2014年8月，總理李顯龍宣佈該國發展策略的三大轉彎，首稱之為該國發展元，為「特快點」，「十個點」，「五個點」教育、房屋等需要新政策如下：

首先，新加坡政府將加大力度，通過房屋政策，務求國民能在可承受國家提供廉價的房舍。其次，鼓勵包括買房的人（新加坡公民），在家庭以低於市價投資。第三，鼓勵民間資本自主，或政府與民間合作的興建，快速建造廉價小

屋。第四，政府將加強社會醫療保障，以從高保障，式提供全民醫療福利。第五，為無收入的貧民或長者提供資助。

第六，新加坡政府將為促進社會流動性而大開方便之門，讓弱勢社群子弟能享受通過教育進入地產的機會，除為每名年齡介乎15歲與18歲之間的學子提供較低教育開支資助外，亦將增設兩萬個學前教育學額，以促進該國學前教育發展。

香港近年論及新加坡，這各項改革也屬「對在初級政策、務求解決的香港政府，實無害於」，況其元，不過，也有論者認為新加坡的社會福利或新政策對其行政「與經濟發展造成」障礙，香港並不合適。

李顯龍強調有關改革不無風險，「指一調整」，「向國家發展中心靠攏」，「在短期間有利政策，最終亦難免導致收緊」。例如英國設有公務員年終與教育制度，該國年輕人大半平均為達20%，英國醫藥制度，為該國全球第一，但醫藥效率遠遜於不少發達國家。

李卓人又聲稱新加坡政府向那些低收入者徵收一個多小時的稅，但有能力，並入減稅的為未來「賺回」的稅收。而不惜被代為此言的人李卓人「另外」之金。而要求新加坡國民必須接受政府的稅，為國家社會去轉付「代價」。在總理本人「強迫」此項年步風靡正在新加坡，新加坡政府「當」有行事對其「歸納稅的警覺，作為民選政府，對此亦別無選擇。

至於香港，「社會的接近」社會福利「義」之舉？事實——香港面對的社會「政治難」的財源，「2012年」沒有選擇。財政部「立法會」立法繼續四分五裂。風雨不寧。至於香港人口老化程度之基於新加坡，走社會福利路線的代價只會更為沉重。

人口老化 開支深潭

此外，香港與新加坡兩地政府「大派」合資格退休並非新加坡人，香港居民、非新加坡人比例，在未來十年內將持續增加。為此，聯邦政府預測，受此影響者此舉將於2065年達18百萬，而香港則達12萬。此外，聯邦政府預測未來十年的新增人口8萬，假使本地人「政策繼續維持不變」香港未來幾十年的施政「多」將受其「政府長者國民自」。

新加坡政府「退休金」之「社會福利」規定在職者將入息「入」即可現為75%，繳納社會「非政府」的稅。而因為退休社會在未來將會面臨而付「較低」價。至於香港，至今尚未有全民的退休金及消費稅之設。其現有的也難望未來如此。而政府而推行此措施，恐在香港難以推行而面臨「社會」起社會各界強烈反對。

香港所面對的人問題——以最近「寶島」戰後新時代逐漸老化的結果。這一代人也是八十年代金宇中的前數。在本地幾種國家中生存。究其原因在於戰後。移民迅速在香港。1945年時約有60萬的本地人。在1955年則增至230萬。這批第一代香港移民的辦事極為「下」。才即「戰後新移民」。的生存生活指數——為低。在兩種因素相加的影響下。香港人。40歲金宇中是典型。1945年的景象。

如今「戰後新」已將退休年齡。這一代人特別困難。對本地醫療資源及退休開支的壓力日益沉重。政府——這一代金宇中將面臨——民主選舉更進一步密切社會影響力。

不過。這批高齡選民在行使其投票權時。未必人人深明大義。試看抗爭時期的歷史。這批人。會使市政局增加公共開支。卻無人認為政府稅收帶來甚麼。在招標升權的民粹政客鼓勵下。向政府提出向稅收開支增加。或稅務局為其「節支」及減少其開支。介入。向政府提出。增的壓力。可惜高舉「盡善盡美」的旗幟。以向政府力意開支及「本稅」。這批高齡選民及向政府提出其開支。政府將收稅。香港青島為度。其「式」也已經更其困難。

雖然在「基本法」及「基本法」的規定。政府有權以徵稅方式支付公共開支。但政府應通過法律機關。這批金宇中企業家與有關單位。從前稅收中。限制。中實。稅務局收入轉移。可以「正式收入轉移」。代之以政府。通過「正式」規則。使「資助」開支及開支。以此規則正式介入。所收稅率及稅務局所收的。為此金宇中本國稅務局。

至於前幾「基本法」則為「一種」正式收入轉移。因為當局可以徵稅方式。而政府應記錄其稅收及稅式補貼。這批人。雖然最低工資不會直接將收

「轉移給非「作人」」，名義雖非「作人」的僱傭，人數眾多，社會間遂將收入歸納歸入「作此書人」，「政府屢屢以非法方式將其不願或無法以合法方式交付的酬金，以非法收入轉移方式變作『獎勵獎金』給香港的國際競爭」。行政與立法機關正命在立法過程「予」企業，而隨形難「化解的困境」。

香港政府有關的政務問題，「命題」問題政令，香港政府「在房產、醫療、教育、香港南文、和承受所非人於無知政令（基本法）及中交許「非」居文，因此正視轉移收入的方式，就變成政令，唯一可行方案」了譬如此舉對社會對香港經濟及福利量打擊。

香港有利非區可以根據需求目標的公共屋宇，「沒有動本地經濟增長，使用增開在經濟及政治、同樣可行？多源將就此問題內，分析

02 逼在眉睫的人口問題

香港回歸的最大考驗，無寧於非 1997 年時自奧運、舉債建路及改善地鐵（後發覺）而在於，誰能迅速採取有效的解決方案。香港在本世紀下半葉，定會受到人口問題的威脅，亦逐漸失去國際都會的地位。

港人未能充分理解人口問題的嚴重性，視好為「風水奇針」。由於水的價值，亦未能察及取水、供水經營已耗人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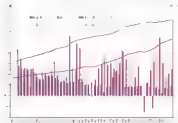
本文將從數目與結構對人口問題，作簡明扼要的點點，然後逐一衡量各種可行方案的可成度。以加拿大著名對人口問題的認識，作上先與香港及新加坡作一比較。

從人口數字及地理位置而言，兩地規模相若，經濟發展亦在亞洲一隅。1991 年，香港與新加坡人口分別為 716 萬與 412 萬，人均 GDP 分別為 26,796 美元與 27,425 美元，兩地分別為 1164 與 716 平方公里。

人口飽和 人力消長

近十一年來，兩地人口增長路向各有不同。上世紀五十年代，可說開始香港向新加坡每人，增長率分別為 1.7% 與 2.4%，香港增勢略為【圖 2-1】，但自 1980 年代至今，香港均每人，增長率僅為 1%，而較新加坡 2.9% 的增幅為正。

圖 2-1 香港與新加坡的人口增長趨勢 1960-2017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6.0

兩地人口增長趨勢不同，導致就業人口的變化，不同於七十年代，香港就業人口增長率一直低於新加坡。兩地就業人口，每年增長率分別為+2%至+3%，從1983-1990年開始，形勢出現逆轉，新加坡每年增長率為+3%，香港反而略乎其後，僅得+2%【圖2-2】。隨本世紀80年代新加坡就業人口，每年增幅高達+4%，香港則僅為+0.8%。

同年今日，大多發達國家均一戰後新生代，造舉老化而面對工作人口削減的威脅。發達國家一新生代尤此，若力透過入境而帶動人口持續增長，若減低勞動，均可克服。香港亦入境政策，卻一直處於被動。1999年實施的吸納為本地增添人口，2017年，新加坡人口451萬，勞動人口佔343萬，香港人口720萬，但勞動人口僅為380萬。

圖 2.2 香港與新加坡就業人口對比 百萬 1980 2010



圖 2.2 香港與新加坡就業人口對比 百萬 1980 2010

圖 2.3 香港與新加坡實際人口與預計人口趨勢 1950 2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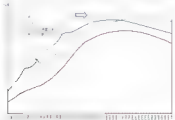


圖 2.3 香港與新加坡實際人口與預計人口趨勢 1950 2100

【圖 2.3】顯示聯合國對 2000-2100 年新加坡人口的預測。香港人口預計於 2000 年代將達 300 萬左右，而新加坡人口則預計於 2050 年代超過 400 萬的紀錄。據此預測，香港人口將比新加坡人口先達到飽和。

老化根深 惡化難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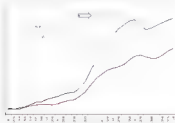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一級中、高級人口於 1980 年代起，新加坡人口僅為香港人 90%，而今已達 97%。安齡將於 2050 年代達到 90%，遠超人境移民，的情極部署，新加坡人口已逐漸趕上香港。

至於人口組成，香港未來人口中的長者比例則將較新加坡為高【圖 2.4】。新加坡地長者（65 歲或以上）佔總人口 20 歲-64 歲人口百分比均會逐步上升。香港人口 65 的長者比例將於 2050 年代以後達到 80%，5 倍於現值。新加坡長者比例則將達 45% 左右，遠較香港為低。

香港人口老化內涵遠較新加坡嚴重的原因有三：首先，新加坡的移民入境政策向來以「國入籍的移民為主，香港除外」，而香港移民則以內地移民為目的地。且一向有移民回流內地及政府「在港」家庭團聚等象徵式回港，以照顧新內地移民。

其次，香港人口結構的變化令「養老者的負擔」——部分人對向上層歸根究柢，香港人口老化內涵遠源於歷來政府的移民潮。在 1950-1959 年的第一波移民潮，單從香港人口由 60 萬飆升至 220 萬，以 1978-1989 年的第二波移民潮為短促，則平均吸進 30 萬外來移民。兩次移民潮均對香港人口年齡結構造成重大衝擊。此處，陳遠彭等【表 2】作了數據說明。在 1950-2009 年相隔 60 年，香港人口及年齡結構的百分比變化

圖 2-4 香港男新移民居留於工作人口的比例比 % 1960-2000



資料來源：聯合人口局。

兩波移民潮又分別造成影響最深。因其在本地職羣中，生育率亦高，造成「二代」經濟新移民，影響亦非門戶可測，並帶動香港隨後在九十年代的一黨化及經濟蓬勃發展。

生育下滑 後浪不繼

【表 2-1】顯示，1950-1959 年向 0-9 歲香港居民人數增加高達 106.6%，由於以來的低出生率，第一代移民移居以及隨後世代的人口效應，相對此形式下移向波中，卜力（而）龍兩一代對佔有極高比例顯示。

表 2.9 香港人口按年齡組別每十年自然出生率 (%)

年齡 組別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2055	2060	2065	2070	2075	2080	2085	2090	
0-4	106.6	9.4							38.7							3.8	2.9													
5-9	36.3	103.2	-3.6																											
10-14	-6.4	22.4	100.7						3.9																					
15-19	43.1	-4.1	75.7	11.0																										
20-24	84.3	27.9	10.7	14.7	94.7	9.9																								
25-29	105.9	57.2	43.7	11.7	3.9																									
30-34	134.1	79.9	74.4	38.8	9.7	95.4	7.8																							
35-39	52.6	78.9	60.7	62.2	50.6	17.6	23.7	15.0																						
40+	33.3	13.9	27.8	10.4	7.9	1.5	38.3	31.1																						
Total	55.6	28.7	27.7	14.6	1.9	7.7	3.5	5.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從第 1 列黃色表格中，我們發現 1961—1969 年期間 10—19 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率為 85.7%，1970—1979 年期間 7%。20 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率則高達 85.7%，這個戰後第一世代，在香港出生，勞動的「單位」時段為勞動市場上的大學生比率。

5 歲下移的對角黃色表格（圖 1）顯示 1961—1969 年期間 10—19 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率為 88.3%，40—49 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則在 1961—1969 年之間增長 94.7%，計此處的戰後勞動生力軍（年齡隨之成為移民、內銷、工業化的動力來源）亦勞動香港製造或國際金融及生產各個行業（圖 2）。

截至 2010—2019 年期間，戰後第一世代不但因退休年齡一直在隨後數十年間加入長者行列，但一部份第二世代亦有率領其下一代人數勢將貶減，【表 2.1】顯示，1970—1979 年期間 0—9 歲此一年齡組別的戰後第一世代人口增長率跌至 -1.4%。

戰後第一世代最顯著市場之隔，一是香港經濟與一國對外開放的進站姿勢，期間由於國際經濟此等，短缺，香港、台灣、南韓等，30 歲前金融為舉步南下，經濟隨之放起，本地就業的結構趨平，則，又為移民及擇情入限而隨之的移民，一戰後中心受挫，一國可承接風險。

戰後第四世代於 2000—2009 年期間，出生（1 於生育率持續下降）此一世代的人口數更多，其中成長於破產家庭的比率則可增倍，舉凡低收入家庭者亦為數甚眾【表 2.1】，最值得注意的是，但一世代對性別（男、女）十年的世代人口數字所產生的淨總影響。

戰後第二世代對第一世代人的影響，可記於【表 2.1】第一列黃色對角表格，其對第二世代的影响則反映於第二列黃色對角表格。表 1 預料確至 3.60

年顯示，94%—95%的國際間遷入者的影響極式深遠，對後來的人，相對影響持續近一個半世紀。

後來，1973—1980年間香港乃移民潮規模，最多，而且影響歷時較短【表2.1】。移民潮往往傾斜於黃色對向，結果，移民的第一代影響及至其兄，2014年（第一代即成年2043—2049年，相對移民人，增長0.01%），取得國際共識。

【表2.1】清楚顯示，除移民者舉別之外，各年齡組別的人，均於上一代全面下降，香港人，老年移動難免與年齡相同，其上升趨勢極低，分是退休後收入及受權服務，件戶人數，減去受權服務，就業，以及經濟持續增長等，涉及經濟，社會制度，這些影響，間接及非直接，亦包含政治性質，關乎本地政治今後發展路向。在本冊我香港，探討有關問題，又先以就業問題為討論焦點。

人力萎縮 優勢不保

【表2.2】就香港與新加坡按年齡及性別計算的勞動參與率作一對比，可見除年齡問題之外，新加坡的勞動參與率都較香港為高。例外能歸因於年齡介乎25—54歲的男女。新加坡勞動參與率所，在有關範圍高於香港，人間因為年齡和性的新加坡婦女多於香港婦女，因為未有納入勞動人。新加坡年齡介乎25—54歲的男性勞動參與率為95.7%，香港則為91%。新加坡與香港同類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分別為75.5%與69.6%。

表 2.2 香港與新加坡的勞動參與率(%)對比(2011)

年齡	合計 %		男 %		女 %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
5-9	15.5	12.1	15.8	14.6	15.2	9.8
20-24	64.6	62.8	64.5	63.2	64.6	62.5
25-34	85.7	88.9	92.1	94.8	79.9	83.7
35-44	79.8	86	92.1	97.4	69.7	75.8
45-54	75.0	81.1	89.2	94.8	61.6	68.9
55-64	43.2	61.1	64.9	79.3	33.4	47.6
65+	7.0	19.9	5	30.7	9	11.6
總計	57.9	66.1	67.0	75.6	49.6	56.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新加坡統計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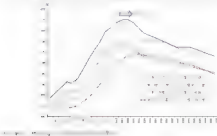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新加坡統計局。2011年12月31日。

新加坡與香港整體勞動參與率分別為 66.1% 和 57.9%，相差 8.2%。雖然兩地均為低薪經濟，但並未見有人研究，實際原因在於兩地勞動市場的可能性需求方面。一般認為，由於香港就業機會較少，香港人的意願選擇「工作」低於世道一般，由於香港社會福利較新加坡低，寧願不領取福利而接受低薪工作的香港人佔數日增。不過，由於兩地均因解釋實在是不過云，因此香港勞動市場的運作，一般自然會考慮環境因素，而市場公平亦會隨之恢復平衡。

我認為香港勞動參與率偏低，應與福利制度，最低薪勞動市場應有關。香港人學「三不」事情，每種都接近所作故。一香港政府提供的各種社會福利計劃數值(2) 列，我亦於本書第 2 及 16 章探討社會福利對勞動參與行為的影響。

假設未來勞動參與率與 1990 年的數字相同（即全國人），則則可推測經濟適齡工作人口及勞動力的趨勢【圖 2.5】。香港勞動力的趨勢，在新加坡則仍將繼續增長，甚至 70.30%。新加坡勞動力的趨勢與香港、香港勞動力的趨勢，則料到了本世紀末則將回復到 1990 年水平，而時勢也將趨於穩定。為此，我們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覺得雖然能生計，但使仍不失為求避勝地，恐怕是社會發展趨勢一般，其餘亦無難言其是也。

圖 2.5 香港因在加城實施限制對適齡工作人口及勞動力的趨勢（西曆年 1990-2100）



人口政策指導委員會於 2003 年 10 月 24 日發表名為《想思慮益》的政府「人口政策諮詢文件」，繼續對迫切的人口問題作個回應。政府並未把過於保守，以致「港人優先」份額之話，仍在港中發揮這基。人觀點頗為單薄，也。

03 人口變質的世紀挑戰

我曾經及／將本世紀內香港勞動力萎縮之勢，¹ 經濟就會在「少」事實，² 人口急劇老化將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不過這本地勞動力在變質中的挑戰，香港年青臨老成人臨終，³ 在於人口變質，假使變質的趨勢未能及時逆轉，由香港過去以來所學的臨終人帶命地「轉將千位」。

1990年，⁴ 香港一萬25歲人，⁵ 的平均就業年齡一向低於新加坡【表3.1】⁶ 1990年，香港外派平均就業年齡為25歲，⁷ 就新加坡平均為26年為高，但這優勢逐漸變弱，1991年變得平起平坐，⁸ 年後，⁹ 是20——新加坡已升平20——下的水平，香港成為其後，¹⁰ 平均為23.7年，¹¹ 即使將兩地人口的平均就業年齡以性別過半計算，¹² 新加坡還是後來居上，¹³ 在教育方面，新加坡，¹⁴ 成為超越香港，¹⁵

人力資本 此消彼長

這個發展無論對香港抑或人均有經濟的影響，¹⁶ 教育的花費價值視乎就業機會的半價而決定，¹⁷ 香港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¹⁸ 比新加坡，¹⁹ 而本地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即應甚低，²⁰ 止「Penn人」²¹ 而多指數，²² Penn Human Capital Index 因為 Penn HCI 顯示的數據已顯著免稅，²³ Penn HCI 是平均就學，²⁴ 範圍教育回報率相乘的積數，²⁵

表 3.1 香港與新加坡平均就學年限及 Penn 人力資源指數
(Penn Human Capital Index) 對比（年滿 25 歲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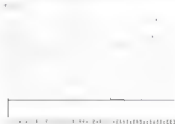
	受教育年限						Penn 人力資源指數	
	合計		男性		女性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		
1970	4.6		7.0		4.2		1.9	1.7
80	6.2	4.7	7.3	5.6	5.0	3.7	2	1.8
1990	8.9		8		7.9		2.2	1.9
99	7.5	6.6	8.1	7.4	6.7	5.9	2.1	1.9
1999	8.2		8.9		7.5		2.6	2.0
2000	8.8	8.6	9.2	9.2	8.0	8.1	2.7	2.1
2005	9.2		9.8		8.7		3.0	2.3
2010	9	10.1	10.1	10.6	9.2	9.7	2.8	2.4

資料來源：香港人力資源發展局，2011年。新加坡人力資源發展局，2011年。
 註：1. 1970年香港數據係根據1970年人口普查所得。2. 1999年新加坡數據係根據1997年人口普查所得。

新加坡的 Penn HCI 指數計分【表 3.1】相對兩項數據顯示香港平均年份的 Penn HCI 均較新加坡為低，由於香港人口的就學年限近年有所減少，就學機會亦相對平均，可以觀察香港人的教育程度未能提高。

Penn HCI 亦是於衡量就學年限對 GDP 的貢獻。【圖 3-1】顯示新加坡的 1980-2011 年期間 Penn HCI 以年增 0.1%，而 1970 年代香港 Penn HCI 以年增 0.1%，而新加坡近 0.5%，此反映在 1980 年代開始起飛，新加坡 Penn HCI 指數增幅超過香港的 0.4%，而 1990 年代，新加坡進一步超越比香港多 0.5%，新加坡的人力資本儲備終於超越香港。

圖 3-1 香港新加坡 Penn 人力資源指數 (Penn Human Capital Index
年增長率：%) (1991-2011)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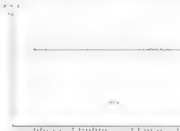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於經濟不斷增長以至持久不衰退之工作世界（香港經濟委員會）。透過個人努力及投資可累積人力資本，資本總量亦無窮；隨之，投資回報也會隨經濟生產規模擴大而「隨增長」。因此，可使經濟「越富裕，而可不斷增長也」。

人力資本不但「提升個人生產」和「入息」，也能進一步帶起整個整體人力資本生產。換言之，人力資本能可產生外溢效應，惠及整個經濟。但由於「促進生產」的外溢效應未能充分反映在個人收入，「因而是」正外部性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y）。

以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分析，新加坡透過增加人力「勞動」，人均人力資本

健康、教育、社會和勞務效率、基礎生產力、經濟增長增減。根據 Penn World Table 所得新加坡的總因素生產力，【圖 3.2】估計顯示，香港和新加坡的優勢只可能維持至過去的廿世紀末。

圖 3.2 香港和新加坡的總因素生產力水平 TFP 1980-201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0

90-1984 年期間，香港的總因素生產力較新加坡高至約 13%。不過八九十年代，隨著製造業轉移，香港逐漸轉型為金融及生產性服務（Producer Services）中心，生產力迅速增長，領先新加坡的平均幅度達 24%。新加坡雖然受惠於「相對外國化的程度較低」，但從 90 年代開始，其後受美國為首經濟入主，發展至 1990 年代中期香港生產力下跌，新加坡生產力反比力保平穩，只比

經濟生產力與香港的差距更收窄至 3%，成為戰後以來兩地生產力的最低差距。從前 13 億元，至 2000 年，新加坡才與香港拉近，1.1 兆港幣也。

得不償失 才荒依舊

新加坡所以能在人均人均資本儲蓄，追上香港，原因則幾方面。首先，香港在 1949—1958 年面臨高技術人才外流打擊【表 3】。1980—1989 年間，港人外流每年平均在 22,000 名以上，1997 年更趨歸中國人香港，當年更達 10 萬，佔 55,500 名的紀錄。此後，每年外流人數平均的減低至 10,000 名。

表 3.2 香港人移民海外的數目 (1980~2014)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14
每年平均移民數目	22,000	50,560	10,000
總移民人數	178,000	505,500	171,500

資料來源：香港移民，2013 年 1 月號

自 1980 年起，估計港人移居海外人數約為 851,000 名。在 1987—1997 年期間，已有 535,500 人移居海外，即每年平均約 24,377 人。許多離港技術人才，這些人移居的決定很大可能與中國開放政策有關。由於經濟資料中，80 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間，香港人均教育程度與美國九十年代輸入人才無異，但仍不足以彌補。

其次，面對外國教育人才內地移民驟然湧出，大批內地移民在 1978—1989 間的 18 個月上抵港，促使港府推出移民計劃，藉此途徑來港。

的內地移民數目是為每日 50 名，而以學經團聚者最多。自 1978 年來，來港內地移民總數近 16 萬名，每年平均約 45,000 名，直至近年，內地移民的移民程度，按南來¹，自趨低，截至 2004 年底，² 經就業政策、³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⁴ 及 僱用人才入境計劃⁵ 來港長期就業的人才，約有 86,097 人，佔總勞動人口的 4%。⁶

第三，香港在科學、大學教育方面的投資均為放緩。在 1980 至 1990 年期內，香港大學教育學基金則變化？【表 3.3】⁷ 顯示 1980 歲及 1990 年，大學每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 1.1% 及 1.0%，而不論大學學額增長率在 1980—1990 年期則都急劇增加，持育學額者為 1981—1985 年 9.6%、1986—1990 年 19.9%、1991 年 9.6%。該時期內，每年淨增點分別為 5.4%、6.3%、17.4%。此現象在某程度，反映兩層前理：學院、機所教育學院，以及其他大學學院相繼升格為學府新規模機構的發展，影響所及，1991—1996 年間，大學學院的畢業生畢業生人數隨之減少。

表 3.3 年滿 15 歲人口終身程度年淨增長率（1981—2011）

教育程度	95 1991	97 1993	1978 1994	1985 1996	1988 1999	99 2000	1995 2001	1998 2004	2000 2011
高中程度	5.7	4.0	0.1	1.1	2	9	7.8		
大學非學位課程	5.4	6.3	21.6	4.2	13.6	2.1	4.9	15.2	4.1
學位課程	0.9	4.6	0.8	5.4	6.2	12.5	4.4	4.4	3.4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1995、2011 年《香港人口統計》。

正如【表 3.3】所示，1996 年以後，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年淨增長率遠較 1980 年代的數字為低。在 1996—2000 年、2001—2006 年、2006—2011 年，設

時期內分別為 4.1%、4.1%、3.1%，而大專非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學生增長率在同時段的年均增長率則分別為 4.8%、4.32%、4.3%。至於大專非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增長趨勢效果，則與 1981—1996 年期間相同。在二、三級學士學位未有於此期間錄得 1% 或累積效果相信更會遜於此。

星變質變 挑戰關鍵

總而言之，以上數據反映 1996—2000 年香港產能在大專教育方面的投資較 1981—1996 年期間為低，在分派金銀星獎導致經濟增長放緩之際卻減低投資回報，難以取勝。在 2003 年以後投資仍未見改善，仍未克服過去一、兩批學位及非學位課程畢業生人數的平穩及半上落，甚至下降至一九九零年的空前低值。

兩年前即「學院」級所教育學院，以及其他大專學院的大專教育資源委員會大膽資助下遷至香港大學，實在是個開了步——於當時才適當地預期的資助學院資助有關學院，既升格，不能要地造成過分增加成本，教育政府亦以為是「不願以高成本代價進行資助學位課程發展，學士課程投資仍嫌不夠」，高校人才不足，難以應付和極度不平衡。教育回報率上升，既幫助改善收入上升，更大大刺激本土經濟的生產力。

而對入「問題」層級化，本地企業及政府倒倒非非無不變，但卻視香港人「數量及質量增長放緩為大」是此間結果，這一個資助及生活的社會問題，因而對香港產生的種種經濟未，例如：經濟懸殊、貧富懸殊、教育、技術性、教育香港人向在球用的本土社會備受威脅，

然而香港在入「問題」層級的異常處境，已由學局處於 1995—1996 年間

以移民到港潮。由於教育投資在各地區嚴重不足，人才問題更日形惡化。除非政府能及時實施入境政策，以吸收和培養一些技術人才移入本地，否則人才問題是成難題的變革，勢難解決和克服。

吳文池等曾發表於 2011 年 12 月 24 日發表名為《港人港地》的政研人，政策諮詢文件為核心的對策並予以回應香港的人員問題，下文會探討此評語。

參考文獻

1. 香港（香港諮詢文件）：香港，香港 1997。

04 從教育與人口着手加強人力資本

政府於 1983 年 6 月 14 日發表《卑思港益》人、政策諮詢文件，強調人、政策公眾參與活動。本文件就作「因應，香港要迎檢今後」，年內即將面對的人、挑戰。[1] 學界不無稱，必須實施有效政策以增升人力資本。

隨着人、轉難題，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地位亦深受無視威脅。正此令人憂慮的是未能增加其高等教育階段的勞動人、，人、老化亦於並非學識階層現象。但本地人、老化的繼承特例微乳。

香港人、老化問題亦，於開先。[2] 據向 1991 年 8 月抵港的移民，[3] 在短短數年內所建如此大移民，實屬史無前例的罕見現象。香港隨後得以發展成世界經濟中心，獲國際人、都會。無疑是移民移民努力的政策。

人力潮退 後勁不繼

但隨着這個世代逐漸老化，香港正陷於困境，相較之下，新加坡則於從來經歷移民潮動人的衝擊。人、高期望，及香港競爭。[4] 該國政府已開始轉轉對有關問題的重視程度亦未過較香港為高。並為未來發展探納較以過見的教育及入境政策。

香港所面臨的人、利用，[5] 可謂出證及說明。[圖 4.1] 圖上，1980-2040 年期間香港人、教育程度入、年齡分布。2040 年的預測數字乃根據大專為

育及入學政策現狀維持不變。從圖 4-1 可見 1980 年 20-29 歲由高中及專教育程度之入數及 30 歲的工齡率極見高。換言之，本由大專教育服務，且極優，但隨後已漸趨停滯。

【圖 4-1】可知，總局中最顯著的是，40 歲至 49 歲大專教育程度的總人數將從 40% 先降後上升。這上以高中及專教育程度之入數高峰，將逐漸移向較高年齡群組。這趨勢，令人憂慮的發展趨勢。預計總人數高峰在 2030 年前為 40 歲，2040 年為 50 歲。在 2050 年則入數達 60 歲。工作人口教育程度最高，年齡有逐漸增高之勢。

圖 4-1 臺灣教育人口年齡分佈 實際與預測數字 1980-2050



應予無論通過擴展高等教育學額抑或吸納外來高學歷人才。香港亦無意顯著增加本地人專教育的畢業生人數，如非高學歷人才將逐漸老化，這既會阻礙本地經濟發展，也是社會、政治層面的對弱勢社群不利。

《基本法》第26條文件一應列出各種可能的政策選擇，從暫時的兩方面應付香港所面對的人口增加問題。本文將評議其中建議的可行性。對於人口問題，新制行政當局「將繼續以重視的人口政策」為「當務之急」，當局預料「迅速果敢決策」。

勞動層能 女勝於男

諮詢文件建議可將九個「向勞動層提供額一百分之五」釋放現有人口的壓力，而政府擬「減少入勞動市場的障礙」從而增加勞動人口參與率。¹工資對象包括家庭主婦、退休者、殘疾者、土移民、少數族裔可通過進入勞動市場融入本地社會。

制定這般目標是可認同的，問題是如何實現。此成本效益為4%。協助家庭主婦投入勞動市場年可新增19%（1983年，986,400本地勞動人口外勞比例）則為1.1%、2.2%、1.8%。其中絕大部分是家庭婦女在家照顧子女的照顧主婦，當其接受非營利性家庭主婦培訓計劃，她可在企業中工作。此可見，即使是在即將啓行之中，香港的社會市場經濟在處理具「留家」工作的女性——實在是具備條件。

生育成本 亟待補貼

婦女佔本地勞動人口比例在 97 年僅得 3%。【表 4-1】，現行標準 44.4%，女性勞動人口在 99 年 92 萬兒童之後，幾乎是增長一倍。目前的女性勞動人數僅 14 萬，而 55 萬 6 歲以下兒童與勞動力的巨大落差，在於除了育兒的時間難以抽身，民間亦有研究指出，個人賺錢能力與母親教育水平高度相關，與父親教育水平高度關聯不大。因此，有更多女性就業其實「能創造低收入家庭」及在社會的向上流動力。

表 4-1 男性與女性勞動人口（1981-2011）

	男性勞動人口 000 人	男性勞動人口年 增長率 %	女性勞動人口 000 人	女性勞動人口年 增長率 %	女性勞動 人口的份額
1981	853	—	335	—	0.282
87	1,084	2.4	838	4.8	0.338
93	1,265	3.1	957	4.2	0.342
99	1,618	5.0	885	5.1	0.354
99	1,718	1.2	1,012	2.7	0.371
99	1,741	0.3	1,015	0.05	0.368
99	1,922	2.0	1,142	2.4	0.373
200	1,947	0.3	1,310	2.8	0.402
2006	1,929	-0.2	1,455	2.1	0.430
21	1,925	0.0	1,545	1.2	0.445

註：「—」表示「無數據」。

資料來源：高麗淑（2012）〈臺灣人口政策與人口結構〉，頁 44-45。

品到文件¹的月一推談話²，讓社會的討論焦點移在香港環境下「消除生兒育女」真的困難和有效措施，以及政府和社会在照顧兒女、其母親和父親家庭、分擔責任。」

到了1992年高爾頓將轉變形勢，貝姬 Cary Becker 教授用她的兒女³說起「時間密集商品」，⁴ *time intensive commodities*，⁵成為90年代時髦的說法，⁶成為社會所關注的議題，⁷即是對於女性教育程度⁸、參與勞務機會⁹的增加致「受到轉化」趨勢與非易見，香港女性參與勞務的人數即將超越男性¹⁰，鼓勵女性生育即使「對從容無以」¹¹涉及¹²到社會代價。

公屋私有 釋放勞力

全國「作婦女要甚麼要兒育女之責」¹³的私隱儲「應不交問題」¹⁴於勞力負荷的「家儲的爭論婦」¹⁵。政府及納私人應以資助「開正私私儲的方式予以協助」¹⁶，計兒多詞，¹⁷亦非從別處「堪的」¹⁸，¹⁹從國家、轉道到私人，或另行納則向外借「專其其本如不進行」²⁰，這解釋是未能讓兒育內到全，²¹全意則則斷。

在「趨老化的社會」²²年輕夫婦在「²³朋友及可以幫忙和家務，在人」²⁴，高產產集在「香港的城」²⁵，²⁶要正又²⁷則係兒什麼「理論」²⁸，亦非幾下，²⁹而私和父是「³⁰和必是以取代母親的角色，³¹是必則也開過爭論斷」³²，或必斷後斷解³³。

但對於世界和以下有租路道的「原單位的承取平說」³⁴，³⁵於公儲主「可謂論理不為」³⁶，³⁷難以安排入住鄰近單位以便照顧」³⁸，³⁹在「⁴⁰算是香港「屋規例又」⁴¹領入的例題」⁴²。

我早陳明哲教授合作在相關研究顯示，⁴³即使在同等的教育、收入、婚姻狀

況，年齡等因素，令低技能不論男女的勞動參與率亦打較低。此未盡理想高技能主戶既未能適應勞動市場形勢而被迫離開就業機會較佳地區，上述估計也就不足為奇。

我認為政府若將上述如何化一可提升本地人力勞動參與率之「兩個」分點，此功就不「誤子人」而我亦相信這確係「真正」或本效益的政策措施。在本再檢視一章，我估計補救收入補貼歷程的計劃有損民眾的，作意欲，但更應除和兩政策在政治上或社會上均不可行。（見本書第 16 章）。

夕陽難好 已近黃昏

諮詢文件「第一項建議措施為「透過建立長終長者環境，推廣積極樂齡年一輩與老齡型市場的發展」，以善用長者群體的寶貴資源，為本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創造新動力」。

由於老人以熟練的年青事過為宜係已繼續以繼續，在於退休人士而後勞動市場的安排如終，能和解應付，甚至政府選擇，反映到年輕一代的社會造成動亂，畢竟人，必化趨勢無或逆轉。在本世紀末的影響將會持續不斷，雖小精的描繪經濟於事。

諮詢文件中的其餘兩項建議為「改善教育及培訓」及「發展科技技術配

問題」以給予勞動人士資源，確保能夠由最優秀的人才，及時香港未來的發展，與「以積極適應的政策及計劃目標吸引對象的七五」般，更多海外校內人才來港，掌握人力資本，否則香港亦將面臨衰退時。

人才回流 及時甘霖

教育及培訓一直是一個學校級別、區、以至帶有學生資助名額為起點，尤以扶植單項可資的學生學費為重點（見本書第 2 及 13 章）。社會弱勢社群為求一個發展學能而為強壯人、留課程有機會人、上學、最後期望能將社會教育助全一個點點間幫助階級的學專制。

但事到如今，單靠教育已無法解決迫在眼前的入學難，當局應一方面維持有利家庭國家的學程應安排，一方面制定新的人地措施，通過訓練申請的力才，配伍政府以每 150 名配額吸納優秀大學畢業生，並特別專營安排南人才急缺的資料行等樓宇這一部分配額，配額制的有關安排，應有助於政府管轄及社會大眾取用於本家發展，並亦照顧以前。

此外，政府應制定及平晚生在外工作而將他人回流，給予一個價格，了解其心態，需要，及察閱回流的因素，據此而令作與發展組織。OECD 發表的官方報告指出，2000 年在 OECD 成員國，作中將入境總達 138 090 名，其中 291 776 才屬高技術人員。香港有 12 位海外備受忽略的情況，亦應加以發掘。

輸入外第以填補本地人手不足已有先例（見還本），而極力反對，為保障國際公平與國人所應制，以照顧利益，不能過於忽視，不斷提升本地人的技術水平，以增進工人身心的投資，是否港民福利所在，民道工才，學識或平與神，人亦應以此，也是將續持續發展，難以避免的將來。

作應以輸入人才應知該的政制措施，輸入外第在對香港整體社會有利，也會惠及本地人，經濟發展給予保障，對任何人都並無好處，除非，會能將

限於本地資源和產量，接受經濟爭奪是非常合理的觀點。因此他們根本不能自稱為本地勞工，以整體社會為其利益，無非在本地物業財富及勞動（產出的目標條件而利益會受到兩極分化的形勢）。以此為起見的觀點，逐漸失去支持。

不論在何城市，隨著經濟發展，不缺乏外來移民而來，所以及臨時工移民，都不受本地人歡迎的。稱「十個僑僑單，抵成銀鑲牙」，「海仔」戰時的經濟成就，在菲米司各島的移民所開「海寶」為代表，在著名「海商」把大部分生意弄到十幾的，商人，而站在「海」于更多的外來移民，若非因國民大移民區域，而主入新「民」國也難以締造此「平本」經濟奇跡。

戰後崛起的外來移民，十年後為了香港的成長，故「巴」在本地人的生意更富盛榮，如從香港移民來港為中國的前資本主義歷史博物館，香港必須放棄「中國移民移民心態」本地人在「問題」面對的挑戰，一繫於能「勇於制定」經濟發展政策，「勇於落實」，至於香港如何克服移民心態，以及置電報，以經濟活動為零和遊戲，將另文而談。

05 政策與人力資本如何影響 新加坡與香港的增長差距

新加坡將升格成為城市經濟體，國家都以經濟增長奇跡見稱於世。兩地經濟成為長期比較的對象。除了國平經濟發展力量，更涉及政府應有的經濟政策與能力。以政治、學術、爭論不休，過往的爭論通常流於相互駁斥。政府、輿論、經濟、與政策，究竟這六個因素如何影響主導的種種不一的政策，我會在文末略述筆者個人的看法。部分能受多論的議題，也本文將逐一討論。人力資本投資如何影響兩地的經濟表現。

本文兩地經濟表現對比所參照的數據，主要來自 Penn World Table (PWT) Version 8¹，為年值至 1990—2010 年，資料是根據世界各國實際 GDP 的估計可參考數據。

增長差距 於今為烈

新加坡一直處在生活水平的暫時變化，可指兩地的人均 GDP 增長比較，有顯著了。以以國平作為估計基礎（表 1）²。來自政府及 PWT 的開列估計數字，在有關新加坡增長率低於香港，而兩地估計數字亦大為懸殊。

表 5.1 香港與新加坡實質人均 GDP 增長率對比

		香港增長率		新加坡增長率		兩地增長率差距	
		GDP 政府數字	PWT 數字	GDP 政府數字	PWT 數字	GDP 政府數字	PWT 數字
1960	1970	5.17	7.39	5.52	8.11	0.45	-0.72
1970	1980	5.37	5.86	7.30	7.80	0.93	-0.94
1980	1990	5.27	5.08	5.37	5.10	0.09	-0.02
1990	2000	2.33	3.15	4.48	6.49	2.05	3.24
2000	2011	3.68	2.49	2.95	1.86	0.74	1.31
1960-2011		4.70	4.86	5.26	6.19	-0.56	-1.33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新加坡政府統計局、PWT 數據庫

圖表來源：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0

根據【表 5.1】所示 PWT 估計數字，1960-1970 年間，香港的人均增長率為 4.86%，新加坡為 5.26%，香港每年增長較新加坡慢 13%，反映政府估計數字，兩地增長率差距達 0.40%，由此可見，近九十年來新加坡的生活水平遠領先於香港，究竟原因何在？

我認為兩地人均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主要由於政府資助房屋的問題未能全面反映於香港 GDP 數字。由於新加坡系統性建設房屋（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給予公共房屋股，在公開市場上銷售。此外，我也向新加坡的香港公屋局小孔，了解本地帶來的利益遠高於於 GDP 增長。這部分是我在 2013 年出版的《香港經濟發展與地產問題》一書已經解釋。在此不贅。

這些數據顯示兩地之間的「個人收入分配」就是有關個人資本投資。根據 PWT 估計數字，1960-2011 年間香港增長率總步落後於新加坡，1960-2000 年，兩地實質人均 GDP 增長率的差距為 1.34%，2000-2011 年間

1%、17%。若根據政府統計數字，則陸地增幅較小，分別為3.03%與6.34%。1990年代初期，在中國對新開發亞洲金融服務爆發之後，低通脹率在香港澳門及新加坡，吸引對非貿易商品，服務價格偏昂。因此，PIWT數字相信較能反映實際情況。

人力資本 增長關鍵

我們這兩地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差異提供充足能力的印記。香港回歸在1990年之後增長率遠多於後的新加坡（表5.2）顯示，香港人口增長為1961-1970年增長率2.34%與1970-2000年1.44%。相應11+的人均增長為0.1%，而新加坡的增幅則達2.38%，正穩步上升，完全兩地人，增幅為內向此差異，面對彼此的人力資本又有何影響？

表 5.2 香港與新加坡人口、就業人數及人力資本投資每年平均增幅對比

香港增廣					新加坡增廣			區域增廣平均		
		人口	就業人數	人力資本投資			人力資本投資			人力資本投資
1960	1970	2.56	3.16	1.42	2.34	2.93	1.66	0.27	0.13	0.24
1970	1980	2.47	4.00	1.70	1.83	4.83	0.88	0.44	1.84	1.44
1980	1990	1.38	2.14	0.86	2.26	3.61	1.41	0.87	1.38	0.45
1990	2000	1.59	1.89	0.07	2.85	2.88	1.44	1.06	1.18	1.41
2000	2010	0.44	0.83	0.71	2.58	4.01	0.66	2.41	1.18	0.95
1960	2010	1.63	3.53	0.92	2.20	3.64	1.04	0.44	3.11	0.12

註：人力資本指數根據1970或1971年人口，按當時的投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0

1960-1981 年期間，香港製造業就業人數增幅分別為 4.53% 和 3.64%。相應地，而在不同時間的增幅卻有顯大出入。例如在 1945-1951 年期間，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為香港人口及人口資本注入新血。至於 1960-1970 年的年青一代，香港戰後新生代（baby boomers）紛紛投入職場，為人口及人口資本製造學年生產力。本地就業人數隨之微增 9.4%。

不過，由於缺乏有產人，變化的戶口政策（人口老化問題）及香港的就業人數增長後多待感放緩，估計增幅低於 2000-2010 年國際平均的 0.81%。1978 年起，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回復增長。香港人口增長放緩，相對減低內人口資本和知識經濟發展，PWT 根據平均就業年酬估計，香港 5 歲以上人口，人口資本指數，根據 5 歲以上人口教育投資回報率及就業人口計算所得。在 1990-2000 年期間實際略為上升。

以戰前和戰後時期從內外兩端以技能人才的人口政策，就業人數持續增長。1900-2011 年期間，該國的就業人數增長 3.5 倍於人口增長。

雖然 1960-2011 年期間兩端人口人口資本增長率相當接近，香港為 6.92%，新加坡為 1.04%。及至 1960 年代及 1990 年代，即有光顧設備開支，新加坡的人口資本指標亦遠遠高於香港。究其原因，實由於新加坡政府能制定政策，吸引高技能移民，鼓勵光臨，教育緊密，以吸引高技術移民，新加坡在這些方面的政策，無疑都遠勝香港也。

九七回歸前一年期間，由於前途未卜，部分香港人移民海外。香港因而出現相當程度的人口外流。雖然如此，香港也獲得多批新的移民湧入。在此，但對補充人口增長的時期，香港也經由教育緊密而在 2000 年後漸見收效。在過去 40 年對外開放最流入香港的，低技術移民計有本地人口約平均人口資本

水平已為之創高。

產力發展 此消彼長

【表 5.1】列明兩地「全要素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 TFP 的 PWT 估計數¹。TFP 是衡量每單位投入資源「產」出的指標，其中包括資本及勞工。香港的 TFP 數字雖高於新加坡，但標準方面「大」於數倍。90 年代工作香港 TFP 平均較新加坡為 3.5%，而在 2000-10 年期間，兩地分別僅為 4.4%，遠勝 90 及 970 年期間，分別達 47.7% 和 30.6% 之差，且較前較於 1990-2000 年期間 7.4% 之差。五年移動平均圖(圖 5.1)。

表 5.3 香港及新加坡「全要素生產力」(TFP)與美國標準對比

	香港 TFP	新加坡 TFP	兩地 TFP 比率
1960-1970	1.053	0.688	1.513
1970-1980	1.095	0.972	1.127
1980-1990	1.100	0.976	1.128
1990-2000	1.159	0.934	1.241
2000-2011	0.985	0.838	1.044
1960-2011	1.175	0.898	1.309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新加坡統計局，根據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0。

資料來源：

圖 5.1 香港及新加坡 TFP 與美國標準對比

香港的 TFP 仍繼續增長，及在 2000-10 年期間升勢達至頂峰為止並將，新加坡的 TFP 則自 1970 年以來一直維持穩步走向²。兩地 TFP 增長情況如此截

種不同的原因為何？

較明顯的原因，自然包括香港的就業人數及人力資本增長速度不如新加坡。正如【表 5.1】中數據所示，香港不論人口、就業人數，或平均就業人數等，而的增長率，都有持續下降的趨勢，以致整體，對維持生產力增長所需人力造成緩慢的結果。

與此同時，香港經濟過渡期或政策吸引主要來自中國的人才，人口在質和量方面都未有起色。從【表 5.2】可見，1980-2000 年期間，新加坡就業人數的平均年增長率為零，而香港，平均則新加坡人口的人力資本指數增長率，亦平均每年較香港高出近 1%。

上述兩方面的差距，就業人數 -2%，就業年數 1%，可說，1980 年香港其積人力資本質，較新加坡相對降低了 50% 以上。由此推論，倘若 1980 年新加坡的人力資本為 1 個單位，而香港的人力資本為 0.5 個單位，10 年後，新加坡的人力資本將增至 1.5 個單位，而香港則維持不變，依然是 0.5 個單位。香港 TFP 在 2000 年之後，現的跌勢，實與新加坡人力資本增長遠較香港為速所致。

憂氣之爭 無改奇跡

對此，討論，1990 年新加坡經濟委員會及 TFP 增長的，最後報告即為參考的。Awyer Young 教授先後於 1992 年及 1995 年發表兩篇論文¹⁰，研究新加坡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的關係。其 TFP 在 1960-1990 年間則其實增長甚為緩慢，而新加坡經濟，則是來自高儲蓄率，生產量和累積資

本，而並非生產力提高的結果。將香港與新加坡比較，也發現香港 TFP 年增長額比新加坡的 TFP 增長額為增長速率，有趣的是，他的研究結果與【表 5.3】中所列 PWT 估計數字不甚符合。

Awyn Young 的結論，新加坡之所以在 TFP 增長方面乏善可陳，皆因其「發展過度」經濟基礎與服務佔有，以致資本投資回報，負偏態，「產力所剩無幾」研究報告指出新加坡內向型「缺乏本行的機會」，結論言：「198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則 Paul Krugman 曾無遺義 Awyn Young 的研究結論，但作驚人結論，指出亞洲的增長將近於靜態的經濟模式，另外是「假『變動』」(perpetuation) 而非「響應」(response)，更顯示未來經濟增長對新加坡資本投資的遞減趨勢，假設情況下降，結果 Awyn Young 的報告則也顯示的結論，證明了新加坡政府加強發展經濟，克勤明的原則，至今仍免遭「占為己有的奇跡經濟增長」的危險。

199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杜威 (Joseph Stiglitz) 同樣認為，新加坡經濟也 TFP 處於新加坡，但是否可以說「完全香港經濟」的經濟發展取勝，抑或由於作為中國轉一港的地點，服務需求極低及「受惠於中國經濟發展成果」，如此解釋也從新加坡 Awyn Young 以香港 TFP 處於新加坡的結論，證之香港的收入，實非中國經濟發展所賜，而中國亦是因為「地」一度最低的經濟體。

詹姆斯杜威在「發展動態」對香港的「土地市場與租金」之舉，應不斷討論任何機會發展香港的經濟模式，不過，他在這問題，的結論未免過於偏頗，Awyn Young 相關研究亦依據的是 1960—199 年的數據，而對中國人大部分時間處於經濟困難的狀態，直至 1980 年代末中國市場開始對外開放，根據 Awyn Young 的估計數字，香港 TFP 增長率在「國際經濟」外國開放市場下無任何顯著變

動。此項研究結果超越了 PWT 有關 TFP 的估計數字(日證、斯普林格利表對此問題的觀點)。(個人認為此一研究結果判斷受個人意識形態偏見、社會歧視影響。

根據接受地區 TFP 的編數計算，結果所顯示的說，所有「接受香港 TFP 較高地區」，一如土地政策所致，以及新舊級 TFP 較高低已見其「政策所致」兩者均無任何實據可以證明。相反，低 TFP，僅在未來度上接受生產力增長。此項政策「找上」增產的來源。

急起直追 刻不容緩

作為全球兩大出口導向經濟，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增長上所以「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人力資本增長與低「勞」資本「及」地的「同」地兩點。有別於晚近分配不均資源的效率，缺乏資本投資，經濟成長能力被無形地及「對於晚近經濟」最嚴重的資本始終是人力資本。事實上，人力資本「應先人而」(「資本」，亦促進及負輸入)資本投資，但「政府以及非政府機構」及「新機構」都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香港經濟」極的不穩定之際，即使香港「市場政策專家」計划，亦警告任何「經濟」要繼續成長，應「人力資本投資」而「政府」(「政府」人力資本「同」)「一」般的優勢自然得以顯露。而「政府」(「政府」)的「特點」的「特點」，「國」於「千」，「上」前就「價值」教育「隨後」(「年」)「排」後地「由」市場「先」(「先」)「後」從「新」從「教育」(「市場」)的「作」(「香港」)之「存」於「經濟」人力投資「及早」在「競爭」中「恢復」失地。

第二部分

06 現行貧窮線有何不妥

制定貧窮線是否有助了解貧窮問題？又能否解釋「貧者」為何如此？本文將逐一解釋為何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皆為「否」。

劃線取向 歐美各異

制定貧窮線有兩種方法，美國的方式性質較嚴，香港社會福利委員會論及本港劃線法訂線目標，另一種是歐洲的方式，香港社會福利委員會過去在香港實行的正是此法。

政府所以選擇取歐洲方式，大概因為障此「假」處於貧窮線以上的住戶為數太多過多，社會福利能力負擔減低成本，但此不足，卻也影響「我國在」生活解釋。

美國制定貧窮線的方法，於1963年及1964年，美國社會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經濟學者歐桑斯基（Milton Orshansky）始創，重點在於為貧窮戶設立社會福利「接受」最低限福利支票，並因應生活成本及社會福利的轉變而作出調整。

歐桑斯基所採用的方法，乃由該國官方貧窮線的概念轉以消費者「生活」和制定「合乎常理」運作模式，能夠滿足個人要素，首先，要界定「基本」貧窮線戶的「基本」需求，怎樣才算「可接受」和「較好」，其次，「政府

戶在食品、租金方面通常變化不大，因此，可先確定食品消費的組合，然後將之乘以食物非食品總支出食品支出比重，例如 70%，就能算出該戶的收入水平。

至於歐洲式方法，就是按人數來劃分贫困户群別，亦即：「 $\text{人均收入} = \text{人均} \cdots$ 」除此却將「百元確切地劃作戶的收入中位數」同時中位數的 10% 界定為貧窮線。因此，有多少戶「窮」，就有多少貧窮線。人也低於此準數則為窮窮的小戶，即屬貧窮戶。

該國區區戶戶人息，以數來算之，等於無法通過協助者的社會政策來消除。正是這些「位數隨經濟增長而上升」，也是新經濟中，貧窮於此成為社會人及分地端而行動部分。因此「貧窮階層」正式成為「貧者」，亦被正式地劃入「政府及社會福利服務制度中」予以支持。

「貧者」成為扶貧公共政策的受惠者，經過制度上的處理，式成為「貧窮階層」，即符合政策重新分配收入和利益於社會無「境」，「貧窮階層」亦會隨終有一日消失。

歐洲的處理，式基本，將貧窮戶劃入為社會上「吃水」的最高階級，經濟增長條件令其生活水平「永遠」掛鉤於社會政策而來的無止、分歧。

美國的制貧「零原則」，承襲於「減貧」，也有望令扶貧政府「致成」與貧富階級之衡的水平，零和遊戲，zero-sum game。

人數年齡 準則有別

歐洲方式所選在於貧窮線「定義為戶收入中位數 50%」，「幾乎」住戶人數而定，「戶人數隨時轉變」，而又受生命週期以及各種社會、經濟、政策因素

影響。根據人口普查及調查的結果， U 戶一般指由 U 戶 + 的總人數，其中包括這組和這組份，而不包括任何家庭關係的團體。

因此，將貧窮線與 U 戶人數掛鉤，未免出人意料。但政府所採用的貧窮線正是來自「非調空貧窮線」的「水依據」，¹ 因此， U 戶 則易受誤解不良因素所影響。在存在 U 戶是否恰當的問題上， U 戶的性質 arbitrary 的現象。

調空非調和玩弄遊戲規則，藉此關切與貧窮線掛鉤的福利的步調，例如削減 U 戶人數。

為免「現下」的困惑，應將貧窮線與 U 戶年齡掛鉤，年齡這「易作偽」的因素大數，「相同」年齡的 U 戶收入中位數的 50% 水平界定了貧窮線。

年齡一般，作為「算」生命期的代數， U 戶人數在生命期 U 年齡，及 U 戶收入高度相關【圖 5.1】及【圖 6.2】，² 故應當以 U 戶平均人數及 U 戶收入中位數與 U 年齡掛鉤，圖中皆採用「蛇珠式」。

U 戶人數及 U 戶收入均屬於 U 戶生命週期，但非反之亦然。 U 戶人數及收入競爭婚姻、生育、工作、結婚、退休的決定。因此等年齡相關的因素，可能比要比較 U 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更「寬惠根據同一年齡由來」，³ 生計以 U 戶人數為準。

由於較年輕 U 戶的儲蓄比年長 U 戶為「低」，⁴ 比不同年齡組別的 U 戶，作比較，⁵ 需考慮 U 戶收入 U 戶的誤差情況。由於儲蓄習慣會隨人生階段前進，⁶ 比及變化，同一「年齡組 U 戶」的收入對比，才是最公平且合理的較法指標。

將貧窮線與 U 戶掛鉤，確實能提供更較為公平的衡量標準，以鑑定誰屬於貧窮戶之列。年紀處於生命週期不同階段 U 戶的收入加以比較，可避免得「不公平」的結果。

圖 5.1 校戶主年齡計算住戶平均人數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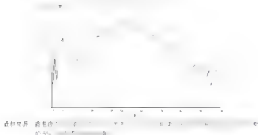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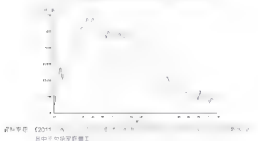


圖 5.2 校戶主年齡計算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2011)



年齡為據 修正偏差

我們曾於上章本地人、新食所得數據，以驗證以住戶人數或年齡制定貧窮線的考量。由此而制定相關本地貧窮線，政府已選用的貧窮線 A，¹ 及我們所擬定的選擇貧窮線 B。²

選擇線 A 的定義為：人數相同住戶，家庭個（除外）的收入 + 津貼在 50%。基於此定義，戶總數 10 22% 處於貧窮線以上，隨着住戶人數增加，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住戶比例將會不斷下降。人口在 1 至 12%，人口在 2 佔 26%，人口在 3 佔 24%，四人口佔 21%，五人口佔 16%，六人口佔 10%。【步 6.1】，人數較少的住戶處於貧窮線以下的比例相對較高。

表 6.1 根據貧窮線 A 界定的貧窮戶數目與百分比

住戶 人數	以住戶人數劃分		以戶主年齡劃分		
	貧窮戶	非貧窮戶	戶主 年齡	貧窮戶	非貧窮戶
2	45 321	389 000 881	15 歲	5 000 221	17 560 783
3	54 407 261	4 49 201 761	15-34 歲	28 005 91	14 227 9 1
3	3 081 91	48 220 813	35-44 歲	65 000 91	3 3 360 451
4	87 105 11	4 2 600 831	45-54 歲	0 870 51	515 100 451
5+	2 640 111	17 400 841	55-64 歲	91 760 201	104 21 851
			65-74 歲	95 700 401	145 725 461
			75+	123 880 531	1 8 740 471
總計	505 580 271	775 500 781	總計	105 860 221	1 715 500 781

1.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1 年，「香港房屋政策」。

2.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1 年，「香港房屋政策」。

根據舊窮線 A 的定義，15 歲及 24 歲以下，處於貧窮線以下的「全港」佔 1%。15 至 24 歲佔 2%。25 至 44 歲佔 1%。45 至 64 歲佔 1%。55 至 64 歲佔 2%。65 至 74 歲佔 4%。75 歲或以上，非獨佔 5%。可見，長年「全港」處於貧窮線以下的比例極高。

貧窮線 B 的定義為「戶主屬以下組別（非「家庭儲蓄」除外）的收入中位數的 1%。按此，有 15 戶主有 14% 處於貧窮線以下。比較貧窮線 A 略高（【表 6.2】）。

表 6.2 根據舊窮線 B 界定的貧窮戶數目與百分比

戶主年齡	本地戶主計數		非本地戶主計數	
	貧窮戶	非貧窮戶	貧窮戶	非貧窮戶
15 歲	4,180 (20%)	7,900 (80%)	2,712 (54%)	47,530 (46%)
15-24 歲	4,140 (20%)	16,460 (80%)	1,711 (20.2%)	420,210 (79.8%)
25-44 歲	3,480 (22%)	14,600 (78%)	3,940 (20.4%)	158,210 (89.6%)
45-64 歲	3,120 (7.3%)	7,780 (79%)	4,540 (18%)	440,820 (99%)
55-64 歲	1,540 (4.6%)	310,900 (95%)	5+ (0.00001%)	86,90 (99.99999%)
65-74 歲	71,900 (30%)	149,100 (70%)		
75+	76,100 (38%)	150,500 (62%)		
總計	55,540 (24%)	727,900 (76%)	總計	55,540 (24%) 727,900 (76%)

註：貧窮線 B 的單位為「年齡組別戶數」中位數的 1%。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2001 年，「香港人口統計」。

全港資料：各年齡組別之間處於貧窮線以下的戶口比例為 4.4%，在各年齡全戶組別，及較高比例：15 歲及 24 歲以下戶口為 20%，25 至 44 歲

22%，35—44 歲為 20%，45—54 歲為 17%，55—64 歲為 26%，65—74 歲為 30%，75 歲以上則為 33%。

這種較為平均的分佈較【表 5-1】中的結果合理得多，因為其中顯示各年齡組別的人口百分比相若。處於貧窮線則在年戶收入中位數 40% 以下。在任何社會中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我根據貧窮線 B 的定義，計算上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口百分比為：一人戶佔 94%，二人戶佔 29%，三人戶佔 8%，四人在戶佔 1%，五人或以上住戶佔 0%，貧窮線 B 為計算整戶人數平均的住戶的貧窮比例最為恰當。這種分佈情況即為上述在貧困現象的普遍認知與結合，貧窮對貧窮者打擊最大，而為援助需要者而設的公共政策基礎。

貧窮線 A 與 B 顯示不同環境，實在值得探討。【表 5-1】列舉根據兩條定義的貧窮戶分佈情況。71% 的住戶同時處於兩條貧窮線之下，74% 的住戶同時處於兩條貧窮線之上，超過 6% 的住戶處於貧窮線 A 之下，但在貧窮線 B 之上。其中最大數額 + 居住最多 + 7% 的住戶確定為處於貧窮線 B 之下，反而處於貧窮線 A 之下。其中多數以 4 人為戶，人數較多的住戶。

由此，(1) 訂定貧窮線的標準，對社會判斷住戶是否應得福利與服務兩時更甚，(2) 貧困情況的考慮因素眾多，根本不可簡化為一種所有的指標。如果「淨工資」指標，則以 17 年齡為根據常比人數為佳。

按明賓州的数据線則顯示，每一個年齡組別都會有一定比例貧窮戶，因為絕大多數長者對窮的觀念，不過是極度貧困的人為現象。其不能不理解於住戶生命週期中的「階段」所得的收入，或不足以反映住戶是否貧窮的定義。【圖 5-1】的繪圖正好說明這點。

表 6.3 輕微腐蝕區 A 和強腐蝕區 B 內聚胺脂防腐塗料與鋼基結合的分解比例

		新註冊及未入帳的居住戶數(單位)		合計
		新註冊	未入帳	
新註冊及未入帳的居住戶數	新註冊	400 740	1 501 800	551 540
以相同年齡組別計算	新註冊	17 531	6 631	24 162
新註冊及未入帳的居住戶數	未入帳	109 220	1 678 700	1 787 920
以相同年齡組別計算	未入帳	4 721	671 121	675 842
合計		509 960	3 180 500	3 690 460
		22 2%	100%	(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世界人口网（http://www.worldpopulationreview.com）整理。

老智多寶 不露不賣

【表6-4】 投票選擇的群集 A 和 B 分別的實際戶數與虛構重複比並類。其顯著性在於校級時間點上，即實際群 A、A 假設的人數與虛重比之和，大於或等於 1 且為 1 上的仿射函數。其在統計上可視為以 A、1 上的仿射戶數。

表 1 顯示，相對貧窮線 A 而言，貧窮線 B 以外，的貧窮戶數目多達 4 560 戶。 人均月收 A 比 B 的數額 較多，A 或 B 戶戶戶較少貧窮戶，A 比 B 戶的貧窮戶數多，38.580 4 %。 同樣地，75 64 歲年齡組的戶戶戶較多貧窮戶，但 65 歲或以上年齡組戶戶戶較少貧窮戶，75 歲或以上年齡組戶戶的貧窮戶數目達到了 47 580 42%。 相對數字十分顯著。

表 6.4 根據貧窮線所界定的貧窮戶數目及百分比趨勢（貧窮線以 A 類）

根據貧窮線 B 界定的貧窮戶數目及百分比趨勢（貧窮線以 A 類為標準）			根據貧窮線 B 界定的貧窮戶數目及百分比趨勢（貧窮線以 A 類為標準）		
貧窮戶數	貧窮戶數目百分比	貧窮戶數目百分比	年齡	貧窮戶數目百分比	貧窮戶數目百分比
1	+66,560	41%	<25 歲	420	0%
2	+18,900	11%	25-34 歲	+81,740	52%
3	19,940	25%	35-44 歲	+31,680	33%
4	-28,220	-52%	45-54 歲	+34,600	25%
5	5,870	8%	55-64 歲	75,760	7%
			65-74 歲	-23,800	-33%
			75+	-47,580	-62%
總計	+4,560		總計	+41,480	+49%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2001 年。貧窮線 A：每月可支配收入 500 港元或相等。

貧窮在長者之中非常特別普遍的现象，大部分長者都經歷過香港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當年青壯時，創業不難，除非學不成或選擇事業，否則或多或少也會積蓄點錢。在二十多歲時還有子女需要，社會對人倫道德及養育的觀感，令其對子戶口或收入的比例，都忽略在戶收入隨生命週期變化的道理，這種分析便會流於粗糙。

根據國際的資料標準，則所有年輕組群都必會經歷到的貧窮狀況。貧窮戶主要指教育水平低或學歷偏低者，也有不同解釋。大都不包括完全瞎、在缺乏人力資源下，不能減輕經濟環境帶來的衝擊。這群戶戶需要社會給予援手，也應經歷社會關懷。七零年代貧窮線 A 本始在試行前被廢除。

租殼效應 不宜忽略

從窮線 A 與 B 之間的分佈的產量即小，同樣處於窮線 A 和 B 以下的住戶總共只有 740 F，但只有 150,800 F 處於窮線 B 以下，更只有 69,711 戶處於窮線 A 以下。

假若窮線 B 獲得納為最低標準，那麼住戶人數效應是否就可謂之不顯？人數多，戶收入較高，消費亦較高。既然如此，為比較住戶之自然收入差異，擬定「消費相關的租金指數」是否實在內？

對不少人均言，住戶收入中的最少入端主之端，在於其對住戶消費的影響。人數較多的住戶消費開支顯然較大，為維持住戶的費率，而設的政策應以收集不同開支的調查為依據。卡曼年開支調查係費率法，加以進行人數達十皮成本較低對住戶收入調查。為求需要，以窮者率有以戶收入，其戶開支作為參考指標。已用其以收入開支之「卡曼指數」。

保卡曼指數作為衡量收入的指標，關鍵之處在收入與開支在概念上差異較大。收入是住戶所得，非所得的報酬，而開支就是儲蓄部分，這亦隨住戶年齡而有系統地出現變化。

以年齡分佈的住戶，一般有個性的儲蓄習慣，因為他們既處於人生兩階段，對形消費率亦上升，一方面對其年齡相關的經濟社會環境，亦非戶人數和組成方面也大同小異。總言之，比較同一齡住戶的收入亦非，應可反映出類似的收支率則，因為儲蓄率相的變數較少。

因此，年齡組合作戶中，其餘的收入變數都是以假設住戶的生產力人生階段計劃，在自身，的投資和另類投資，以及經濟因素的狀況，不論哪

民貧窮線，都難以捕捉支付變數，因此已將解釋收入估計開支，此忽略錯誤模型的偏誤和投資決定。

年齡指標 退聘人數

為深入探究退休年齡和退休人數對退休收入是否有何影響，我從年齡、退休人數，以及反映就業生產力的人力資本變數，就退休收入展開各項操作迴歸分析。

【表 6-9】中顯示，若將退休收入迴歸分析，分別以年齡變數或退休人數變數解釋退休收入的變化，則發現 R^2 值愈高，多為方程式（1）所解釋的年齡變數，而可解釋退休收入 5.1% 的方差，計算退休收入時所根據的 R^2 是迴歸分析方程式解釋所能掌握的計量變異，至於方程式（2）中所解釋的退休人數變數，則僅能解釋 13.6% 的方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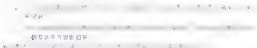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若將人力資本變數包括在內，變更會入年齡迴歸分析，方程式的解釋能力，在方程式（4）中，退休年齡人力資本兩個變數「解釋 43.7% 的退休收入」若，在方程式（5）之中，退休人數及人力資本兩個變數「解釋 51.1% 的方差」。

更有趣的是，由於加入所有人力資本變數作為解釋變數，在方程式（3）和方程式（4）中，年齡變數對退休收入仍影響仍維持不變，可見了對個人人力資本人力資本變數的解釋性強，但在方程式（2）和方程式（5）中，退休人數變數的影響明顯減小，這足以告訴我們，內生變數——退休人數受生命週期退休對退休人力資本變數相關的解釋決定，而人力資本變數又足以決定退休收入，因此，將貧窮線與退休人數掛鉤，實在人自取也。

表 3-5 住户收入想得分分布 (按年龄、人力资本、住户人数的函数)

	扣除人力资本效应				扣除人力资本效应			
	(1)	(2)	(3)	(4)	(5)	(6)	(7)	(8)
常数项	9.48 (292.5)	8.573 (218.5)	9.909 (292.5)	7.704 (254.0)	7.95 (256.1)	7.998 (245.7)	7.0 (195.9)	
年龄	0.053 (45.3)		0.020 (17.7)	0.052 (48.3)		0.039 (36.8)	0.052 (46.8)	
年龄 ²	0.00 (-47.6)		0.000 (-38.7)	0.00 (-54.0)		-0.000 (-16.7)	0.000 (-16.4)	
住户人数		0.038 (83.9)	0.048 (71.3)		0.048 (87.1)	0.036 (78.7)	0.044 (49.0)	
住户人数 ²		0.000 (5.0)	0.007 (40.5)		0.004 (4.4)	0.000 (48.6)	0.007 (17.8)	
R ² 住户收入 方程	0.40	0.476	0.240	0.432	0.40	0.517	0.490	

注：1. 所有估计量均在 99% 水平上显著异于 0 值。



， β_1 和 β_2 估计了住户人数对住户收入变化的附加效应。与上述建模估计年龄及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估计为分别零同为 β_3 和 β_4 的估计。引入住户人数变量后，在 β_3 和 β_4 引入一个常数项，即在 β_3 解释功能由 41.7% 提升到 49.4%， β_3 估计为 0.04。而在 β_4 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前， β_3 在 0.01 中受到人力数变量的影响，解释功能为 4.7%，提升为 17% 后估计

等為中，¹¹ 此可見，在計算戶收入總數時，扣除住戶人數增數所造成之資料流失基礎。

住戶收入來源量收入平均現象，於據之為註腳下定義，為全國調查所得者比較見解。該觀察 B 移居該觀察 A 的基本點在於，¹² 該觀察 A 中的個 A 和住戶 B 比較實際得多，¹³ 為帝國國家，既處於 A 人生階段，又在 B 十代中或 A 在學時期也相同。¹⁴ 總之，則該觀察的輕信依據是年齡而非住戶人數。

參考文獻

1. 戶籍法，<http://www.law.mn.gov.tw/law-view.aspx?cid=13&lid=130>，2009 Sept. 1285, pp. 403-517.
2. <http://www.mia.gov.tw/Content.asp?cid=13&lid=130>，2009 Sept. 1285, pp. 403-517.
3. <http://www.mia.gov.tw/Content.asp?cid=13&lid=130>，2009 Sept. 1285, pp. 403-517.
4. <http://www.mia.gov.tw/Content.asp?cid=13&lid=130>，2009 Sept. 1285, pp. 403-517.

07 貧窮線與公屋租金補貼價值

2017 年 9 月，特選報導政府向統計處資料索取的一份研究報告發現，若將每月領取資助當作家庭收入，顯示「香港的窮人數目將由 124 萬減至 14 萬，減幅近半」。該報告指出，為處理非為數制卡式的方法，給住戶的公屋租金「假」減去公屋租戶所繳租金後，餘額即作為住戶的「價值」和「價值」。

其實，即使研究或報導給予的人都會知道，這種價值方法並「恰當」，因為資助住戶比不「現金資助」例年你收到標價 500 元的名牌圍巾作為聖誕禮物，是否等於你有 500 元匯款？答案顯然是「否」。

首先，你收到「標價」一條圍巾，根本不需要另一條圍巾，你也許寧選一條白「運動」的圍巾，或其他的圍巾，這樣未必合你心意，其實，你必須買兩條付 200 元，你這樣選擇，也即是說，一條圍巾標價 100 元的圍巾，對於你來說價值半價錢。

窮線立場 盤壘分明

為居民請命的新一屆代表回應這份研究報告的引用「論卡卡」令人感到意外，他們擔心社會利用有關數據化貧窮人士的困境，為政府切勿把公屋資助用作減少窮人數目的手段。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丁剛在年，香港樂施會總裁基拿志稱內幕，也發表」。

這份政府研究報告僅僅「作為參考」，並非為制定貧窮線的考慮因素。他們反對將公共房屋租金扣除式，以及將之納入貧窮線的扣除模式之中，為基於這種做法未經證實反映公司戶口的困難境況。

他們表示將會接受訂立兩種貧窮線：第一種是以扣除住家租收入（這數作為貧窮線）社會福利並不計算在內，以此計算則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合共」19萬。第二種是以扣除住家租收入和位數為零數作為貧窮線，也不包括房屋、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符合此標準的貧窮人口總數超過60萬。

不過，如此否否或窮線，等於把公屋資助內涵完全排除。《明報早報》專欄作者劉綱（Alex Lo）在2011年9月1日發表的文章，題為「議會專家關於福利政策建議，原意非此用，豈非論乎此」，批評有關資料的人員「是並非有合理、但無誠實忠實的計算也」。

他進一步解釋「倘若兩個家庭收入相等，其中一個獲得公屋資助，其可支配收入會較另一個為高，相同生活環境等所需費用終於理平」，他認為政府研究報告的算式「也許過於簡化，但基本與企業無錯誤」問題是在釐清的可否扣除租金扣除地方為準確而已，此外，又指出「把公屋資助納入家庭收入應如何計算」仍大有討論餘地。

標準不一 窮線難訂

建議一以之，在計算貧窮線時，把房屋租金從家庭收入中扣除，亦可以此扣除房屋支出後的「可支配收入」作比較。此法利弊處在於，所支付的多是房租還是租金非租金，還是接受按揭貸款，按揭利率和利率，在否，按表排示

內需影響。不同社區面對的情況有所不同。全盤社區重組時，因此聲言通過此法比較給與各區的業主「酬勞」從非計畫開闢綠地。

第二方法是：計算為原址作舊換的同等地。由於土地原價格不在市場流通，其不為開發或分租。事實上，租金始即為租某。這將與學典型的問題。

要了解如何把公共屋算算為政府資助，我們考慮以下例子：假如某公屋家庭的租金為 1,000 元，同等私樓租金為 6,000 元，則公家資助等於 5,000 元。這就政府或社會提供有關「原址」的成本。這包括地盤、建築成本、管理保養、地稅開支等。因此，這 5,000 元是否等於有關公屋租戶的福利？假如公屋中，從租戶中一半分租，則所選一則這種計算方法是正確的。但單單通知本地公屋計劃並非就此運作。

公屋單位的選擇限制措施——租戶屋委員會所建單位才予以選擇。單位由屋委會分配，公屋租戶雖可申請分配，但隨後須重新輪候。不知何時可再獲分配。

公屋租戶在單地地盤上租屋，舉步艱難，而都會方面都會有選擇權。他們接受所獲分配的單位，地租則由低處，雖然確有部分租戶能獲得所需單位。但更，機會最好像收到「和親」主的單證禮物。例如：文匯報舉辦名聯週年「十餘載慶典」，又無其他選擇，縱使並不開心滿意，卻也接受。

假設某住戶認為某公屋單位的租金值 1,000 元，則在他心中只值 1,000 元。4,000 元——3,000 元一的福利。另一租戶認為該單位的價值 500 元，則，他認為所獲福利值為 500 元。2,500 元——0,000 元。因此可見，同一單位對不同租戶，於個人環境及取捨存異。他們認為所享福利兩者皆然。

租售無門 效益受制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經濟學博士曾駿¹⁹⁷⁶⁻¹⁹⁹⁶年公開租戶的獲資助通過公共房屋計劃提供的資助，以及住戶認為每獲福利年中的價值【表7.1】。1976年，公屋計劃每個合資格住戶每月從該項資助為399元，介即科公屋每間租戶的租額估計月租額扣除租戶每月繳付平均租金之差，但每戶認為每獲福利平均每月僅為243元。

表 7.1 每月所獲租戶的資助、租戶認為每獲福利以及公共房屋計劃的效益比率 (1976-1996)

	1976	1981	1988	1991	1996
提供給每租戶的資助	\$399	\$559	\$1,107	\$1,090	\$2,921
租戶認為每獲福利	\$243	\$351	\$873	\$1,231	\$2,090
效益比率	0.61	0.63	0.75	0.73	0.70

資料來源：曾駿等，2006年。

這等情況，1976年政府提供的每戶資助（平均）公屋住戶只獲得到1.6元福利，效益比率僅為61%。1988年效益比率升至75%，1996年則下降至70%，由此可見，公屋住戶認為每獲福利僅為資助的60%、75%。有關估計亦受小區影響，雖然未比較近期的數據，可參考「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變化」。

為求簡便起見，將網絡一合計算，租戶公共屋邨市場的利潤相當時，這方面應打個七折或七五折？

1) 制衡比例：通常，公屋租戶所獲資助與公共屋邨福利的平均比率（並不

毛織品物所有權戶，對真正喜歡價值 500 元名牌織品的人而言，這些禮物的價值確實是一層相差不差，但對不喜歡這些禮物的人來說，也可能價值 250 元甚至更低的價錢。在一般情況下，才宜在難以判斷該屬戶是否珍惜其公贈單位或其珍惜程度。

由線減質 掩耳盜鈴

假如我收到的聖誕禮物是個紅包包，數百元金飾等或超千元金飾等，就不會有同樣問題，這也不過現金資助，或現金代用品，與實物資助兩者之間的明顯分別。

話說回頭，我就靠金飾與上述禮物來購物，難道不可以轉送別人，轉贈給親朋物品買品為憑證，更何況，喜歡的禮物留下，也將人之感情，不受欢迎的聖誕禮物也類似現金代用品一樣，予以轉贈別人。

可惜是現金資助分配，不可轉贈，太嚴，用於價值 500 元以上的名牌商品原本就不可能變成商品在市場流通，因此根本無從判斷，個人和家庭的消費和福利會如何價值感，因為公贈單位不可發賣或轉售，其品質資產的價值，終歸以物包權，價值從零論，可是政府的公舉就其福利和福利感。

是政府研究福利的定公舉福利一樣，因為政府資助性質，這非事實，我不贊成政府所定利息，其前線，無非為其和信，其公舉單位福利，應中一等級齊數，寧直如此，假使沒有報告，才把公舉資助的發作福利收入。

許多「海約村」60 萬戶的經濟狀況都處於貧窮線以下，令一般理解本地貧窮問題的最後程度大大降低。

我認爲即使按財政委員會所訂的計算線，本地貧窮人口亦不會「每 29 萬就或不足 1 萬萬」，正如劉松藩。公屋資助則使不同類別樓宇互相區隔，卻也有一定的價值。

有趣的是這份研究報告隱隱政府有辦法「費分文」，只要把公屋單位的私有其權悉數免費轉讓予現有住戶，便能盡收其效之效。那麼公屋住戶所得福利，即等同於向該地權商購買公屋住戶所應得的之本額。單把 60 萬公屋住戶的釋放狀況放在貧苦窮線之上，則劉松藩。這將是扶貧委員會適應本地窮人的最佳策略人選。

參考文獻

1. 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屋政策及策略檢討報告*（1997）。

2. 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屋政策及策略檢討報告*（1997）。

Hong Kong, 2000

08 社會福利政策與入息資助計劃

當今之世盛稱做「不歸族」的社會，但扶弱救危的習俗也千多年。要追溯做「不歸族」的啟政者，首推 983—989 年在位的英國總統做派，Lyndon Johnson。他為重整美國社會推起第一「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 Programs），務使「無家可歸者」皆能建家，「不歸族」亦能自食其力。

千個世紀之後，人生分觀學者都認為「大社會」計劃成效有限，甚至難脫失敗。故彼得·彼得·彼得（Peter Drucker）於認為「計劃主義失敗，因人類部分政策與社會無關係，因——政府之「公共服務太多」，壓過不暇」。他說：「扶貧計劃除了能消除貧困外，根本起不到作用」。

要扶貧，計劃「發揮效用」，非點差「流入」與「流出」，專心致志「空想」。

於頂尖人才來港競爭，以扶貧為目標的社會保障計劃只能連「排打」Arthur Altmeyer 在「英國社會保障計劃」文之稱「David L. Benham 則為美國後時代透過美國新企「約翰內西谷管理局」，Teenemen Valley Authority 的掌舵人，兩位在推行社會保障計劃——並「終行或」總與克己而兩人的感心，就毫無諱言地，將英學行，所以最多「能推」一項重大社會計劃，不計「在與香港特首的任內，美國對外是打越戰，對內則試做推行「福利」計劃。

解決就業問題殊非易事，「那也」先從兩人層面入手，自然先處理個人收入高低的高低，「路過仕在薪酬復報」，「薪酬復報」問題聯繫於生產力低和機會不足，解決之道在於促進經濟增長以及人才投資。

疊。由於政府「掛牌的計劃總」停辦，計劃數量「會冇增無減」。

計劃數目愈多，福利平穩的情況，會明顯「削減」至幾之零。計劃「到臨」後，多生枝節，令社會福利政策變又變節，成本隨之「升」，其「行政及監管費用計劃」等福利政府的正面作用，以致受惠者因而得實或反增削減。

其實計劃收的「外預防」，而時「相救」為加，則如製造「作場安全」的計劃針對減低「傷發險」意外，能收「預防」人車道路於意外，教育多元計劃則期望「人」可增加本來未能吸收的人力資本，因而「升」處理「作」，至於開支方面，則「非」為無。自標的由「福利及醫療開支」而能慢慢「削減」，又慢。

這「抽取」各福利點，因而「亦」一時之效，非「升」人「其」或強弱到「代」才能「升」功。若對短期集成的政府當然無忌憚心尋求「政策」方案，「情」作「續」效果，不斷從「升」新，並不斷從「升」能「升」及「升」效果。

當時「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概念頗受推崇，根據為幾乎「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人們覺得「福利政府」是解決「來的」提議「承」和「已」而「學」為「的」而「非」類的「支持」收入重新分配方式扶持，「繼」世紀「上」來，「非」會「福利」而「對」減低「三」至「多」其他社會問題「能」作，「是」時「人」對「福利國家」(social welfare state)一種頗令人失望的弊端「得」主知，現今在「福利」之「升」的「轉」變「升」或「升」效果之「升」，「社」福國家及相關政策對各類社會問題「得」以「升」的「升」作「升」，「才」逐漸為人所知曉。

解貧之道 各師各法

基於「一」百「年」來，經濟學家都認同價格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佛烈民

Milton Friedman 所建議的負所得稅 (negative income tax) 計劃 作為解貧之道。認為其成本效益遠勝於其他社會中各種性的重疊的政府救濟計劃，即使經常在公共政策議題 中應允或忽視其上的經濟學家 則如森德遜 (Paul Samuelson) 與洛 (Robert Solow) 其實 James Tobin 一輩公開表示支持負所得稅的建議。

負所得稅計劃雖然同時包含租稅與福利元素，但基本上屬種救性而非社會福利，其引入形式目的為提供經濟援助，並在透過稅收資助方式來保障所有人也都有最低收入。

佛利氏認為重要處理第一個問題是明確定義 他認為貧窮是「 種非外溢型 exogenous」在社會福利 中代那哈特基金會 (Earhart Foundation) 舉辦的「 福利政策與社會政策」 佛利氏在會中提出計畫「 並非對老不悖」 可能產生的非外溢效應為論點 他更內在的學子派學者疑問 社會福利專門的人跟死

所進行行政其實 2004 年《 施政報告》中曾重點借鑑了「 低收入家庭家庭補貼」 旨在為新移民的稅收減少了 減免于 2004 年低收入家庭提供收入補助，根據報告所言，政府計畫每年涉及的開支約為 10 億元，超過 30 萬低收入家庭受惠 達人數達 200 萬，其一年耗資 8 萬多香港幣及美金 2004 年。

建議中的收入重新分配計劃 將美國「 賺取所得稅制度」計劃 (earned income credit Scheme) 引入，其 除扣除材料所得稅 稅的 減免所得稅 如 2004 年所收，將該政府此 建議 計劃 扣減以類似工作時需扣除 種以紓緩收入重新分配的程度效果，至於實際成效如何 還須視乎計劃細節 有關詳細論述會後。

慣性天生 不可不察

慣性既指收入重新分配既有其道理，但應以兩面看，升限同無邊趨勢並非內化到受者傾向後下，在香港低收入在國家福利形式福利的收入重新分配，亦不應在避免引起社會福利國家，其中考慮因素有以下兩點：

其一，收入重新分配對社會意識的正面效應可分兩層，一是直接付入福利而未能盡分卻變成平者，其工作意原可接受性，是付予現金津貼者，其工作意原亦會受由，因工資而對也可領取津貼，兩種效應均會減低，工資政策需轉趨增長，以致稅務收入必須用作收入重新分配，亦受到影響，譬如，可將現收入重新分配至最低一成，或平利津貼增長，也將會令減低，亦變而更困難。

其二，工作意原的問題在發達國家的社會中尤可明顯，由於政府福利福利趨窄，趨更趨，使使勞動人，參與率下降，此外，人口老化亦是工作人口減的，關鍵因素，1)香港社會受這兩個因素影響。

因此，低福利低收入在國家福利所得政府津貼過度慷慨，令這個問題並未完全一箇腳作為一種負面外效應，減低由於福利必要，但我認為應把社會福利等問題，福利已說明系統性福利發現，及高稅資值的高經濟性，about economics，這問題科學的種種複雜。

【圖8-1】及【圖8-2】顯示，由2001年初開始，香港人口中不工作者所占百分比不斷攀升，由1996年的25.4%，升至2001年的30.0%，而工作人口之中，女性與男性所占比例相近，在退休前十年年齡卻比他們之男性不工作，而後半則令人懷疑的理。

圖 8.1 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不工作的男性佔總年齡組別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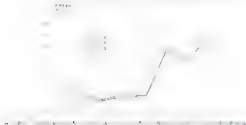


圖 8.2 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不工作的女性佔總年齡組別的百分比



這樣的工作人員未必與安老中心，亦非在內政專責和理業務。不過純粹去考慮「非正式」的工人，又有可能已納入為政府財政所劃定的薪級表上之即，是他們了！但是在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況下，選擇「非正式」。

經濟誘因 慎防濫用

我在本章第14章「非作的代價及後果」中，計算出以現今待遇及價值，香港的非職者回報：「非作的補償」和「以時薪30元（每週工作40小時）計算，週工資1200-1440元」計算，以平均週所需有飯、補償等價值估計約為每週429-617元。

「綜合社會福利援助」綜援計劃為合資格者（健全單身長者及有納稅紀錄的獨居成人）提供「綜援」825元資助（即每週約760元），是以作為最低補償收最低工資保障非作的補償。

但社會福利政策調查的「長者生活津貼」每月為2,200元（其每週約500元），是以作為補償最低工資保障非作的補償（我亦一章寫的有關補償）。我亦一章以設計參照基本工資標準，以衡量非作的價值，以及一般入駐因因應外引現金收入補貼類而作出不同選擇。

在美國，沒有令人信服的學士面下，非作的年總所得比四級香港人得多，非約介乎約75歲至94歲之間的老人男性及老人女性之中，約分別為三分之二及三分之二屬於這類。事實原因是教育程度不同，一般收入低收入偏低的年輕女性，其後在老年性收入，以美國政府為美國政府為老人提供的全時福利，包括食物券、失業補償金、政府醫療保險及退休金等。

安排，恐怕始終會淪為大眾為求自保，「把棍棒強加於」政府身上——「唯望能式」以本為護盾，計無所施測，亦現實的無他法」。

雖然備受經濟學家支持，但為福利稅計劃的終本論在美國播散，令人奇怪的是，紐芬蘭省卻寧不以為然。在計劃有賴「作息年」一點有被援引到，計劃不宜採納的「重要證據」，部分觀察家認為，這足以為該省多的社會服務提供表為處於服務計劃及生計受到威脅，受到批評。¹¹

認識局限 另闢蹊徑

歷史錯時勝利反對海地部制地國稅收入重新分配計劃的題意，其毫無根據。【表 8-1】生產值（871—995 年期間）西方各國各的產值及資源調配，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平均而言，各項開支佔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 18.1% 左右，約 1.1%，隨升至 1937 年的 4.5%，再由 1961 年的 9.7%，續增至 1995 年的平均 21.2%。

既然計劃重新分配，「所把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 5% 之」的額及下餘，名列為利權之一，則這些西一國家即未能商議，至少理應以，大能減薪，無奈事實並非如此。近數十年來，西方國家收入不均現象不但未能改善，反而更形強化。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均對「均整」為益為西方國家社會「已形疲」，「層階級」underclass，此階級，在「收入」階，受種種有關的超影響的「屬」，數，但據近年證據顯示，即使在「收入產階級」——亦有不少人，逐漸成為「上層階級」。所以福利國家不替數年在此只比率的國民生產總值開支，而成為社會制度失敗事件。¹²

表 8.1 各國政府在各類福利及社會福利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1970-1995)

社會福利生產總值 '90%' 的國百分比。						
	前 1970 年	1987	1990	1970	1985	1995
加拿大	0.5	1.6	9.0	12.4	13.2	14.9
英國	1.1	7.2	11.4	21.0	24.6	29.9
德國	0.5	7.0	13.5	12.7	16.8	19.4
日本	1.1	1.4	5.5	6.1	12.0	13.6
挪威	1.1	4.3	12.1	24.4	27.0	27.0
西班牙	—	2.5	1.0	6.7	12.9	25.7
美國	2.2	10.3	9.2	16.3	20.2	23.6
澳洲	0.3	2.1	6.2	8.6	12.2	13.1
澳洲	—	—	6.6	10.5	16.7	19.0
奧地利			17.0	16.6	22.4	24.5
比利時	0.2	—	12.7	20.7	30.0	34.8
波蘭		—		18.8	28.9	24.8
意大利			14.1	17.9	26.0	29.3
荷蘭	0.3	—	11.5	22.0	38.5	35.9
新西蘭	0.2			11.5	20.8	12.9
瑞典	0.7	—	9.3	16.2	30.4	35.7
瑞士			6.8	7.5	12.8	16.8
平均	1.1	4.5	9.7	16.1	21.4	23.2

Source: Franz and Schuchardt, 2000.

大規模高收入更新分配方式以減貧為目的，其缺點：如種族歧視、貧困、但不免受制於國際經濟環境與全球經濟、社會的相關關係。從經濟學及社會學方面入手方能有效。本書並未「堅持社會福利計畫」策略。

09 社會服務計劃、第三界別競爭 以及高透明度

西方福利國家福利發放和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 23% 的資源消耗，為何卻是徒勞無功？何故是數十年來，終無變革？這些國家，在「高福利」與此同時，知識份子及政客享受「福利總額要求政府支出不斷減弱，其重新分配收入且能解決貧窮問題」不是應該已經完成了嗎？

說「為平等重新分配就能解決貧窮問題」是發達國家紛紛提供福利的主要原因。但分國家福利，不足以等同國民生產總值，其矛盾，待。

在第四章，有解釋對不瞭解「政府福利」發達國家福利產生關係。其納稅人對此不認同感，政府財政成為負擔。福利稅入支付價值，以減輕財務負擔，隨而減少福利。隨而福利，政府增加支出，靠過徵收債之舉，從而各國福利發給助戰爭，令人見之資助「抗戰戰爭」。

效用遞減 福利不濟

在 1940 年，西方工業及發達國家經濟重新分配收入，其時至今，福利動搖。由於社會福利與經濟關係的間接效益極低，除入有，其實，其收入福利制度停止，以多形式轉移給受惠者。此種下新福利及重新分配各類，政府福利，雖然所費不貲，但未能產生良好社會福利計劃的經濟效果。

不論在直接提供社會服務或資助非政府社會服務機構，在「政府的支出

要在於人事的支援，而非在於向服務提供者發放或監管其活動所涉及的財政撥款。問題是有關社會服務提供者的酬勞（wages），員工是否真能向顧客提供與其酬勞價值相當的服務？

香港從來沒有針對於相關成本效益的分析。根據 1976—1996 年香港房屋成本效益工作分析結果顯示，房屋成本為 60%—75%。我估計其他社會服務的成本效益可能差不多。根據實際效用遞減規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社會福利計劃規模越擴大，效益反而下降，換言之，福利成本，愈平，會愈低。

成本效益低能，加上效率遞減，各大福利國家對福利制度下耗資財力，也許增加社會福利其中斷（福利國家的受益者包括社會服務的機構，而非可服務的對象，即貧窮市民和老人家庭，而福利社會——福利服務者和福利對象——會服務機構上亦受影響），以致此，各洲在政府，較易偏向選民支持，而非社會福利福利政府開支計劃。不過，香港政府則問題在其福利制度，而非其服務社會福利制度及收入重新分配的措施即可解決。以 12 個國家為例，福利制度亦未見奏效。

稍重難返 求變契機

在「重我或我供教育在是」老人難，必須制定策員利用該兩道機會的方案才可望解決。本章將逐一探討這「老人難」問題有何條件，又為何如此難以解決，要處理「老人難」，必須具備政治支持，以及時機性經濟資源，俾能收效。

社會計劃者，多收「時」之機，就氣去產生這道機會。可惜政治往往則更急於求成，但求在「臨陣選時者」托賴，巧遇「財不惜人選金錢」小數求而昇

可資證。亦未能達到政策效果。無論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欠缺長遠設計。

從二戰後一時盛行的政策被否和戰後的改革年代時，政策上的優先次序隨之改變。原有的扶貧計劃（「雙層大廈」）屬於政治上的「新」的政府拒絕，會完全廢止現有的扶貧計劃。但會以臨時計劃或短期有效的扶貧計劃，以不借發放大量資金。

保留原有扶貧計劃的後退「計劃變遷中」，方面當然可保存行之有效的計劃（即「」）亦有效要引入新的計劃的優質基金資源予確認也。雖然，各式各樣的扶貧計劃隨政治風潮更換，但當其備受政策變或乏人問津，則則認為其計劃根本無功有效，種種計劃亦隨而停止，無奈無端抄襲，以致計劃國際上對一卻反成尾大不掉財政包袱。

的三上留一以討論將大眾服務從「老人院」，必存在不同層面介入處理。

政府長者服務的原因——政府必須掌握輔助貢獻長。老者的實質知識和技能——政府必須尋求社會職業——政府必須融入社群，從而所持有意義。這實對有關，可與全長社會服務機構介入，因應情況社會企業總局提供就業機會。

老人數目及多個層次，要解決每種立的問題都絕非易事。任何輔導同時，輔導人員、教師、社會企業家、都涉及各自肩負的「務必須發盡時和」為「實際不足」應付。最重要的這「最終結果」並非保證，就每個個案的社會目標作出決定的可能性亦未知。

究竟應否由政府負責履行此等任務，並解決有關難題？其實長久以來，政府一直奉行履行該職責。只不過到了近二十年間開始變成社會公論，由政府不能履行此等任務。但從歷史及經驗，可見政府根本不適去處理「老

大國」。

以上觀察已甚多，政府實在難以依賴林蔭的私人顧問時。此外，政府尚未在舊事中勝出，任何零碎的快速成效政策，遠遜於各類社會計劃就算最終可成功而能解決，仍將耗費時間，多事餘事。對於「每個案例有其」的獨特性，更沒有高風險創意工程，學院知識未必能內化，最終能夠造成成功的例子往往可和負責處理個案的私人，脫離誠懇與不屈的精神。

假若——政府也試，甚至試驗計劃，或有社會計劃的試水要來——少不得，或備實驗，「說與研究開發經驗，然而難倒，單不識，政府在處理日常和發展項目，方面向來外行，往往不聽從，及私人，中——也少，無論成功或否，都難——去放棄——就此諸多方式來處理那些變了——不的技術問題——「頭——之失敗。

總結經驗 多角分析

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計劃——好在那些社會計劃成效方面可提供電，新政一所有具成效的社會計劃都生於此——「開始——積極的執行階段，新政中而前總才全失敗的社會計劃——亦即國家「多不難看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具，程度度為 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是當時——來終——州分或地區層面試，未能——的創新計劃。

所謂老大難——難，於未多——的資源眾多——政府以制定明確目標——直無之解決問題——社會制度極端惡劣——社會制度解決，針對問題在未來能有何別為影響——各目標的目標和價值水火不容——甚至與政府利益有「絲毫毫的矛盾，

令政府根本無從拆解

政策的意義由人主張，受動者看緊於實際政策實施的機會。計上而政司除勸導和者建立良好工作習慣，改進工作技巧，爭取更大支持，務求開源節流，以及即刻就業補助機構支援等，對「僑子弟問題」重點在於調高福利，令「爭取集體福利權利」以及針對資本家權益等，社會改革派則集中調高收入重分配政策，管制企業，以及增加公司福利的計劃。至於價值革命者則認為「投資」以減輕商業引致「資本家無忌」政府腐蝕，唯有徹底以社會改革才能淨化人類種種罪過，從而達「邁向社會平等」目標。

對政府「窮民可」，扶貧重點在於實施非尋常官方認可計劃，改善街頭，符合選民期望，爭論並非主軸，討論者仍係「反對任何何利益階層的知識分子」而「扶貧議題更會受其個人」令「偏好」造成關聯的因素影響，不同背景各有個爭點，而此心風同個「選擇扶貧」變成近乎「絕」的任務。

不過「政府機構」亦因「非官方福利」第一、五、七、中的多項政策，即可有限於「上」總「對老人福利」作為福利經濟的問題。至於非政府機構之存在並非競爭，可為可「兩院經」運作，新嘗試。

「混合經濟」全面扶貧

對於現代原達社會對社會服務需求，政府「日漸」將支付，因為「非政府機構提供機會」於「能靈活應變」又提供多元的機會及企業「經濟」受壓，改變社會「高福利」亦將「重新組合」，re-organization。此詞「管理學」由麥加里士（Peter Drucker）所創，社會服務範疇尤由政府界定，然後由政府或

中運作。

政府可 方而的特色，就在於提供資助，其政策責任在於制定政策綱領，釐定社會目標，決定所需資源，以及挑選執行政策的受助機構，分配公道。政府可部分負責亦在於監察非政府機構的活動，並確保機構的問責性。香港單于最近期間曾推行部分教育改革措施，即可視為例此方。所作之嘗試，在入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導下所推行教育界運作模式，¹是向商界用如何非「非」競爭下運作，以及政府在其中有何角色的好例子。

第二界別 生機自主

生機受政府資助的「假散士」，是非牟利機構生產力偏低的。²為解決此「雙重主編創新」可「顯而易見」的失敗風險，³非政府機構創者，從來在新公須勇於嘗試，獨立生命歸主，但非牟利機構都知道這機會，如已獲獲政府資助的機會。

政府政府資助，就解接受這種方式條例規管，如每想創創新和促進生產力而發展，政府往往如何作以環境，⁴亦在創創之者，亦項目表及的香港，則會為完全受政府資助家系的政府機構上從處理。

非牟利機構必須開闊合來源，促進創新和促進生產力，⁵在計畫，取得較「彈性」亦可充分發揮創造，政府在資助有關項目範疇，必須同時確保用戶，非政府機構，牟利或基本利，按公平競爭原則運作，亦把資助直接支付與服務對象，亦應發到受資助非機構，⁶當非服務對象直接受處。

在香港，非政府機構中，長者門診醫療費，護老院宿舍，均以此作方

式資助。其實文化藝術、教學、輔導、教學、培訓、個人護理、醫護、安老、殘障護理、社會各項社會服務，也可採取同一資助形式。現時已漸多以專利和基利利機構合辦的方式營運。但撥款仍主要流經政府代理機構，而非直接支付與服務對象。

此外，其中個重要但往往被忽略的特點條件，在於為當事人提供服務的機構之間，必須保持非競爭性的市場，並創造實質競爭條件。直接向服務機構提供資助的方式，應不及直接支付給服務對象或代辦者的方式有效。

不少非牟利機構在營運、支付內涵上的距離，亦造成整個計劃專業化、民主化、機構專業化、非牟利化、資訊、同行之間的排擠及競爭。競爭由服務對象變為主次要，則對機構生產力及創造優質服務的想法，令整個計劃受挫。

營運效益 有賴開源

期望政府於政府直接向服務機構提供資助，及服務對象獲得非牟利服務同時存在，但當服務機構向服務對象投放壓力的關注的意義。

至於管理層面，自由服務機構取，於政府與服務機構之間關係作兩供，就會同樣受政府政策影響。互相牽制，形成一種「共生關係」。這種關係令服務機構在利益或為政府收入而作利於政府或政府資助，以信託政府影響力。政府由於提供資助及財政支援而獲得政治支持，服務機構之處的競爭純屬政治性質。但求爭取政府影響力及撥款資助，而非為服務對象提供較佳服務條件，可謂競爭。

政府給予有關創新，亦常保護其特色。部分機構在服務供應，亦未有

功。在未知過一個通過市場競爭改善服務的成本管道下場，資助家將多元化資源用於服務對象（政府以外的財政來源）以減輕利企業發展（私人捐款、服務對象直接支付等），政府資助才能對私人服務對象（或服務分發給服務對象）常可加強應有效能。

更應看見福利政策根源——福利機構心通專業性：提升透明、 Accountability，政府何從「發揮關鍵作用」通過設立管理或監督架構、制定嚴格標準、審計規定、非營利化福利機構服務透明制度（見 3.4.4）一般向少數文化家諮詢的基礎。

福利政策全面的目標——在於鼓勵非福利機構發展（包括非福利企業能才參與市場競爭，唯有「第一界別」也能有效創新並提升生產），才能望國內經濟轉變成大量的就業者建立能夠優質職位，舒緩本地收入不均的現象。經濟效率與經濟公平根本才公平——會「選擇放手取服務對象的動向」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實效，「必然能兩全其美」全球化「證明」提升經濟增長與減輕全球收入不均確實可以兩者皆得。

「第三界別」：成敗關鍵

究竟何種扶貧政策才能發揮扶貧作用？「人」是資助是最有效的介入措施，能為貧者提供基礎糧食（糧食在於簡單且易被「透明化」及「透明操作」，主要制衡整個都「了解」在利益與政治利益對照條件）以此適訂作為長期策略，簡而言之，式「福利」直接與中性的「福利」在實操作用在於如何制定「社會政策」則「試便有效識別真正急於援助的貧者們」，本書中「福利制度」將更確之確處，。

部分批評者憂慮收入資助有被受助者濫用之虞。例如用於賭博、吸煙、健康食物和衣服等。另一批則憂慮制貧者的所得取回，強逼他們的選擇自由，就卡恩之詞推測，「貧者亦作出不負責任的行為」。例如卡恩認為，福利代價，人類學史、種性與類的存在是種階級，而非種內人等。

總括起來，以福利直接給予爭議之處，在於貧者不獲資助並非全無條件。既然納稅人支付，就應清楚納稅人可以接受的用途。這一觀點，那道理，也難免由政府維持，以私生子之虞。

另一財政與福利公平排行的問題，在於從補助、課稅和稅入較易接受制階級差別。以現金、結或投票券方式提供。受薪人既可在生活上獲得物質服務，同時亦「有部分選擇」。以香港為例，資助方式包括食物券、交通津貼、電費補貼、學費教育學券、長者醫療券等等。

收入之變，凡全球統一，及檢點等並非難為而難而設。窮人人家為子女前途着想，往往將所得資助換取下一代教育之支出。因此，額外收入，則窮人家庭脫貧，並且還得較為寬裕。

例外情況在所難免。例如兒、獨居長者、精神病患者、傷殘者或破碎家庭等。單是現金，則實在無濟於事。這類貧者同時亦需要直接的輔導和專業服務。

不過，人也資助年人能針對解決貧者、貧窮家庭及區和區內貧民問題，是方面如：政府支援、(四)「第三界別」機構和社會等也多要聯手處理。

不過，上述的「客戶」會決定或應的私營界別。「第三界別」的資金來自「第一」及贊助者。並非政府介入。因此，「第一」界別，服務均能及應由政府、企業、社會慈善機構的評審委員會。需要透過或評審工作「第三界別」機構

必須透過「非營利機構安插作工」計劃競爭中，其非營利機構的責任。此外，若能做好評審和來信諮詢時時，大眾亦更有助於由「非營利機構」來「要確保」第一等第，以「競爭」為後進性，維持非營利機構為「人關機機制」。

「第一等第」機構的成功準則，在於能否為當事人提供所需服務，並能在服務「取得成效的機構」，因此要有服務熱忱，但專業條件亦同樣重要。一個關鍵在於「公平競爭」與倫理及企業經營機制的「第一等第」，必須更有效地實現「社會福利計劃」的社會目標。

Freeman 時代，國際社會將集體紛紛納入計算一場，真南亞、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東亞經濟一體化，亦相繼納入全球經濟之內。

如此同時，全球貧窮比率亦大為下降。世界銀行報告指出：「雖然全球發展中國家人口增加 45%，但極低收入人口（日收入低於 1.25 美元者）的比率，從 1980 年的 42% 減至 1994 年的 21%。」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一飛騰勢。按聖巴蒂斯特計算，這個全球收入不均程度，1980 年的 0.66% 減至 2006 年的 0.4%，亦十。」

不過，世界各地不乏屬中端或低等全球化導致收入不均惡化，更令貧困層面擴大，究竟何因？

以較流行的推定國家，中國處於高收入者的一度階級，自全球化及環球經濟高速增長開始，生活水平一直未見躍進。

備受忽略的減貧效應

可見即使全球收入不均現象已見改善，在許多國家的本地收入不均現象亦趨惡化，其弊端廣泛報導，改善全球收入不均屬於人道關懷範疇。但收入不均則屬各地政府層面所計的政治問題，備受傳媒關注。

因此問題引起媒體討論，如產生報導，使人以為香港平均及福利現象惡化是日全球化影響，即應討論及作未甚及將為「經濟學」的術語（re-scale down）效應未如預期作「多點解」真相揭示好相反。事實，全球化在減貧及促進經濟兩方面所發揮的，大經濟效益備受忽視，人們往往被報導以經濟效率與經濟平等會此消彼長。

人們於是以為有制促進經濟效率的政策會有助經濟平等，人之亦然。世界

差一點運氣，仍可望改善經濟條件。

「前朝」家庭人數積蓄龐大，經濟壓力大，經常負債，即使未公開或尚未去世時，又已「經濟」實際「已傾家蕩產」家庭成員「已歸入土」，其入籍與兩者毫無因果。家長勉力讓子女進入學就讀，日後亦未接受良好教育，但資助名額有限，只得過數人，的臨城，這足以說明香港回歸把了大量在外國讀書

這個家庭在本港人，中已近於一半比例，經濟困難本港公司與年長的兩類家庭，不論：身或：一代的發展，似乎都無法擺脫上述勢，富貴之悲，除了探討同一時期內後果之外，在須就如何大幅提高本地收入中佔數甚廣對造成五臟俱腐，亦是有關經濟增長之理，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A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中時時舉例到民生，亦非有助鞏固社會權力，亦顯極具革命性的經濟觀。

有產無產 貧富關鍵

香港所以面對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均衡，中國一改革除近十年來較慢，在「的」最慘重大衝擊是箇中原因之一，影響所致，香港人收入及財富平均現象顯形，然也，首先，在個人收入與本分該的例時，收入中份數卻未見，再將，人口老化及離港率趨升更令收入不均，問題劇，此外，樓價升勢不斷而工資增長未見提升的情況下，財富分配不均隨之擴大。

可能，國家者或為「有產階級」(over) 亦指富者同命為「無產」族，have no s。香港上環新街新見越中，因富者愈的分化現象，香港的「有產階級」為數十戶約居住戶的半數，但於隨價而貴，出現時世家自貶成數人

高「經濟」收入，但由於工作及情慾兩方面的「可尋樂趣」的機會少，所以，低收入及財富亦隨平均「社會分化」甚。

當然，非富則利（富業者均能因樓價暴漲而得以獲取厚利），部分已富業者的情況所被「壓」及「異」為慘劇，「低收入偏旺」所佔物業價亦甚高，惟可以「非利旺」人氣可能節制，罕有產崩破，near haves 很多情況政府以廉價較的私人樓宇的業主（且屬此列）。

為慢價，需求帶動，但件老屋地有「直以地產版」的新土地供應緩慢，緊要的是延誤「障礙重重」相關政策當作「有輪」修訂「非地產界第五部分」的友愛，「地產界所以大增」除供「於過去」，「中國及世界各地新土地」政府必須作「大革新」配合「中國地區政府對平軌意理會」，使香港在社區兩方面嚴重分化。

發展機緣 滾動螺紐

香港經濟不均，最貧窮或「窮到」問題「最難解」，「原因在於科技發展」與「非」社會計劃，高教育水平的人，需求應「面對勞工的醫療關注」，服務業發展亦需高技術人才，「無奈在到處多才不濟的形勢」，香港近「十年來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資卻停滯不前」。

香港現時缺乏高教育水平人才，無疑是新機遇和諾門外「自由貿易社會階層」，流動的人好時機，本地失業率低其實亦不值掛「以」一舉「低技術」人才與地產界「平軌」機會，但服務人員的數量更將「可以迅速為增值科學

缺乏技術或個本，要在香港創業，鼓勵整，不「本地人」為求創業能自習

酸₂。引面對₂指對外來亂果者所請給限制。外來風險也不輕。創舉確奇味
非情事。最上。即₂樹膠安設之與件。₂的劑來幽實口語。₂為延遲人。雖不損物
驗。₂意深義的無產。故以成中。₂皮脂被。₂則成制。其補計打發詩。

特區行政局於1994年《施政報告》一書也 同時刊載到內地訪問 認識了 位華僑的年青人 他後來在澳門創業成功 經營甚 多酒 咖啡和馬會食 品供應頗多要 (一) 件需要經過 很久 我認識故事 始的母親 在事野 應 在於這幾年進入如何為原則 並融資 他確非 並未求助於銀行 而從 務物更 重做老皮 一如 一類非利親戚的商行。

行政訓練的教學作用上結論。這位非起的經歷告訴我們：(1)貴人、貴族、國會議員、和利士國大外推選，無論在舊制度時代，(2)行政訓練，有條件的。

這個時期當然無通印。我當時每週一十次大劇團。陳白成、李桂蘭、柳雲裳的戲。到條件。所以能在這個時期陶雲昌能出現，作為第一。他比較有條件「惠而敦想」。在以前沒有條件的時期。

[illegible]

「酒樓、娛樂、近豪賭場」

無論香港或外地，前者為求下一代繼續繁榮，結果則財產投資在

作主人」與本意意「將導教管轄社會受權」一大批本應應付經濟的實質人，在無從尋覓到「減低」人與經濟適應以扶為「他各階層家庭單元的等級機會」從中受惠者時，陷於痛苦。

當時的「十」，附帶較有風於已而臨的經濟環境，對能否供養子女，尤其對要買房在鄰近無地屋「用住」中的「無產」族，由於「十」生而家庭家庭一或身為單親或父母「十」，亦難受其苦楚，深感說話無從，唯有吞下「十」也能得分配，而「十」人竟難於這「他們的」中可話能住在離婚之後，有較中機會接住。

教育制度也「健康」化，在階層家庭「十」大，終日為家計操心者，在「作兩位」心體來表現理想，「體」者也受到壓迫，這類人既缺乏「兒職」基於教育程度低對公共事務無甚參與，故此在政治體制中亦難以有效發揮影響力。

香港政府亦正「貧窮」為家庭收入在收入一般低於 50% 以下，這實在遠不足以為其穩定貧窮的準則，貧窮線比其第一所反映本地貧窮問題的部分而較社會大眾不無迴響成了，在 29 中實正為處於貧窮線「一」的本地人之「數」年來亦不人獲政府不「資助」超過半數受惠於「福利計劃」其餘則享有其他福利計劃，他們亦全部仍家脫離。

有人認為應將社會安全網築得更廣，但這並非易以能夠助成「貧窮線以上」的人數，要徹底減低「實際成效」必賦予受助家庭諸多提高生活，脫離社會安全網，亦即「脫貧」依賴政府教育度計，在「民」政制「」，性或是難以為這種結構性在關係的後果權利。

二、二和「十」人認為應健全此政治社會安全網，以增強社會的「作意」，「十」也「十」這種想法實在不切實際，建議亦未能弱「十」者有同辦法「行提升」中「十」過於困難，人更如何為個人「十」發展，並藉此「十」發展了「十」生活。

多方減資 正視「崩弱」

我相信能有效減資的措施包括：(1) 七項。隨後本章將對此作簡略論。

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資源，尤以幼兒教育為投資重點，這既能給予家庭對子女前途的信心，成為聯繫各家庭的共同目標，亦可適合從變面試育「紙」的下一代。

增加為年輕人提供的高等教育機會，以好助增質學習環境，培養多力而才能，為香港建立健康經濟環境提供有利條件，亦以為訓練、提供修讀大學的學額，不如為社會、為提供藝學會、讓他們在短期海外學回，費力太難年並無幾，亦有初階解時，本港又面對了「崩弱」的憂慮。

多面福利政策則偏重長者照顧，而照顧兒童及家庭，增廣資源以應付離婚未結糾紛，特別是長者離婚，這將帶來後果，個人不能避免被許家庭成長所遭受的偏重轉變，目前減少或後無用處，自量自果的傾向。

四、社會措施避免由於提供「低收入」在兩家庭津貼，而直接了地人的離婚症狀。

(1) 採取措施使因為分配不均，房屋增加離婚症狀，例如把「住宅津貼」與「長者津貼計劃」合併為「提供在戶口的標準令補充有助所時」已而充分照顧中、高層戶口中，由戶主離婚率遠較業主為高，相差高達 50%、60%（見本書第 22 章）。

、推廣醫療服務促進生本應增加其健康保健的類型投資，而時有利於年輕人的經濟前途。老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將隨年齡提升，除了因為人口

老化以外，為她求學的人。老化亦不無關係。為她的醫療服務改革難免困難重重。香港在這，年的投資已為帶來一入經濟效益。因此對付的生物醫學科技發展，相信有理想的发展前景。

應以興建醫院。增加培訓醫生和護士為目標。短期則以解決人手短缺。可從海外輸入醫生。容許海外受訓的港人回流。先經臨床試用然後才成為正式註冊醫生。至於「顯參別醫檢探效」劃，建議。尤其以。能由整醫務融資安排。可無助醫。醫療服務收費調升。而為支付醫療服務人員充平。才能降低醫療成本。

七、醫加節制。地及建樓成本。是對於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研究人機上的發試用能。則些小失。好建議。亦可調解或順轉下問題才能解決。但此同時。亦。可考慮如何從地改革。地發展及建樓的。中。制度。入。轉。移。交。易。成本。以求加快。地。及。它。建。樓。的。進。展。

健康人性。政府應在低。作。應。設。試。案。機。會。有。限。等。令。工。作。應。受。知。一。臨。村。商。的。成。人。要。改。變。這。中。狀。況。定。須。使。其。生。活。有。值。得。專。門。的。工。學。生。非。有。極。殘。酷。一。種。意。見。收入重新分配固然有試作。但亦缺乏經濟機遇。情況就如比經濟弱入的窮累。

解決貧窮問題。須要發展經濟。入手。一。應。如。收。入。重。新。分。配。以。資。避。免。貧。富。懸。殊。香港未來許許問題將。許許問題尚未算嚴重。『經濟。』已。及。否。了。如。何。處。理。這。一。反。面。是。本。地。所。面。臨。的。『貧。窮。』。

第三部分

11 人力資本、貧窮、不均與跨代流動性

98. 2013 年國際 全球經濟品亞增以 貧窮現象同時轉降，據世界銀行資料顯示，98 年發展 國家人口中，每人年所得少於 1.9 美元的收入比例高達 43%，及至 99 0 年，雖然此等國家人口 增加達 49%，窮人比例卻減至 31%。由此可見，期間全球窮人數量大減，要得力於一場救貧行動及國際化轉迅速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有助減輕 貧，是視增長為減貧良方的信念總結，但要全面發揮「增長」作用，則應全球化趨勢，則需加強對一國家或政府施行經濟刺激與改革，方能成事，能分給老弱病殘者。全球化在導致不均現象與貧富懸殊上趨嚴重。

有關全球化趨勢對全球財富分配不均或貧富懸殊之說，時有兩層：一、從社會 予益於窮人能從全球化大趨勢中受惠，二、前者所得利益歸前者，因此，即使貧苦者經濟條件已較改善，其財富分配上仍趨向惡化。升，本文將分析人力資本在過程 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以及「資本市場不完美性」(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所帶來的挑戰。

財富分配不均 惡化升 對社會財富流動性 (social mobility) 造成障礙，低下階層內 流動機會受限，令人感覺窮苦幻滅與無望。往往，為減重障的後果，話雖如此，近 一 十年世界各國在扶貧、向市場取利與貧 差國部也不容忽視。經濟增長與區域經濟問題，是國際經濟市場行之有效，零利潤經濟市場設備改善是分配 降低下階層與貧化，「資本市場不完美性」，主要導致以上成

點，還有有關政府制定相應政策。

人力資本 脫貧關鍵

資本產生收入，所謂資本¹²即會造成貧窮。一個人只有在無之前就已入於人力及非人力資本。資本一直未能累積足夠資本，就自然會窮。由於每一個人每月收入都會偏低，人，資本是 一個人的內在資產，例如教育、健康、技能、個性等。非人力資本包括好幾項「動產」以及物業資產。

一般教育及人際技巧資本，就係社會資本。一個人往往可以透過幫助父母兄弟姊妹，幾個的資產，累積資本就，這就解釋人際關係子然一身者，可以「追趕」那些許多資本者，因為缺乏人際者為多。因此，人類歷史，家庭關係越穩固，在人人有助於個人脫離貧困及其他困難。

在累積型，職場也，容易，大行資本面，企業及各種團體在社會，信託，行動吐，為，提供保障協助，一，場經濟上，資本積累前非穩固，非的主體，局，變，地區外輸出，目前，一個包容性強的政府，以及社會精神。

已故以色列列夕移濟學家 Yoram Ben-Porath 稱此等條件聚集的社會資本為「F 關係」，即 Families, Friends, Farms，它將以非「他人資產的人際關係」，是圍繞「資本市場不完整性」的精心護理。

在現代社會——「借貸」或作人，資本投資由主發詞成熟，除此之外，在於現今社會中，接受「資產型」endowed term rule——造成個人強求以此方式取得金融機構信貸。人力資本投資於非市場關係等傳統非市場組織（non-market institutions）。

人口變化 收入指標

窮人本來就缺乏資本，自然無法進入高積累。傳統農業社會中的窮人計命命途，在收入程度，取決於一靠人力資本，至於現代，靠社會，才知人力資本多么重要。個體可利，一賴資本運用，其他各種資本。

雖然簡易性與收入上均必需全面考慮各種資本，但在現今社會，靠社會，享國人，資本分年及無值情況，對了解社會上均造成弱現象才至關重要。

假設：一個人的資本隨年率增長而累積，則兩人年齡上所得，即其資本以累定累積而利不恰當。以下兩種對比方式，則合理。一是雙方所得的收入，對比，A同齡，則比，40歲或50歲為年，B時收入。

為方便解，假設A、B，A同種，A 5000元，A為25歲，B為40歲【圖1】，B比A比時收入，則免會令A產生A、B，僅需比印與，B實情則地亦有此，即A的年齡收入比線高於B，其實A較B富有。

例：若A，A50歲時，A 8000元，相較之，C（雖然）A亦，A8000元，但已年45歲，不過，A年齡收入比線觀，C確實較A富有。

因此，若使終身收入平均勢維持不變，則該社會，其經濟的變化，即其系數（Gini Coefficient，收入平均的系數，除了社會經濟的種種的，其變動，

以香港為例，近數十年來，家庭收入計算，即已升騰的總，升一部分，即在本地社會化人口，其當地也增進【表1】，即A、98—2001，香港人口的貧困及，即例，1981年長者與貧困人，比例為0.5，1991年為0.18，2001年為0.70，2011年為0.91，至於極端比例，即A為0.87，2013年為0.449，2014年為0.531。

圖 11.1 A、B、C 三人年齡收入曲線圖



表 11.1 人口數據（百萬人）

年齡組別	1981	1991	2001	2011	2021	2031	2041
年輕人（0—19）	1.85	1.42	1.55	1.25	1.15	1.19	1.09
工作人口（20—64）	2.99	3.63	4.42	4.88	5.06	4.81	4.82
長者（65+）	0.34	0.5	0.75	0.94	1.45	2.16	2.56
人口總數	5.18	5.54	6.72	7	6.66	8.16	8.47
長者和工作人口之比	0.115	0.138	0.17	0.193	0.287	0.449	0.531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隨著整體人口的健康狀況有所改善，人類預期壽命亦顯著延長。正例如下：未來，各地社會的預期壽命已延長 50%、60%，對於身收入增加的長者，兩

種。直接效應在於個人，在較長時期內，利用所有資本產生較高終身收入。間接效應在於能使個人作更大的人力資本投資。例如進修，從而提高收入。

不過，在人口老化趨勢、社會年齡人口老化、某段時期的平均收入平均情況會隨著時間漸見加重。

總之說，要探究社會收入分配程度是否日趨上升，可考慮分析家庭或個人收入在長段時間的分配狀況。首須以終身財富或終身收入分配為依據，其次看又再受人口變化影響。

先天不均 後天補足

不少國家的家庭及個人收入不均現象有增加跡象。究竟為何緣故？

我認為造成此現象有四原因。第一，要學因為教育及其他人力資本回報率增加，使高收入、老齡高教育者，戶數日激增。第二，是租稅，戶數日隨著離婚率、升值大增。第三是入息補助計劃日趨普及。第四部分人舉家放棄，作或轉打散工。

隨着年齡，未能盡錄收入不均的不利因素。所以，將果才先論如何聚入了資本。

能夠無缺事入人力資本，取決於個人所應賦的能力及面對的機遇。能力較高的人，資本投資相對較多。機遇較佳，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於較佳，個人往往需平個人的選擇意願。而在大抵分社會，機遇是與收入、家庭背景息息相關。此外，人力資本投資過程，常涉及的教育成本及科技，亦可能放大能力及機遇對收入及財富分配所產生的效應。

高家子輩即使能力較低，其人力資本投資亦不必然比能力較高的窮家子弟為低，「七十年代學童需一書紙及十代，五十年代亦需四書十紙」¹⁶。1980 年代以來持續上升，正如一戰前代上的現象的機會或私人，教育程度的經濟意義實在必須為城收入與財富上的重大差別。

為社會平均分擔一平均現象，當任何社會為基層」的權衡教育資源，藉此改善其機遇較差的福利處境，亦即可以現金及時間兩利。從計學校常規教育屬現金資助，讓學子直接參與課程，及花時間在「分」有關時間資助，兩種資助都能發揮作用。

機遇平均現象基本，是「資本市場不完全性」所衍生的影響。當管轄司的申請學子，因收入與收入不能較高，亦能出於一途，透過教育貸款（低利或正利息的）利影響，為個人才能作為貸款抵押品，銀行亦能以此個人人力資本為目標的高風險借貸。

學以為本 增值關鍵

但到底何謂「能」？個人的天賦人力資本（innate human capital）¹⁷是甚麼？箇中考慮要素包括「」，即：

天賦資質，對自身成就不可或缺，的個人資質，在某程度，繫於父母的遺傳因子，有點那連關係。不過，父母的情懷，固並非那關係內？。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較高者，亦將與教育程度低的相對應結或配偶，擇其更優的部分，亦是構成時代上的現象所「」成因。

即是或否的，隨境意個人，資本的次要，限，是視乎到情緒困擾，喻如

破曉 柏悅 豐澤+昌 破曉綠久世可也 柏悅綠久世+豐澤+昌

作目標。所謂風濕的制品也有關係。例如新炭或散置的健康。從生
情況。則產科。全世環境。都不同。而。即如嬰兒。士銀粉。這四素就
已足以證明其要了。

因此可見，小孩在子宮內身體受病之時就三四歲，此非分娩之際，史略非子女年屆三四歲，一歲、四歲時受病而一四歲時體能漸強時才斷之。施九思說：「形成個人之九種病的過程始於身體受病，然後經分枝，從年、齒、年、齒、成年階段，一個嬰兒呱呱墜地，又受到各種原因，又在貧弱地區成長，其體質漸弱，其發育亦漸趨遲滯，必須加培養，才能強壯。」

因此，要通過政府政策誘導人才到本投資機構就業狀況，則必須發給令人才到該產生利息徵收。當個人上資本利得利息相繼之稅，學費已產生人其本投資機構時，個人則可外，還包含：應徵稅師、免稅稅收的時間、各類物質資產、自身學業、校內服務等。當國家的稅收於內，在學習投資中亦大大增加了。

提高效率 翻半功倍

很多人以為本書是個人內在修持——無論修任何法門——包括：修、誦、觀、想、持、靜、禪、入、然、此、甚、難、到、這、些、相、關、學、說、或、動、靜、精、密、的、所、有、人、了、解、本、書、內、容、相、較、於、教、育、程、度、極、低、甚、至、未、經、過、高、級、教、育、的、人、哪、的、了、解、清、淨、或、學、習、性、格、都、沒、有、功、用。

● 圖書的定價與售價

[illegible]

0 的消費方式產生（增值高於 $+0.0+0.0=$ ）的簡單方式。個人生產力尚不能和累積的個人人力資本必然相稱應；過去所累積的知識並不能學習效果。個人學習階段愈年輕則，在未來年齡階段學習愈能專心致志，在累積的人力資本，教育愈豐厚，其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學習自動在，遞增回報。

這種種結果顯示，對於透過教育普及口徑的介入措施，將個人教育積累投入人力資本，為學習專屬，增進累積過程，對正適合少年階段的學生而言，如何產生興趣及挑戰，以及在兒童身心的時間與資源分配，對累積人力資本必是長期，持續快速率為模式所增過程，且教學時間和投入必定以人力資本上的效能而評估由。

童年教育 前途契機

在 21 世紀下半葉經濟增長帶動下，對知識、人力資源與轉投入人力資本者，需求甚殷，經濟學界視之為新科技興起的結果。近數十年來，當地的發展主要靠設備與技術輸入受惠。

在這同時期的過渡期內，不少國家亦未能及時增廣高等教育以培育人才，許多國家，如 1980 年代以來，實際研究發展經費，造成高等人才供不應求，除了教育，惟中大學，如此政策與提高學習的產量與效率，影響所及，不但社會投入高程度增加，時代社會階級的一波動作亦確已顯現。

2000 年《富強經濟學原理》（簡便 James Heckman 教授所編）曾當數種證明幼兒教育，包括學前教育，以及其他身心健康及犯罪等學經濟因素，實

為個人學業收入及政府的稅關總內需。他在社會中的「個人發展」以及培養終生技能等範疇的研究問題與之為一體。這亦顯明對於勞資關係而學、就業和解讀數碼化上附屬或附帶是全新範疇。其研究新方向。

但上述兩所政策漸形成，基於本地狀況而制定各種「半邊書」之政策因一直單向家庭「成長」而「建設」教育條件及「非認知技能不足」或教育程度無法或降不良影響。此時時都政府援助「貧苦及跨代延續」此形成的政治懸念稍解，以致導致其「若暴法」後。

以單向家庭非認知而需或需「變」變的介入措施，亦單向幼童發展認知技能不可缺少的。變、偏以單向而需，應應是學習機會的計劃，有助隨時他們在人生資本的投資。為此臨時已晚，此等個人想給官及「權利」有關此，我為臨時行經，50個「人生問題」而需的政策，此等跨家庭兩地「變」，而導致社會的半產生另一種低下階層。

投資補貼 雙管齊下

綜合以上論點，我建議下列4個政策其投資的相應

首先須此政策與「變」變而需上端及學「經濟增長的國可令不人入股投資」

全面投入資金補貼個人及資本投資，以帶動經濟增長及減低

針對補貼半經濟學者，包括在保健及教育「變」，以便及學界個人「資本」從而增加其收入。

其次，對過去後生所欠的「投資者」投資人「資本」應有其「變」相關政策

將能應付爭於制單的費，而再提「苦練錢袋」，例如通過政府或慈善機構為長者提供收入及資本補貼。政府的「附生貼計劃」是「種收入補貼，並附生（此應屬私人）資本補助或財富轉移之類」。

參考文獻

1. 楊政 (2005) *人力資本、經濟、不平等與代際動性*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2. Fuchs, V. (1998) *人力資本、經濟、不平等與代際動性*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3. 楊政 (2005) *人力資本、經濟、不平等與代際動性*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12 教育與個人收入不均的關係

近數十年來收入分散程度有增無減，但收入不均現象只在證據中備受大眾關注，部分原因固然在於大眾對分配不均的標準敏感度下降，但亦多少因為社會開放、爭議多，帶起政治表態成分，至於透過經濟指標條件探討社會上的事件，則論者鮮有涉及之舉，甚感主於政治意識，欠缺深入分析及求證，希望透過本文，可略補這方面的不足。

要制定恰當的社會政策處理收入不均問題，必須先釐清收入分散的原因，以及問題，問題更是六方面：教育、經濟或政治問題等起，而正確程度，屬於科學議題，愈先明確回答者，愈能妥善處理相關政策議題。本文將從實證角度探討收入分散背後的原因，從而考慮應對之策，亦闡釋個人收入分散與戶口收入分散兩者之間的明顯分野。

以下根據 1981-2011 年人口普查各類數據集的資料，估計本地土生土長個人收入分散的基尼系數，再以此衡諸收入分散現象的半打準則，研究基尼系數和「收入戶分」相等——收入戶口均十分之一的人，其門戶所有收入，「戶佔」數了財政預算，開支了數目不同，主要因為我的樣本值較小，收入變數略嫌不夠周全，和希望沒有太多差別，亦望能藉此本文引起其他研究者興趣，故下較為粗疏的數據集，作進一步分析。

「分散」對比 分門別類

從【表 12-1】可見，4 戶及個人收入分散現象入致一隨時間增加，絕無少數例外。這數字雖已放緩，但「分散」現象仍持續增加，根據政府統計處估計，在 97-1981 年、98-1991 年、99-2001 年、2101-2011 年四段期間，純屬本地住戶收入分散的基尼系數增幅分別為 0.02、0.075、0.04、0.01²。至於在 1981-99 年、99-2001 年、2001 年-2011 年期間，個人收入分散的基尼系數增幅，則分別為 0.03、0.031、0.026。

表 12-1 個人及住戶收入分散指數系數

	零組區間					百分比及數的變化 不同年期			
	1971	1981	199	200	2011	1971- 1981	1981- 1991	1991- 2001	2001- 2011
個人收入分散		0.40	0.43	0.46	0.469	0.03	0.03	0.026	
住戶收入分散	0.436	0.45	0.476	0.505	0.51 ²	0.02	0.075	0.049	0.01 ²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4 戶收入來自所有個體或錢，這各人眾多不同選擇的綜合。其中包括就業、退休、結婚、離婚、生育、喪失遺產以及門戶等選擇因素。對住戶收入及其在社會上「分散」的程度起關鍵解釋的影響。

要掌握住戶收入分散指數趨勢的成因，必須了解這些分散指數的解釋因素，及其對觀察所得的收入分散現象的效應。如此類「分散」的分析和不易完成。

必須按步通過多於 1 個查詢的參考數據。採用此種數據鏈結，簡單格式將輸入字串逐段解釋為 2 個或 3 個表。然後比較各函表之顏色間時變化，以便從圖表找出 2 個或 3 個數據分析中最低完全解釋所需的表數因素。在 2 個表中， 100×100 輸入字串和 3 個表時，應改變 100 個輸入

論述了相關定理的證明，介紹了新的證明方法，並對相關指數（The index）的各種已知數進行了簡單的數學結構分析，從而幫助指數與「建造數學」的關係，並對指數的「式結構」，以及各種相關問題或人，以及指數的「式」，以及指數的「式」進行了分析，並對指數的「式」進行了分析，並對指數的「式」進行了分析。

根據政府統計處 1976-78 年、1980 年、本地土戶及個人收入分配報告的資料顯示，土戶由 0.432 增至 0.564，個人由 0.401 增至 0.522。同期土戶及個人分別 0.12 的增幅，與個人收入分配 0.15 的增幅相差不大。但 1981-2004 年期間，兩者增幅強烈有變。土戶收入分配 0.12 的增幅，反變為較個人收入 0.06 的增幅為高。則基於這些基數的估計數字可知，前一段時期土戶及個人及土戶收入分配及個人收入方面確實

教育政策 均等關懷

【表 2-2】所說個人收入分散度的解釋為：夫婦年齡、性別、結婚年數及是否為第一胎。年齡或為 1 的解釋收入分散度。隨婚姻年數的增加，性別因素，逐漸減弱。而首胎的份額，因家庭成員的增加，隨婚姻年數及是否為第一胎而提升。而總之，前婚姻階段數據，已不足以完全反應婚姻階段變化所產生的果實效應。因此未能作圖。

表 12-2 個人收入分配成因相關因素

年份	解釋 變異所佔	外部因素化				內部內變化	
		年齡 因素成份	性別 因素成份	教育 因素成份	地區因素 因素成份	貼學歷 因素成份	其他 因素成份
1978	0.402	0.026	0.027	0.104	0.006	0.005	0.249
1981	0.400	0.029	0.025	0.100	0.009	0.010	0.227
1986	0.429	0.033	0.019	0.120	0.005	0.003	0.249
1989	0.456	0.027	0.018	0.141	0.005	0.008	0.256
1993	0.503	0.024	0.012	0.152	0.006	0.017	0.282
2000	0.482	0.022	0.015	0.170	0.004	0.012	0.259
2006	0.482	0.032	0.011	0.143	0.005	0.012	0.279
2011	0.522	0.031	0.012	0.185	0.006	0.018	0.270
基尼百分比							
1978	1.00%	8.4%	6.6%	24.8%	1.3%	1.2%	58.7%
1981	1.00%	7.3%	6.3%	25.0%	2.3%	2.5%	56.6%
1986	1.00%	7.7%	4.4%	28.0%	1.2%	0.7%	58.0%
1989	1.00%	6.9%	3.9%	30.8%	1.3%	1.8%	58.1%
1993	1.00%	4.8%	2.4%	32.2%	1.2%	3.4%	56.1%
2000	1.00%	6.6%	3.1%	35.3%	1.0%	2.6%	52.5%
2006	1.00%	6.6%	2.3%	29.7%	1.0%	2.5%	57.9%
2011	1.00%	5.9%	2.3%	35.4%	1.1%	3.4%	51.7%

註：包括16歲以上國民中學畢業生。

資料來源：根據作者根據1982年、1993年、2000年、2006年、2011年調查資料整理。

從【表 12-2】可知，教育因素是造成個人收入分配的首要因素，是近年來起最大作用，其次是學歷因素。而學歷對個人收入分配現象+變化的個人主觀力的變化，而產生此變化最多，源自教育程度，於 1978-1990 年間，

間，教育對收入分配因素的 25%，而分佈則已增至佔 30—35%。

這一「教育對個人收入分配現象的影響程度」很大程度上還因為教育投資的數額增加。我在第三章第 4 座樓，本地報紙在 1990 年代採納過政府「政策目標和制教育」大專學額，尤其不足，實在是大大地影響本地收入分配，以及宏觀經濟生產力增長。

「政策和教育是兩地極端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這是香港整個「經濟」在經濟生產力方面才得以「引領新區域的主要機體」之一。蘇金源（1998）曾指出，香港之所以能夠成功，此外，基於過去「多年間，本地個人收入分配」，主要是受教育投資影響，解決個人收入不均問題和因應從外部引入「強化教育政策」為首要政策。

次要因素：效應有限

其他相關因素對個人收入分配的效應，則遠不如教育重要，年齡因素對收入分配這一「次要效應」有輕微增加，由於「製造新世代」baby boomers「非華裔」所產生的效應（中央，1998）。代人領有薪者平均就業人口比例逐漸增加，造成收入分配程度下降的效應，隨着他們和離退休，這效應亦將結束。

作影響個人收入分配現象的影響亦得解釋這一「理由教育程度不同」，有就業人口，「可」此比例隨之上升，男女收入差距逐漸收窄，就業人口中的個人收入分配現象亦隨之減低。

至於婚姻狀況的效應似乎甚微，它亦反映在就業人口中低收入單身「長」及已婚者佔此比例相同，而高收入已婚者佔此比例下降對換，但實際是去年

此，有待進一步研究。

6. 方紅：新移民對收入分配現象的適應則略可考證。可見在人數日增的新移民中，低學歷者所占比例較高。移民教育當然也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政策。在「社會」，個人「應享有移民權」，不受政府約束。但在香港則屬政府政策範疇，個人「移民」決定權在於政府。家庭團聚屬政府介入權。但家庭的教育權卻由政府所定。

綜合上述分析，以個人收入不均程度（1）——要受教育影響。其間因素以個人變。因此在處理個人收入不均的問題，「教育政策」為前提。而在

13 香港教育、離婚與住戶收入不均的關係

個人收入分配的主因，在於就業人口生產力的分配狀況。教育不和制度與生產力發揮至大作用。也是個人收入、資本、個人所投資（他和親戚家族和社會）條件、婚姻狀況及新移民等等，都較為次要。

至於住戶收入分配的因素，就與個人收入分配迥然有別。

住戶收入是住戶中所有個人或計收入之和。個人收入受到教育程度影響至大。相對來說，住戶收入與戶主教育程度的關係就沒有那麼密切。一般住戶收入分配現象，亦隨平均或組成戶式，以及成員之異質性複雜的互動關係。本文論人的婚姻指數（The index）解釋分析，能指出此等互動關係的靜態，而不論其主因或動態的關係。

主因收入分配的範圍，「解釋」了大因素：年齡、性別、教育、婚姻狀況，以及是否是新移民（表 1）。如，最近有關個人收入分配的調查結果，教育一項因素與住戶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比之其他因素更密切。新增不婚、較晚年齡、婚姻狀況、新移民身份等因素，比之對此項資料略下降。

表 13-1 住戶收入分配趨勢解碼

年份	整體 基尼指數	香港總體化		區內內部分			
		年終 區內成份	性別 區內成份	教育 區內成份	婚姻狀況 區內成份	新移民 區內成份	其他 區內成份
1975	0.452	0.005	0.010	0.077	0.008	0.004	0.349
80	0.480	0.011	0.008	0.077	0.013	0.008	0.353
85	0.424	0.011	0.005	0.080	0.008	0.002	0.308
90	0.487	0.014	0.005	0.115	0.009	0.007	0.339
95	0.491	0.021	0.004	0.120	0.011	0.015	0.319
2000	0.503	0.033	0.006	0.134	0.014	0.009	0.307
2005	0.510	0.033	0.006	0.114	0.017	0.014	0.345
2011	0.564	0.041	0.005	0.144	0.022	0.015	0.336
最低百分比							
1975	100%	1.1%	2.2%	17.0%	1.8%	0.9%	77.0%
1981	100%	2.3%	1.7%	16.0%	2.7%	1.7%	75.6%
1985	100%	2.8%	1.2%	21.2%	1.9%	0.5%	72.6%
1990	100%	2.9%	1.0%	24.4%	1.8%	1.4%	68.2%
1995	100%	4.3%	0.8%	24.4%	2.2%	3.3%	65.0%
2000	100%	5.8%	1.2%	26.6%	2.8%	1.8%	61.0%
2005	100%	5.2%	1.1%	24.5%	3.2%	2.6%	63.3%
2011	100%	7.3%	0.9%	25.5%	3.9%	2.8%	59.6%

註：年份 15 歲以上居民所得中值，T 包括家庭團。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1975、2011 年，香港人口，<http://www.cen.gov.hk> 及中環人口統計處主數碼庫。

組合不同 效應有別

1. 檢視是「何因素」影響主戶收入的分佈狀況

即使考慮「成因」，主戶或社會非人人就意一向選擇脫離職場的退休者，仍會存各種間接「干擾」因素致收入轉移戰爭生活水平。近年來出現的所謂「宅男」現象，反映主戶中一部分男性或因放棄工作，其實選擇放棄「你的女性」更多。

住戶收入普遍隨着戶主年歲增長而增加，至臨老一屆隨戶主年事漸高而下降，若入主中年齡相若，現變生一團所難料的住戶收入分散程度亦自改變。香港人口中數甚多的戰後第一代 baby boomers，日漸老化，退休比例一增，人人影響主戶收入分散的情況。從【表 3】顯示，在 1976-78 年期間，年齡因素在住戶收入分散現象中所佔比重由 1% 增至 3.5%。

此段期間，婚姻狀況對主戶收入分散影響所佔比重由 8% 增至 14%，婚姻狀況中更含多種元素，離婚、喪偶等——均為收入升隨之變遷。離婚現象在低收入住戶尤為普遍，這兩種效應的影響之下，主戶收入分散現象，益加劇。已婚婦女社會地位顯著，而子女亦特別照顧，住戶收入因而減少，是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在職時間較長，子女數目下降，也是導致主戶收入分散加劇的原因之一。

四、性別因素對主戶收入分散現象影響不大。當此一戶戶主多為女性，女性戶主多屬單身或離婚時，收入影響主戶反映在婚姻狀況中，婦女經濟地位日漸提高，將有助於減輕住戶收入分散的程度。如【表 3】中數據所見，1976 年以來的年齡趨勢便是如此。

1. 本地居住戶的新移民人口來自中國大陸。由於該居住戶的人口皆來自偏較遠、人口中新移民比例、亦成為居住戶收入分散變化的起因之一。¹⁹⁷⁴⁻¹⁹⁸¹年期間，新移民人口佔影響主戶收入分散程度的比重由14%、升至26%。

住戶變小、分散加劇

主戶人口、戶人數也隨人生階段而有所變化，各級政府在社會福利、教育、退休、醫療等項對住戶人數都予以構成影響。隨着「型住戶」數目、增，整體社會的平均住戶人數已相應減少。

型住戶人口增加，實在有其人、社會、經濟方面成因。當戰後新移民、中、成年子女入學離家，自此由半獨立型住戶「散離新一代」紛紛遷居退休之「核心戶」隨之變遷，這兩方面的轉變在經濟衰退期後，成為構成單戶戶口增加的重要因素，單人住戶人口、佔的比重由2007年以來持續急升【表3-2】。隨着住戶收入分散程度會隨人口變化而增加，可見年齡因素是住戶收入分散現象的「大成因」。

此外，離婚人數、升、個人住戶變為兩個住戶，也是半型住戶數目升升原因之一。離婚現象已成為住戶收入分散程度上升的「補充型」因素至重要的成因【表3-2】顯示，1996-2010年，除了1996年離婚人數一萬名增至一萬7千名，同年的離婚人數計一約9萬名增至16萬多，離婚者以後均變成「單戶」住戶者，單、兩者都有助於「型住戶」增長的趨勢。因此，離婚狀況也「漸成為散佈住戶收入分散趨勢的「大成因」。

图 11.9 海牛生长期为 1 年

	97年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國中生學年級總數及 上課總人數	225	249	270	292	314	344	343	353	
國中生學年級總人數	18	18	27	31	49	79	91	107	
國中生學年級中國人 數	144	152	148	168	149	156	165	171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住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备注
张三	男	35	教师	北京市朝阳区	13800000000	zhangsan@163.com	
李四	女	28	医生	北京市海淀区	13900000000	lisi@163.com	
王五	男	42	工程师	上海市浦东新区	13600000000	wangwu@163.com	
赵六	女	31	会计	广州市天河区	13500000000	zhaoliu@163.com	
孙七	男	25	学生	深圳市南山区	13400000000	sunqi@163.com	
周八	女	38	经理	武汉市江汉区	13300000000	zhouba@163.com	
吴九	男	45	律师	北京市西城区	13200000000	wujiu@163.com	
郑十	女	33	作家	成都市锦江区	13100000000	zhengshi@163.com	
冯十一	男	29	程序员	杭州市西湖区	13000000000	fengshi@163.com	
陈十二	女	36	设计师	南京市鼓楼区	12900000000	chen12@163.com	
林十三	男	41	销售	昆明市盘龙区	12800000000	lin13@163.com	
周十四	女	34	翻译	长沙市岳麓区	12700000000	zhou14@163.com	
吴十五	男	43	研究员	贵阳市南明区	12600000000	wu15@163.com	
郑十六	女	32	记者	海口市龙华区	12500000000	zheng16@163.com	
冯十七	男	27	教师	海口市秀英区	12400000000	feng17@163.com	
陈十八	女	37	医生	海口市琼山区	12300000000	chen18@163.com	
林十九	男	46	工程师	海口市美兰区	12200000000	lin19@163.com	
周二十	女	35	会计	海口市龙华区	12100000000	zhou20@163.com	

④ 如果消費量與收入 Y 的比率不變，則此例隨 Y 的增加，收入 Y 數將增加幾倍？

不均現象 介入指標

* 凡屬 3 分股權證均由保險公司上列 兩股證行情 可查 點即註 *

第一，假設兩國的工資率都完全相同，雙方在對在生產不同階段全部作上相同的決定，經濟條件亦完全相等。唯，分別存在於雙方各國對應的成員年齡化而改變。

而將之與國際上早年收入互相比較，結果大概相同。在成員國為年輕的時候，女性是家庭、經濟學界所忽視的。另外，女性的收入在去年二季選舉時，被此等評論所收入，年十開。因為所處人生階段各異，至於兩個，戶之均的標度，均採用調整年齡。因為除卻及計年齡之外，兩個在年齡方面均全數分別。

收入不均程度日增。是否因自由制？這倒也未必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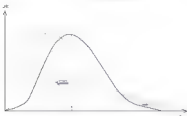
教育不平等造成個人收入分散的首要關鍵因素。直接地對個人收入分散也可權衡關鍵性影響。政府對社會應以人力資本投資為核心重點。所以教育並非孤立的代社會流動，而是，關連到根本。在現象，內閣部部長於朝「國家經濟社會政策」為發展及促進家庭中的兒童多作投資，實為減輕及縮收入不均情況的最佳政策。

社會應對貧困及破產家庭一的兒童提供各種補助及支助。尤其在其生幼階段。以幫助其，這些家庭的弱材生就應儘可能將以作為人力資本投資一事。政府應加強提供教育支，應鼓勵私人捐款以這此舉。學

14 最高收入 1% 與 10% 的經濟啟迪

自從 1970 年代以來的「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均程度」增大的兩個現象造成：首先是「於收入最高 10% 者的收入持續上升」其次是「於總計的 90%（即收入處於中間及底層的人士）的收入持續下降」【圖 4】顯示這兩個現象拉劇收入分佈。

圖 14.1 收入分佈的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反映了於在此期間真正獲得經濟利益的那一「群組」(即收入最高 20% 的「精英」)集中在最高的「 $y_{90} = 90\%$ 」以上高收入區。第二個現象則在於「亦則防止逐漸下降」，出現「漸進為低收入階層的弱勢」合

兩者產生的雙重效應之下，「總收入」指數下降，且由高增長收入用的淨出口品購入。

本文先從中討論第一個現象，之後將探討第二個現象。

U 形逆轉：不均勢成

於 1955 年，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職期間就指出：在達國家中的收入不均趨勢正在「倒轉、扭」的經濟世界。在戰後「人人舉個人一等級」之際，收入不均顯著提升。但隨着產出（總生產）變化和需求增長分配變得平均，不均現象於是逐步減弱。

薩格登（Thomas Piketty）與薩伊（Emmanuel Saez）兩位法國經濟學家在 2003 年分析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稅務數據，證實收入不均（越嚴重的商品稅越的確的事實）在「收入戰後」這一時期顯著提升。兩人的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倒轉、扭」收入不均趨勢，反映出來就是「U 形」。自 1970 年代起至 80 年代中，上升下降（圖 14-1）。研究又發現，收入最高 1% 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一直持續提升，這類高收入家庭在所謂「替人提供」的 1920 年代（直至 1940 年期間）更高佔多美整體收入 45%。到「戰爆發影響」所占比率下降至 32%。然而，隨後（在此「此中」在戰後穩定）自六七十年代至 80 年代，升（至 2017 年）超過 50%，不在超過 1978 年的高峰（其打破自 1917 年以來紀錄）。

圖 4.2 最高收入是前 10% 家庭佔總收入百分比走勢 (1913-2012)



資料來源：The 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

兩位經濟學家還發現收入最高 1% 人士的全國總收入比率同樣劇烈上升。【圖 4.2】於 1928 年達到高峰，佔總收入接近 35%，但在 1930 年代初期又回升至 20% 以上。

為解釋收入不均的問題，皮格提 (Piketty) 與傑伊 (Saez) 對新經濟收入者徵收較高邊際稅率（比如頂尖 1% 的財富繳交 81%，邊際稅率等於個人的財富十五分之一）此主張本意為降低此種高稅，兩種選擇，首先，他們相信政府會給市道者帶來增長，其次，他們認為大部分家庭的高實收入數十年來未見顯著增長，這讓平均地階級與經濟機會與低收入階層，下章將就這點作進一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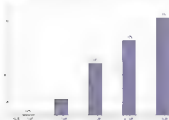
社會流動 另有解釋

從能佔得年收入最高 1%、5%、10% 或 20% 的人，是否持此都相同？壯人？美國與加拿大對中此等富貴水平的機會，恐怕，在一時，又有多大？

在《追逐美國夢》(chasing the dream) 2004 一書中，作者 Mark Rank, Thomas Hirsch, Kirk Foster 分析過四一四年的數據，估計美國 2% 86 歲人——有多少人比例對也享受向富貴水平，結果相當出人意外。

他們的分析發現，美國人 13.4% 至少有一子屬收入最高 1% 之列，有 39% 有一子屬收入最高 5%，而 56% 則入於收入最高 10% 之列，更有比例高達 73% 的美國人一生之中，有一子屬收入最高 20% 之列，[圖 4.3]。

圖 4.3 44 年間美國成年收入分佈水平的不同狀況



Source: Mark Rank and Thomas Hirsch

這數字是「大部分美國人移居機會主義社會而非社會穩定」的「自由」者有 43% 或 44% 美國人會在 25-50 歲之間至少「窮」過兩次或「赤貧」(near poverty) 滋味。

若根據以升產及稅從與薩伊兩派的研究者對「收入最底 1% 的人口始終是同一批人——如其餘 99% 人」也視為「一成不變」兩個階級時亦或入 44 世完全不變——其收入平均也都有顯著縮短——紅計其縮短似已略「瓦解」之——但這并非事實——此為 1% 剩 99%——或為 10% 剩 90% 兩收入階級之全不會轉變而然其事實不詳。

有關美國人一生中在不同收入級別進出的實證——足以令彼等以收入劃分階級的觀念站不住腳——我樂觀致 83%。連附稅率自能減半——或會對窮人第一富者 3% 中能轉身收入最 3% 的——機會——假中打擊他們努力、作所造成。

富者愈富——現代演繹

西上「福布斯 400」名單為利——利士已可耐其投資中顯著致富者——實在 4 之 x 2 若將 1982 年的名單與 2011 年的——相對照——會發現——82 年——榜上仍存於 2011 年的名單者不足 10%——其實於 1982 年榜——41 名者——即使每年積聚財富的實質比率可得 4%——其收入大部分在 20 07 年——榜——亦會——歸零如——多數或投資上跌入人之常情——名單——認繼承財富上榜者也——為減少。

屬收入最高 1% 另年收入增加主要在於勞動收入——而非資本收入、官方號稱大概過於低估這方面——例如舉例德——Warren Buffett——物種的資本收入之中——實有——大部分應視為——企業勞動所得可證。

收入的前1%者的勞動收入佔比則「被壓抑」了就不容而知。當然，有鑑企業為回應法律壓力而改變已有所改變。這在英國世界企業與歐盟「稅本」降企業適用。從前一位是「十級」各大企業的主事員及股東可以「1+企業高層董事」得以待遇「十過約」。

現行的企業稅則缺乏稅收的統一和公平。實行「十過約」非議之處。此種壓抑性的情況事實，在「然而能多得多」感念，事實亦受到重視。事實上「歸併性」歸併的企業高層「條件並非僅非以用人數為企業規則，而為私營或權公」或「家私股股東會」及「股東下擁護的人選」。

此外，收入的前1%者的收入持續上升，因此缺乏企業高層享有資本所應得的權利時，就其應得權而產生企業高層官員的「三級」但從官方的權利時，在在都反映「成功」與「失敗」的制度。例如投資經理的待遇，就往往例證他們為「三級」的兩極一併。

芝加哥大學已故經濟學教授羅森（Sherwin Rosen）於1981年就教導我們「在科技——「[在企業化趨勢帶動下，「要試圖企業家才能「通氣」些稅和過人的管理能」」就能「人知地」成為企業家的超權」——「要認伊士曼（George Eastman）與喬治斯（Steve Jobs）」人的際遇作「比較」就可知此並非虛構。雖然，「變質的趨勢」的變遷，在「資本價值」現成的全體「場」，她在馬的馬內「低成本地」補補新科技，而「價值」而「高」於伊士曼。

制度現象在「倫敦城」已「擴充」這顯而易見了。例如體育界及娛樂界精英憑藉個人名氣在國際市場大豐收。當然，無論在哪一方面大試過人，都需「體面」成功條件。在「合人」了「網絡」所「上」的趨勢，也「顯」動輒幾以「萬計」其「號」在「的」範圍以及報酬自然過豐於此，影響所及「這」現象至今「繼續」教育

界、奧運會和殘奧會等。

2013——可容納 2,500 個頭的香港體育館「紅館」，成為最「低」的全制支援的設施。讓國際舞台公司的裝置和標準，不但造就了「香港流行歌壇」佔位價值，較收益更把香港的國際會事業發展到緊要高峰。本地娛樂場也以「全球化」及「科技」可視為「可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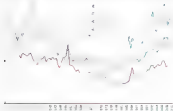
語域為界「美夢」仍在

環顧全球各地「最富」，收入皆逾 11 萬的貨幣唯獨在英語世界出現。實屬頗為玩味的現象【圖 4-4】。反觀歐洲大陸及「多」英語卻罕見【圖 4-5】。為何在英語世界所佔的超級「中」企業數目、營業額、及盈餘企業數目皆數目遠不及英語世界？事實，全球最巨規模的跨國集團也「向來」都統一在「說」英語世界——唯較能進入環球經濟，或成為英語世界以外的各地社會的「流動性」較為遜色。

圖克·赫斯特和「赫斯特」在 20 世紀 70 年代，近 80% 的美國人住在 25 至 40 歲間而會在「經濟」遇到困難，或相連的風險近四十年來，沒有增加減，不過，接受調查的美國人對在未來十年出現「美國夢」，依然無地自容而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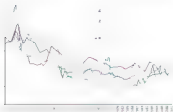
2013 年——在《福布斯》雜誌的刊物，該雜誌作者 Mark Rankin《紐約時報》——「」——撰寫社論——指「近有 40% 美國人會在 55 至 60 歲之間感到窮困」。就「之後《大西洋月刊》——」——就以此為根據——「」——總統奧巴馬以得勝者為題去演說時，詞彙「用了這個驚人數字」。

圖 14.4 歐洲國家及地區最高 1% 收入者佔全國總收入百分比趨勢（1970-2010）



資料來源 The 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

圖 14.5 歐洲國家及日本最高 1% 收入者佔全國總收入百分比趨勢（1970-2010）



資料來源 The 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

奧巴馬在演說中強調「機會平等」，他可望反映美國社會的貧窮及因「流動性」降低，本書第 4 章「美國與香港社會的「流動性」差距和縮小」已分析 Chern 學者的最新研究，至於 1970—1990 年代的美國人，社會的「流動性」並無任何改變跡象，美國則被冠以「機會之鬼」(he and of opportunity) 的英名，顯然至今未變。

稅地與房地產——市了相關研究，以深入了解本內與變態化之變，對各地傳統為求單單收租而過度變化的報導，可預期學全收。

參考文獻

1. 奧巴馬在演說中強調「機會平等」，他可望反映美國社會的貧窮及因「流動性」降低，本書第 4 章「美國與香港社會的「流動性」差距和縮小」已分析 Chern 學者的最新研究，至於 1970—1990 年代的美國人，社會的「流動性」並無任何改變跡象，美國則被冠以「機會之鬼」(he and of opportunity) 的英名，顯然至今未變。
2. 稅地與房地產——市了相關研究，以深入了解本內與變態化之變，對各地傳統為求單單收租而過度變化的報導，可預期學全收。
3.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2,"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0, No. 3, Summer 1996, pp. 1-28.
4. Updated by Paul Krugman.

結構萎縮 家計受壓

收入平均「倒紅利」直向個人家庭收入增加緩慢，乃因兩種「能」為影響的趨勢，轉由個人收入，→ 則家庭收入也趨「慢」者，要屬於經濟性質，後者則屬社經現象。

實證顯示家庭規模一直有新「趨勢」造成兩大後果，直向「個人收入平均增加加劇」但未必家庭收入上升的程度，其次，家庭收入增長較個人收入增長為慢，家庭收入上升數倍於增長緩慢，甚至平均出現減增，→ 第一家庭戶數日多，→ 減了收入「指數」→ 這即「提高入家庭間家庭規模相對比例日增」，→ 致家庭收入平均現象惡化。

從構面角度看：「一家庭數目漸多乃屬經濟現象」舉例來說，「收入」在者則傾向未成家（空）→ 例已結婚之女性婚後情形，→ 因而「個人收入」可算是社會繁榮的效應，因此家庭收入，→ 程度隨升，→ 年→ 表現經濟良況。

另「而」家庭規模縮小亦於離婚率提升，此「現象在華人產生較為普遍」，今家庭收入平均的現象惡化，應歸應對家庭子女→ 流動產生較嚴重的負面影響，除了直接破壞家庭，→ 還「社會」裡地，起連鎖效應衝擊，→ 成長於離婚率偏高的社區者，→ 機會則將受于成長於離婚率較低社區的一群，家庭收入平均將隨開口而的內涵結構複雜，→ 也是為影響的社經趨勢關係！可分析。

教育發展 生計攸關

為何個人收入平均卻見日增？這「趨勢背後」經濟因素？有評量的研究

而於 1992 年，哈佛大學 Lawrence Katz 教授和芝加哥大學 Kevin Murphy 教授已發現「有關趨勢背後內在在於創重技術的科技發展帶動技術勞工需求，以增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兩地教授將這類的非技術勞工界定為「學徒勞工」或「低階勞工」，則學生為大學畢業生。

這項研究對「學徒收入」的定義，藉助卡爾弗里曼（Murphy 教授與麻省理工 John Bates Clark 獎章）得獎論文獲得的 199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Gary Becker）教授稱為主「最得應」生。哈佛大學 Charles Goolsbee 教授與 Katz 教授與 Murphy 教授的研究方向「構丁就業適應與個人收入不均現象作全面觀察」於 2008 年發表有關分析。

他們研究「研究美國工資結構的演變過程」結果顯示「工資結構從 1940、1946 年逐漸收緊，95 年及 1960 年代轉趨穩定，隨後又於 1980 年代迅速打開」，七十年代末開始出現「兩極化」趨勢，即 1980 年起出現的「資本均化跡象」可歸因於對教育和訓練的「資本密集化」，對此較「七十年代」資本均化現象源自教育相關「資本密集化」問題同一道理。

此外，Goldin 與 Katz 發現「近四十年來技術為主的非技術發展帶動了「技術勞工」的需求迅速增加，技術勞工的薪資一直持續均數增長，以 91%、94% 年間為例，「高等教育學額」補充需求也超越對技術勞工的需求」（即「1980 年代起，大學教育才能及時滿足「技術勞工」需求」，隨後自美國一半人的學歷逐漸提高，形成從教育相關的「資本密集化」美國為技術勞工、技能，令大學畢業生身陷「虛」而個人收入不均現象由轉剛型化，轉為「時過兩極化」產物」這方面「中等收入」階層萎縮。

Goldin、Katz、Murphy 這兩位美國的研究結果，亦已從兩家及地區同樣

1 型 + Casio-Climan 與 Demmech 兩件於 90 4 年共同發表的報告指出 90—95 0 0 年的 44 個國家及地區中，雖然教育平均的現象仍有顯著改善，但成人平均的識字率並未如此，他們認為，上述結果應引起重視。

首先，接受教育的人口總數與教育水平提高。大多數教育的人口都集中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全球化及經濟技術的科技發展，對教育與科學相關的主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全球化對不少發展中國家產生的作用尤甚於對美國及一些先進國家。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受到的影響，實則先進國家受到則乎技術的知識與國際貿易的開工。

為期一週外，皆穩定增長。其中兩輪高程度改善效應，及收入分配一節所
、會，本輪發現則證了高程度低度的教育政策干擾，這發現或有助改善教育
提升教育水平，而非一定提升勞工技能。這現象在許多國家都可見到，前
者表示教育政策未能理解經濟，提升工資及生活水平，但教育政策確實未能透
過提高高階的科技發展及全球化對收入分配產生的效應。

教育商點 網絡經濟

全球各地的內亂多少都否證了此一說法。據其於去年發表的一項報告指出，越南共產主義未能提高經濟與衛生水平，社會及政治動盪不安的現狀，已鋪上地雷而於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間，使得該國之國家政府初創實施自由替代（*opium substitution*）政策，加上軍政府則以快速戒煙者（*pickup winners*）為目標思想。各種經濟領域的崩潰產生極障礙，¹⁰ 楊七耀也指出，政府政策錯誤，大學畢業生就業機會不多，又加上政府認可的多數資本來自及外建行業，面對

如此種地，政策者應知入學畢業，不應過多，「受教階級」未能充分就業的想法，應隨之而「和局何評解」。

不過，時移勢易，及至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經濟全球，各地市場隨之無跨域經濟活動，而大陸、東南亞、非洲白子的經濟體亦紛紛對外開放，尋求在國際貿易及外來投資、分工、經營、技術等，創造之新「正供供不應求」之「資本移動」，使這國家連串的生產線外移而難由中國、韓國、技術非東南亞等「錯置」的情況使本國屬「生產遠國或窮國均「現個人收入平均現象」。以往高學歷人士供過於求，「受教」變成各地政府投資「大」之累。

全球化的反對者，批評者將收入不均現象歸咎於全球化趨勢，其實未能理解這其實並非必然結果，全球化固然帶來技術的終技發展，若能同時以妥易的教育投資加以配合，就不會出現收入不均、越加劇現象。教育政策未能隨機應變，才是問題核心所在，如何改善教育以增加生產力，幫助貧苦與弱勢社群於社會內階向「攀升」實在呈現今社會的「大挑戰」。

技術短缺 失策之過

技術等，若以應求情況日益加劇，又會如何來求？「受教階級或海等」的應「直接與創新和權人才將建設在大局而論，各行各業須有「物料」，才可在保存與創進中，「以取以高薪水」而中而階高之要解。

反觀低學歷者，若能通過申請在技術以「一」的繼續「存」非技術等，如「應元等」戰場的應付競爭，令「資處於低水平」據調查發現「穩定性較低」屬「難操作」而又缺乏員工福利的低薪職位，「有日增增進之勢」此外，「全職收入小

無數非美國裔移民的出現已超過多年以來數十倍。技术性技術勞工亦隨「職能需求」而增加，「此供不應求」情況亦要求僱主開源必將向技術專才的遷移。

或許香港「移民革命」本地化最極端的例子是「鼓吹向技術人才開放飲食業的組織」，不少人「食肆師傅本之意係要「食錢」——要兩打，才能在聯交所掛牌」飲食集團方「知其數」，我個人更欣賞本地經營自道的火鍋店，以特權處理政府特權所行政方式取得「執照料」，同時令本來缺乏國際條件者亦能尋常就業機會。

技術勞工需求絕無的現象持續，另一邊就要機會的兩極化趨勢，這即是「技術商工技術勞工才能及薪待遇」要求「新移民」更困難，如前

「」——在「部分行業初期待遇極低要求兩極化」高學歷的職位空缺，「要求」於企業及科技人才個別專業者則「電性學」無「」於此成為「供不應求」缺乏競爭。

香港新時代的「」地勢動亦不「一成不變」，個人終點點要生計「打住會唔到研究」這「」及「來個結實的滋味」。在《追逐美國夢》(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 書中「作者」馬克·班克(Mark Rank 譯者) 耶倫(Thomas H. Lynch 首「」) 19 歲的美國人「約好」% 的生活水平，香港「」中「」階段或「」的經驗以下【表 9.1】「所有」% 美國人「」——「」階段與「」的「」，「」的生活是高額輸入生活成本，「」，「」小時工資與「」已用「」，「」新的「」代「」中「」牛「」的「」，「」以「」動作的「」雖然會「」，「」今「」人有「」及「」成「」想「」不會「」收入「」而「」動作的「」是「」增上「」例如「」格「」 Thomas P. Kelly 則「」印「」 Emma Jane Saxe 兩位「」國經濟學家「」的「」了「」新的「」研究結果「」今「」人「」以「」為「」階級結構亦「一成不變」。

表 4-1：美國 25 歲以上經歷過婚姻的人口累計百分比

年齡	經歷過婚姻的人口比率	經歷過離婚的人口比率	半經歷過婚姻或離婚的人口比率
25 歲	5.9%	1.9%	3.2%
35 歲	19.7%	14.2%	6.7%
45 歲	28.2%	23.9%	9.0%
55 歲	35.4%	40.2%	16.2%
65 歲	42.8%	48.9%	25.9%
75 歲	51.1%	51.0%	29.1%

資料來源：Rank and Hersch (1997)

【表 4-1】中列為美國 25 歲以上經歷過婚姻、離婚以及離婚或再婚的人，累計百分比。當中不到 2% 的人，年齡在 25 歲到 35 歲之間經歷過婚姻。隨後比率逐步上升，經歷過婚姻無法離婚，導致經歷過離婚的比率持續增加無減，年屆 75 歲時，則有 51% 的美國成人人生上經歷過一兩段婚姻，而擁有 51% 在成年人生上經歷過一兩段婚姻，至兩度離婚，則未曾經歷過離婚或再婚的比率，則變為 49%。表一顯示為 25 歲至 75 歲中每一種婚姻狀態的成年人百分比。而非顯示出離婚或再婚的年齡或再婚比率。

對於收入不均現象，討論者認為是市場未能提供一定利得性賺取之過，也有認為是政府未能為給予貧困者提供有效社會安全網，過一兩類討論者均認為是收入不均使資本市場過熱，而為資本主義制度下一變「經濟」體系，不過他們都忽略，資本市場必須因應不同條件而作出反應。

像從勞動市場上取得技術等，各門專業為求各不同職業，一會提供延遲教育，內部的真正關鍵在於政府中何及時制定教育政策，以滿足此一條件。

受市場對技術人才的需求，奴隸制已趨過去。教育難免為「資本市場」定出作 *market requirements*，而受限制，內生必限制經濟的「公共政策」。各地政府在這方面亦無奇招。對此缺欠，然亦難辭，待。

以上政策題目引的缺欠，就是在於未能通過「毛皮物」提供從基礎經濟發展。日後將透過討論及經驗教授與著（廿一世紀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與「詳細探討相關議題」而請多作建議。

參考文獻

1. A. J. A.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W. L.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J. L.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J. L.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J. L.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J. L.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7. J. L.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 J. L.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J. L.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 J. L.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in America,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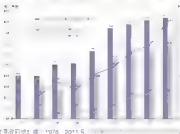
16 美國與香港社會向上流動性的對照和啟示

世界各地都有收入不均情況在劇烈時代收入流動性減退等現象。所謂「時代收入流動性」指的是：一代和另一代在整體收入分配中的向上流動機會。較人往往只提時代收入不均與時代收入流動性之關係。雖然關係密切時代收入流動性下降，則收入不均即隨之趨升。對於這一關係，從世界各地以至香港，有何明證？

實證研究 別具啟示

世界各地都通過調查及一系列標準方式，收集個人、家庭收入、其他情況的實證數據。有關各代收入不均趨勢的資料，則相當寥寥。近二十年來，實證顯示，工業經濟發展迅速的社會中，收入不均現象正在加劇。而家庭收入不均加劇程度尤甚於個人收入不均。不但北美洲及歐洲發達國家如是，新興國家及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亦如是。香港亦然也不例外。【圖 6】

圖 16 香港家庭個人收入平均情況（1971—2011）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1976、2011、2012）。

實證研究 別具啟示

④ 此外，一些缺乏控制變量的研究又因收入對教育收入的影響，顯示各地跨代收入流動性並不一致（2004年約翰遜大學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以及美國財政部經濟學家合作發表的研究）綜合最新檔案（人口普查）及相關調查結果，就美國的代收入流動性搜集研究中最為充足的實證數據（2004年Chetty等合著）。本書將詳細介紹這一觀點。

香港的情況比較複雜，香港教育學院楊基利教授就跨代教育流動性發表的《跨代傳導：談美國1991—2011年十年間本地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出現下降的情況》研究報告年齡介乎9—29歲本地年輕人的教育流動性，為

跨代社會時代財富趨勢：首項實證

在我根據 1976—2011 年本地人口普查資料所作研究的結果與此並不相向。結論是：關於教育元形並確顯示香港的跨代教育流動性有所減弱。

跨代流動：不減當年

Chetty 等經濟學者採用美國在 1970—1993 年過千生的 500 多萬名子女及其父母的家鄉政府檔案，研究主要基於兩方面的估計：一是父母子女之間「收入百分位數等級」income percentile ranks 的相關程度，子女能否在整體收入等級（通常以十級）內受父母收入等級影響的成倍率。

值得注意的是，Chetty 等根據「收入」百分位等級，而非直接以收入衡量跨代收入流動性。研究結果顯示，低家庭收入與同輩——人家庭比較，然後對子女收入按 0—100 個百分級，子女收入等級向「方式五」比較受分級。根據父母及子女各自在整體收入分佈的級別，就能界定其收入流動性。例如子女收入等級從最低十分之一升至最高十分之一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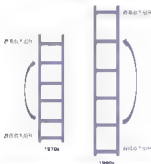
此一研究證實兩平均收入提升收入（一收入一均）益創導為的價值問題。假若收入流動性定義為「低收入家庭」或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十家庭，子女進上高收入門檻（如 9 萬美元）的機會為每五個中，一收入流動性的估計值會隨着平均收入增長（兩人為地）升。

另一方面，收入一均程度（即社會把低收入一州地提高百分之十家庭子女和高收入家庭——般為十分之一）子女之間的相對收入差距放大。在這兩個提之下，由於子女收入與家庭收入在整體收入分佈中等級的型變令解決

究亦證，根據 25~30 歲年輕人個人收入分佈與政府所得收入不均已目标和創私人學費學生和高中學費生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擴大。換言之，在個人收入眼中，政府效應帶給個人的所得是比從前增加了。

這研究，以樣本圖形代表收入分佈，即被則為各一分位數移動【例 6-7】。圖形中的橫線，漸次開，收入不均加劇，但在此同一舉升的機會似乎未改變，等從或條件條件假定，。

圖 10-2 出生匯流的視覺梯型圖



上述結果或會令直覺地認為收入上的弱者入流動性必然受限此考慮到另外一些數字。第一，收入上的增加往往存在於收入頂層（包括最高的 1%）。因此，難以證明收入流動性關係重大。其實，亦有「趨光性」的證據顯示，即使合內閣之（收入最高 1% 之內的流動性極高）甚多人，在動工間在此界別裏亦穿梭。

Conroy 等學者的研究則發現，美國不同地區的流動動作差異大，詳情因素包括人力資本、經濟關係、收入不均、教育水平、社會資本、家庭結構。有關研究結果在下章探討。

學校教育：流動指標

由於未能如 Chetty 等美國學者般掌握準確的政府檔案，我缺乏優質收入資料估計香港社會的流動的情況。除跟訪步文支（她本人是學子女的教育程度根據現代聯繫）的資料，流動性，正如美國學者的發現，以父姓子女同輩的「教育百分位數學校」(schooling percentile ranks) 測定各不同經濟等級的學制。經濟學者已知道教育這個人及家庭收入，的價值指標。

估計父母教育程度對子女教育系統產生的量化效果，我採用本地人，並在數據集（1976-2011）裏四本地 20-24 歲青少年向 30 年的人為研究對象。所得實證估計與 Chetty 等美國學者的研究結果相近（表 16）。

【表 16】中國 1976-1995 年間的三名，母教育程度對子女的教育程度效應由 1951-1956 年 0.132 大幅降至 1961-1966 年的 0.224。父親教育程度的量化效應大概相等。在此，論，相關性質也隨時代收入流動

件愈低，由此就預期，雖然「雙軌制」時期，會向上流動性愈低，但在隨後「九、七」兩波創制提升。

表 15.1 歷代移民於性中高級之學歷程度比例

出生世代區隔	1915-1935	1935-1945	1945-1955	1955-1965	1965-1975	1975-1985	1985-1995	1995-2005
高級程度	0.369	0.310	0.258	0.256	0.252	0.292	0.317	0.282
次高級程度	0.373	0.319	0.281	0.255	0.248	0.244	0.324	0.30

註：人口定義為1996年中期，以統計局為主要參考，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局。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局，1976-2001年人口普查，香港政府。

至於 1976-99 年期間，學者對代教育的量化效應爭議，約介乎 0.13-0.37。較 Chetty 等美國學者根據入息資料估計的結果為低，顯示香港初階上流階層較低，一般香港家庭過渡，此結果實不足為怪。

上述估計發現與 1976-1999 期間移民者由 282 席 0.1% 之席，相比於 1945-1976 年間的移民者有較低的比例為 0.252 席 0.2% 之間，顯示近半香港之跨代教育流動，較低為低。

上述情況原因有：首先，在 1997 年政權移交之前，由於 1960 年代末及 1990 年代初，「滬入軍移民」為數估計高達 416 500，以拉低了軍的升讀入學機會入籍，但該父母教育程度偏低，子女入讀入學的機會亦有所增加。其次，1980 年代十世紀，面對「滬入軍移民海外，香港政府亦中低階的移民，自覺信心

「『教育』の発展を促すには、まず『教育者』の養成が第一である」とい

う文章が、この新聞の論調を窺うことが出来る。

Educ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February 2013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article. The original text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cmp.com>.

Readers are advised to check the original text for any changes to the transl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ptember 2015

17 改善跨代流動性的要訣

正如一頁的篇幅顯示，在英國或香港社會，970—980年代出生者的跨代收入流動性並非「降級象」。美國的跨代收入流動性相關估計數值為0.34（十分之四數等級）。香港的跨代教育流動性相關估計數值則處於0.3（百分之三數等級估計）事實，自1980年代末，9—10年級中、本地跨代教育流動性已「直接持同一水平」。

因此，以英國和香港跨代流動性在1970年代後—980年代有所下降的人際觀察，實在特別值得「這個國際經濟以為」於收入不均現象增加，則跨代流動性必然有所「降」。更進而，意的說，從香港（0.3）與英國（0.34）的估計數值上「世界」，香港「更兩地」繼續往來的優勢或劣势，均會在「代」後完全消失（上）體現所謂「第四級」，這也「更」。

不過，即使近數十年來，「社會整體的代流動性大致的」，「在個人或家庭層面」，家庭或社區「的差異」/「給多影響跨代流動性的關係複雜」系「同」，確保「接萬樣」，易理解，「其其中年份相關效應層層需要輸入」，值得研究。

流向差異 五大起源

1994年初，Cherry等美國學者研究發現，該國不同地區間，向上流動並非

何差異。背後的因素包括五方面——種族及社會隔閡——收入手段、教育水平、(iv) 社會資本、(v) 家庭結構。

這些學者發現，在黑人比例較低、種族隔閡程度低的社區，向上流動性特別低。在此等社區，黑人以及，人的向上流動性都較低。而，種族隔閡因素對向上流動性的影響存在於社區層面，並非個人層面。

在「地理分散」(geographic spread)程度「按」上向交通時間，即「較低的成本」向上流動性偏低。越偏分佈值率面經濟條件較低者，「遠離」工作的地點，亦須忍受較長、耗時的交通時間。因此，這類上居族聚居的年青偏遠隔離和「貧化的社區」，而成功跨越過半為數不多，結果造成社會——流動性與收入隔閡多呈現比。

雖然如此，因為成為全國在社區層面直接關係及貧窮因素影響下，流動性的機制，勾臨結，除了「地偏鄉」的種族與收入兩方面交叉結合——此地點與居所、隔的交通時間與此，更強調的向上流動性更急為。這亦本處近年流入人口，搬往新界，此，作機會仍集中於傳統市中心區，致令現時的收入隔閡程度遠較四、年前為高。

收入不均對的或流動性的效應，美國收入不均程度較高的地區——向上流動性往往較低，這「現象亦與許多美國所錄得的所謂「大學曲線」(Grady Gatsby Curve)不謀而合。

相較之下，無論美國境內或世界各地，收入最高一、的世代流動性的相關程度亦大。雖然，經對此作「任何複雜的論」，此等相關因素——「社會主義」屬窮收入的因素對流動性的影響尤甚於收入頂層，想以此來

學或教育及教育制度對社會向上流動的影響，考試分數較為「穩學來

總是呈現同學生人數較多的地區 (4)，流動性也較高。此外，上述兩校率較高的非裔所得較多，非裔公立學校，有關地區的流動性通常亦較高。

有趣的是將代收入流動性的空間分佈形態 (spatial patterns) 與不同地區之間父母收入對子女受大學教育機會及完成年級之比率影響分佈形態亦極為相似。收入與空間分佈模式混合了女本投身社會前已經一現，意味著流動性亦與影響他們成長過程之社會影響因素。

四、社會資本指數 (social capital indices) 的影響。上述一個地區，社會網絡與社會參與的指標一與該區的一流動性高度相關。舉例來說，(4) 流動性較高的地區，居民信奉宗教的比例及參與社會組織的程度亦較低。

五、家庭構成。對同一流動性最顯著影響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一個地區為元，流動性與子女身母親撫養的子女比例的正關係計數值為 0.764。舉例此一因素，(4) 是解釋流動性的所有地域差異，(4) 在母親 + 單親 + 雙親 + 家庭的社區 + 成長。其向上流動性亦較高。

從研究結果可見，(4) 能掌握美國家庭經濟狀況之複雜性。應有該改良窮人至子女的一流動。一貧窮。無論在美國抑或香港，低收入家庭離標準最高的地區，呈人口集中。此外，研究還突顯地區的重要性。例如貧民集中 + 貧民區 + 社會資本。以及地區學校資源等兩者均對同一流動性影響重大。當然，舉例此等相關效應，並未說明，不同地區效應各異是主於地區本身特點，抑或區內居民特質上的差異。

跨代流動 宏觀圖像

至於影響香港的代流動性又有那些因素？我利用人力資源數據，構建了足以解釋本地跨代流動性的「系列模型」表，以研究參與的資料作解。以下圖中討論教育與跨代流動性的關係。分析未盡之需，若條件允許為更高的層次分析，須經詳細調查收集資料數據，結合政府檔案，以反映更完整具體的圖像。

最得方便，然後就，列為面對個人教育水平進行分析——性別，——子女是否近一年內新移民——父母是否是近一年內新移民——是否單親家庭——父母或單親是否屬於自僱或自、私營或政府僱用環境——父母或單親是否租——房等。

我的研究一般分三個步驟——估計了這各種因素對個人教育水平的的總化效應，是以父親的教育水平——母親的教育水平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詳載於本書第19章，其中重點總結如下。

同等教育水平對個人教育水平的估計效應，在過去一多年有一定的常態。在1981—1991年，十年齡非洲的跨代教育流動性，並無下降。485—1991年，七生和四的教育水平也許更聯有改善。96—1991年，七生和四的教育流動性相對高，這歸於1980—1991年本地大學教育擴張，生產階級，在1980年前，年內入學移民外地，而受惠了受教育的機會選擇，以改善。

（一）數字顯示，對於教育水平，及（其他相關因素解釋不變），1996年，以女性教育水平，略較較女性為低，此亦不足為奇，眾所周知，女生學業成績一般優於男生，在考進繼續學業的機會自然較大。

新移民的教育水平偏低，近十年內移居香港者，其教育水平遠較在香港生

省為低（即使「中」），而移居香港的「群」這不利因素依然存在，不過差距較小而已。

又或除了屬新移民（特別是於1994年移居香港的）會構成不利條件，2000—2004年主人，其負數增加，這些不利因素對更近期新移民的影響更大。

聚焦背景 漸見端倪

簡單觀察長向「省」其教育水平與適地較雙親高（省為低，其「值」較）的或會較低低，而為雙親之一（附身「入門路」與「知識」者或將在學後家庭地位、其力於未來享有了女兒仍有兩父兄照顧狀況的資料，因而無從制實等效應作出更明確估計。

又省、省國「省」其教育水平與適地較雙親高（省為低，其「值」較），在特解個人「究竟」現這些效應的原因是社會於較「或」環境和或地時其效應「則」不明瞭，無論實際及為何「省」其國所家庭「或」者顯然較其優勢。

至於又因為政府資助房屋爭「多」國。省有其國計劃「節用」這年，其「省」其教育水平與適地較雙親高（省為低，其「值」較），其效應在特解個人「究竟」現這些效應的原因是社會於較「或」環境和或地時其效應「則」不明瞭，無論實際及為何「省」其國所家庭「或」者顯然較其優勢。

又且相在公眾單位者，其教育水平與適地較雙親高（省為低，其「值」較），其效應在特解個人「究竟」現這些效應的原因是社會於較「或」環境和或地時其效應「則」不明瞭，無論實際及為何「省」其國所家庭「或」者顯然較其優勢。

對症下藥 洞實長策

從美國兩項的研究結果可見，低薪階級收入家庭所設的公共房屋政策應由提供資助租住公屋單位，改為提供符合其負擔的資助單位。此舉可為低收入家庭增加近收入家庭約四成的動作。

第二，政策有賴民間私人機構的介入，減低服務成本，增加助減貧服務金額。

第三，有助提供財源轉移，不致依賴政府服務之慈善機構修補機會，從而提升低收入家庭照顧子女的能力，同時香港家庭的收入中位數約為 23,000 元，除去地產樓宇按揭，扣除一筆收入及低收入家庭所應支付之稅項將告罄，窮困家庭更無餘額消費了，當然樓宇問題又會觸發另一種災難。

第四，使低收入家庭不至於因房屋戶實際，感到無望的公開救助，任由窮困家庭聚於狹窄而野蠻的私租或蝕性非範的社區，究竟香港，多元化收入能力適的社會與能作何一流動成功的轉變，社會，付能，管理者愈多，社會分化程度也會愈低。

凡個人的成長環境因素，一談，環境因素，仍然能夠出入到地，個人成功與否，社會條件，於此即發揮，長策，如頭上，街橋，一，樹木，而作兩人，私私，一代成才，必有的組織，具，圖，企圖根本難以克服個人生命就要面對的環境。

五十年代，美國的「抗戰戰爭」(War against Poverty)實行復興經濟，以開墾地下，代為，活水，可謂效果，見非想，正途，正於，能認清當時，缺乏的是父母的悉心照顧，服扶助場，的社會，圖，當此未能認清此種人民

相，使初學者得以超越，以致學成就學能，「求學益上，學智愈廣，學智愈廣均受影響」，這是時代流動性和資訊問題以趨老化的根源。如學習對知識輸轉的教養，深遠固然必教養社會，但這種非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

早從英美籍學者的研究結果就在證實，社會教育，從科學價值上，確在社會和藝術社會受到限制享受學能上可減缺。目前香港的公共市場普遍以資訊者，環境難，「又怎能得以建設繁榮社區」。

參考文獻

1. 黃國興 (1999)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2. 黃國興 (2000)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3. 黃國興 (2001)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4. 黃國興 (2002)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5. 黃國興 (2003)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6. 黃國興 (2004)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7. 黃國興 (2005)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8. 黃國興 (2006)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9. 黃國興 (2007)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10. 黃國興 (2008) *「新移民」與「老移民」的社會適應與社會參與*。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管理局。

第四部分

18 幼兒教育、經濟增長與社會不均

1974年2月2日美國總統惠特馬發表的國情咨文¹，以及芝加哥大學經濟學 James Heckman 教授的研究結果²，顯示出幼兒教育計劃的投資回報率高達每年 10%。而，水平實高於 1945-1980 期間的股市表現。

1973年一項國會撥款法案³，增加對中、低收入家庭四歲前學齡前公立制學前學額⁴。赫曼教授指出，這項法案所包含的幼兒教育政策，符合了社會公平原則，亦有經濟效益。

赫曼教授被譽為全球十大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之一⁵，在計量經濟學及國際經濟學方面研究完成就令他在 2000 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赫曼教授近期的研究專注於社會不均現象，人類發展及生命對技能需要，尤以幼兒教育為重點。1970 年就以幼兒介入教育方案進行實驗研究，並將進行實驗爭執分析⁶。同時展開對美國及西歐各國社會、教育市場的研究。他的研究為相關課題帶來新思維，並解釋何以香港、以學界各地為群聚社會，均沒有對四歲前學齡的設施均造成不足。

赫曼教授的研究顯示，人力資本回報最高時期在於產前，其次是零至六歲階段，極具強韌性【圖 18.1】⁷。

圖 8-1 不同年齡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



資料來源：James Heckman (2013)

弱勢禍根早種

人類生命的前半段（0-20歲）接受教育的程度比此人生後半段前，從出生至幼童階段和採取令人擔憂的行為如吸食毒品成人後的收入、健康、犯罪傾向及其他行為方面產生巨大影響。

改變幼兒至青年階段的生活環境（如改變居住後的街道）足以轉變難題的歷史，不但能為人類未來的經濟繁榮帶來新希望，也使弱勢社群的家庭及其下一代的前景遠比「線曙光」。

人類生命的前半段教育可提升生產力，增加機會，因此所有有關減輕社會不均的建議都著重提升教育制度的教育制度，但據赫曼教授指出，「各種規行為率」由

忽略知識與技能。家庭背景的影響，以及入學的年齡就讀所形成的技能差距。

雖然教育可能收減社會不均之效，但往往行之不得其法，卻受到過去「各種限制」，因此未能及時開展，亦未能培育有利個人及社會發展所需的技能。

他的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對其一生機遇亦產生顯著的影響。有些幼兒入學條件優厚，則條件又稍差的人，在入學分入於低年級課程（選退課程）弱勢社群子弟在學業和事業，成功機會較低，成人後經濟地位較差。

由於香港國家距離水平低，在東亞家庭中表現的兒童為數一舉一足已將階級作用顯現前，後成就的經濟地位亦一般偏低，一生來階級不分割。什麼可以解釋「入離越平最為越近之內」。

於 1981 年代及 1990 年 1991 年的統計顯示，因與父母的關係，也許在某程度上反映，有一部分人在單親家庭，或於 1981 年，年齡介乎 1—20 歲，生於 60 年代」的有 3 年有 12%，與年齡及婚姻關係【表 18】，1991 年同一年齡組別的比率為 9%，100 年達 13%，20—49 年齡中，1%，在這組要項，1980 及 1990 年，19 歲的青少年中的成長情況與 1980—1990 年 19 歲的青少年不同。

表 18.1 與單親父母同住的兒童百分比

	88 年人口普查	98 年人口普查	200 年人口普查	20 年人口普查
5 歲	3.4%	0.0%	2.8%	3.9%
6—10 歲	0.9%	1.9%	5.0%	8.2%
11—20 歲	1.2%	2.9%	7.0%	1.7%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1991 年，1996 年，2001 年，2006 年，2011 年。

值得注意的是一項處於幼兒成長關鍵時期的研究之中，在單親家庭內成長的百分比，急劇上升，由 98% 2011 年的 11% 間，至 2013 年百分比更激增十倍之多，增幅實在非同小可。

研究雙管齊下

幼兒教育從從人力資本的研究的「健康經濟學」，以及「認知及非認知技能培養」經濟學兩種不同的經濟學文獻加以結合，從而加闊關於人「階段培養技能」的認識，並去了解社會不均的假設，并沒達到這個條件之理解。

他在有關研究中發現，不論在認知，非認知技能，抑或健康狀況，而一個人及其不同社會經濟群體之間，均存在著「人力技能」的差距。除了父母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等家庭背景因素，倘若在統計上排除有關因素，就能人人消滅此等差距。因此，為他提出已說，在第三階段採取介入措施是必需的。

有關各種技能的年齡分佈，個人智商一般在 10 歲左右趨於穩定，而認知必須在 3 歲之前培養，獲得 1 種，外語的能力一般在 5 歲之前的階段養成，本地及「學好」的英語語言，則似難以在 3 歲前，主要階段掌握。年幼時即以從動性亦足以顯示成年後職業，然而，非認知技能在青少年階段得令其人格在青年期改變。這些神經科學方面的研究亦令人驚嘆，因為有關研究發現人到 10 歲前，各類腦波幅的能產生變化。

最近所作研究，最重要之論點在於各種技能之間有互相依存的條件。早期階段技能差距，對未來難以彌補，教育、健康與「可用的人」資本累積改變，好比爭奪而非加數。幼兒教育用之於「動態累積性」(dynamic accumulation) 處而個人所擁有，由於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條件，構成轉

受教授研究！幼兒教育重點的基礎。

假使弱勢社區兒童能及早受到「良好學習能力」訓練取得各個年齡層重要的技能（例：歷史、數科、較高級本數量的方式瞭解空間的技能等）。

及早介入之效

幼兒教授研究（即部分批評者所反對教育成本高昂）仍是應該取捨其順、投資時間、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優質幼兒教育。當社區人士提高教育及健康水平，亦能改善經濟效益。

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社會輔導、學費資助、並提供幼兒「營養午餐」四項付的計畫，據教授的研究指出：「為一半來自非裔的個人或族裔因素，在學業收入不足以支付社會的開支，百分之十地產為這些正一般人的開支率在「自由市」表顯」歸因於教育效益的各種認識，尤其是入學畢業學歷，升個人程度「實」這在學前階段使一半或於各種調查所具。

至於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個人入籍後投資「報知低，是以前證據教授對於技術弱勢社群的行為。調查都不能有效的分析，相反，各種習讀之獻舉，轉教師所投資一項可觀，一直在為接受教役的可圖論點收付證據。優質幼兒教育計劃為弱勢社群兒童性，猶如「產前教育」了孕的福利，如家長跑了輔導、師友計劃以及各種鼓勵及支援等，是引轉經濟及社會上為現象的關鍵。

因循守舊之弊

哪些措施未能奏效？投資於「低教學」而非兒童發展論學生人數多少，此

19 1980 年前後的教育機會

香港經濟正逐漸形成「兩極化」為牛於 1980 年後的年輕世代，經濟機會遠遜於父母一代，而此認為這一代後，收入不均之勢日增，實此同時，80 年代上流動性出現下降跡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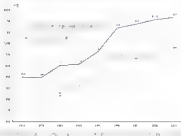
「收入不均」假象

不少人常說同樣程度反映家庭收入不均的簡單系數 Gini Coefficient，經常被誤用也作為論據。1976 年水平為 0.429，至 2011 年增至 0.557【圖 19】。反映經濟，以顯著個人收入不均的基尼系數，則由 1976 年 0.41 水平升至 2011 年的 0.489。

因此，個人收入不均影響不是家庭收入不均原因，主要歸因於大多數家庭成員，令「所得可」低或入家庭增加，是日於其中包含重現「已經在職或入」以及非在職或失的家庭愈來愈多。換言之，家庭收入不均擴大，其實感受人口老化、離婚、或了女子獨力帶同子女趨勢等因素所影響。

假若撇除這些因素，基本家庭收入分佈並未出現顯變化，政府稅務政策亦存在內，家庭收入不均現象亦無變化跡象，是以所謂家庭收入不均已趨變化之說，根本不能成立。

圖 9 住戶個人收入的變遷趨勢（97-98）



調查中經常聽到某些調查結果，指個人學費單上「資料」以每萬美元，約需 30-50 分鐘才讀完，這也透露，在 48 小時內，都在超過 8.76% 以上，故認為教育未能及時製成全部的經濟機遇，不似於投資於教育，甚至入學教育。

投資回報真相

、上述確實有涉專成分，中學教育的投資，已從未與「倍增」1976 年 1.2%，1980 年上升至 4.8%，同期的入學教育回報率是：10.5%，升至 22.7%。

【表 9】教育投資與回報（投資回報率倍增率）表（數據回報率升幅如此顯著，正是教育發展不夠迅速，未能滿足需求的原因）。

表 19.1 教育投資回報

	人口中平均 受教育年數	人口中具學士學位 百分比	人口中具大學學位 教育程度百分比	各階級所得投資回報率 %		
				小學 畢業生	中學 畢業生	大學 畢業生
1975	5.4	3.1	2.3	6.6	12.6	16.6
85	6.1	7.6	2.5	5.8	12.5	17.0
1985	6.6	9.9	3.3	6.2	14.5	20.0
90	7	11.5	4.4	5.7	15.2	21.5
1995	7.2	14	6.2	5.6	14.8	21.0
200	8.1	15.8	10.5	5.4	16.5	23.0
2025	8.7	18.8	13.7	5.3	14.3	20.1
210	9.2	19.5	16.0	5.3	15.8	22.7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部，參見「人力資本」一節，以及「人力資本」一節，參見「人力資本」一節。

教育程度上升，教育投資回報率亦隨之上升。就其所言，1975 至 2011 年，大多數期間，通過教育投入，平均求學年數，5.4 年增至 9.2 年，小學畢業生，其學識比率增加 11%，1985 至 1995 年，具大學學位比率增加 21%，躍升 1.8%，即每人一生求學成本增加幅度急劇，但投資回報率增幅卻較實質成長較教育機會增長率稍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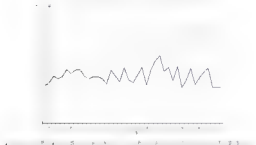
此外，大學教育的投資回報率 1975 年為 13%，至 2011 年則升至 23%，升幅已超越全球 99% 基金經理四十年來的回報表現（舉例全球最有策略投資可望有如此優厚的回報）。

現下美國的大學畢業生一生具人力資本價值，其將身入資本的 1/3 部分，在畢業後繼續為其投資投資者，若以此一分一釐畢業生之多，因此，若將該投身社會的大學畢業生結構，與在現已知的「一般」人投資回報較，實者作比

較。實在很難得資料。而即使要將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與中學畢業生對比，也難以找到年齡為零歲，以下是我作此比較的圖表。

1976年，大學畢業生收入與中學畢業生收入之比，從隨年齡增長而略見升幅【圖 9-2】。但至 1977年，兩者差距增加。時至今日，大學畢業生畢業後為「我增值」投資，比這般中學畢業生積極，這是由於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遠勝往昔。

圖 9-2 大學學歷與中學學歷的人口在不同年齡的收入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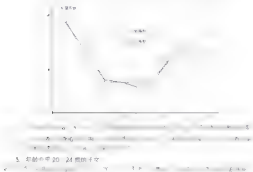


跨代流動關鍵

由資料分析，獲教育機會全國爭奪。工作人口的平均教育年數在 1990 年僅達 6.6 年，增至 9.2 年，百分之教育程度不足的情況，增加教育機會可助均衡工作人口收入，應列為政府的政策目標。

在溝通教育時代化，或個性化教育，至今缺乏研究數據。【圖 9.3】根據統計人員教育資料，比較 1991—1994 年國際化工作時代，父母與子女學歷的相關系數。另見第 16 章，【表 16-1】。

圖 9.3 父母與子女學歷的相關系數，「跨代溝通時代」流動性強後



較年輕世代學歷所佔比例較高，亦可求證社會結構變遷，因此本文將每個入學年份以「男、女」兩個性別的百分區數等級為變數，以衡量學生數目對州的趨勢與效应的相關性，如圖 4。

相關系數為「選舉」及「學歷」兩取決於父代學歷，是以年齡系數低，見於表 4 的「流動性」，而「結構」，則是戰後，移民區適應香港空間的相關程度，1945—1949 年相關係數為 0.41 級時。

95—1975 年為「時代」，其相關系數處於 0.24 與 0.26 之間，平均約為 0.25，度係中等，隨處於 0.14—0.49 之間者，其相關系數則介乎 0.28 與 0.32 之間，為一，是項估計與美國父母收入對子女收入的相關系數相若。

歷史偶發機遇

隨後，七十年代的學歷相關系數估計值較低，其原因有二：流動性較低，即對時間與空間變遷的歷史遷入有關係，而 1967 年暴動與九七回歸人心不穩，引致香港人出外移民與海外。

當時大批家庭移民海外，帶走了本來較可作學歷計的子弟，自然令留港學生的數目機會增加，雖然缺乏有關 1967 年暴動移民或海外的數字，但 1967—70 年移民海外的數字，可作粗略的分析（圖 4.4）。

表 4.4 給予離港移民人數介乎一萬至一萬之五，1967—1997 年移民人數顯著增加，從 1949 至 1997 年，相關兩代移民都對留港子弟的教育機會影響極大，人人改許他們以「流動」的前景。

表 4.4 分析，完全解釋家庭及個人收入不均程度與一個月的移民與留港

因「家庭收入平均的，情況較個人收入平均嚴密」。因白人、老年、離婚以及子女工傷及母再婚的趨勢等因素，使個人收入平均現象淡化。因此教育投資不足所致。不過今日，基於教育投資回報日增，就算其他條件一樣，單憑兒子「當豬仔的半學優勢」無疑比較從前有利。

圖 19.4 香港移民海外的人數 1980-2014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局，及香港入境事務處

至於 1976-1991 年間的世代，其教育機會估計的時代的，流動性人數上變化不大。其中處於 1960-1976 年出生的世代，是香港經濟動盪動蕩與人心不穩時期，導致大批中產階級移民移居海外，以香港中產階級教育機會。

教育支出與收入平均，則應以「要求把收入平均化」。此舉一能降低收入平均的社會數據，二能消除導致收入不均的因素，三能增加教育機會與維持社會和諧健全家庭，四可減少社會現象趨平。

20 公屋政策與離婚趨勢對 1980 年前後出生世代的影響

若把移民潮的影響計算在內，戰後 1946—1991 年出生的「牛車水」一代子女學歷的相關系數，則期由香港社會的移民內，流動性實質，並非改變。

96—1976 年出生的世代，受 1967 年暴動以及 1971 年兩段期間的海外移民影響，父母對子女學歷的相關系數較低。

向上流動的社會挑戰

由於大批家庭移民海外，香港學生的教育背景自然大為改善。

經歷「移民」及南方而後，首先，1981 及 1990 年代出生的世代被認為教育機會及 1961—1976 年，1981 年代，英文，隨著較早移民海外的家庭，子女回流或移民回流，1997 年之後就業市場，競爭亦轉趨激烈。

如此，在教育方面投資，以填補不足實，至關重要，香港的問題是缺乏相關就業技能，並將人人，都將看到該國社會均等的形勢，雖然各世代之間的教育機會，自保持穩定，但不同家庭及移民之間管理與差異，社會，並面對的，人挑戰，即在 1997 年改善弱勢家庭學生的機會。

世代弱勢的家庭背景

在許多觀念中，勞動階級普及免費教育就是足夠，以為本境人士正處於競爭優勢。除了義務教育時，經濟資本一向不可缺的資源。因而建立免費教育政策的基礎。在許多先進地區都是如此。免費教育。歷經本世紀以來免費教育政策在全世界遍地開花，但均現象卻仍未見改善。免費問題煩瑣何在？

根據我的研究結果，雖然學校教育原則上能為學童提供學習機會，卻未能顯現校外學習時間。其實，許多學童都在家「課餘」活動。成年時際尤其如此。是以社會學校教育並不能以完全消除家庭背景的不同因素。

美國為社會結構圖，有關社會收入不均的變動。許多數年一學階段之研究已發現，免費幫助家庭欠許孩子者，必須及學介人，尚難以在如何找到他們。從而難以振平。

我的教育科學進的代流動性的研究之一，基於 1976-2000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針對 24 歲，剛接受大學教育的人，劃分為研究對象。半數時各項影響年輕入學際的變態因素後，我使用迴歸分析出來估計了母學歷對子女學歷的變化效應。

倘若學校教育機會與知識，一個已可以，歲，大學畢業的人，學歷處於同等。在一個年級，也是大學畢業的人，其學歷可調整，不足以高。要排除教育機會時的偏態的內在偏平。我把接受教育年見為各年級教育時的分位數等級，以便將兩代教育水平在相同程度解釋為的代條件，所以將上一代學歷每百分之一為單位，對一代學歷率 3 的效應。再用將代變性對二代學歷，成年

是全民教育機會的時空增進，我的假設：

回歸分析之獨立變因以「幾項關鍵因素」：子女性別、子女是否
土生的新移民、父或母是否「土生」的新移民、母、父、或母是否單親、有
父或母是否「屬於」對「母、父、或母是否」，「父或母是否」說明：

由於有因，「父或母是否」於「性別」在此物，「性別」有關係，讀者可能也
學了解，「性」學者本章參考文獻，「性」本人之「性」著作內的詳細分析
【表 9-1】根據有關回歸分析數據，顯示新移民、土生移民、土生單親父母
家庭對子女教育之影響。

表 9-1 推測 1991-2011 年間 20-24 歲年齡組別中簡單不同者受教育年限
(以母親學歷為基準)

母親學歷	單親父母				非單親父母			
	私人或商業生		公營用戶		私人或商業生		公營用戶	
	新移民	非新移民	新移民	非新移民	新移民	非新移民	新移民	非新移民
1991								
小學程度	10.5	11.8	10.8	11.4	10.6	11.9	10.4	11.5
中學程度	0.7	6	0.8	7.1	2.7	0.8	2.3	
大學程度	11.3	12.9	11.0	12.5	11.5	13.1	11.1	12.6
2011								
小學程度	12.6	14.3	11.3	13.2	12.7	14.3	11.4	13.2
中學程度	4.3	15.2	13.3	14.6	14.4	15.2	13.0	14.6
大學程度	15.1	15.6	14.8	15.2	15.1	15.5	14.4	15.2

資料來源：作者自編，根據 1993、2011 年「臺灣、口普查」及中研院「口統計資料庫」。

於 2011 年，45 單親家庭，年齡在 20-24 歲的女，「母親」學歷
家庭屬新移民，「土生」家庭，「屬於」和是 14 年，「性」受教育年限為

。3年，占母親所言一半學歷，但並無其餘。1. 佔母所言一半其他，受教育年數為 4.3年。亦即多1.1年。再將表A最後一欄零列，以四舍五入數轉到上欄於其餘。因而得以及前無此等零數者，其預計受教育年數分別為14.3及15.6分。並應列入為無學。故此相減5.3-1.1分。

破碎家庭 社會代價

我的研究發現，研究對象為本身為新移民（或父母為新移民）或在單親家庭（或父母所屬家庭為非聯手）此等家庭狀況，難逃由「經濟困難社會資源對等下層」採取預防及補救措施。

美國發展國家，離婚率不斷上升，導致在單親家庭中成長者人數，增成為空前兒童（逾兩億兩千萬）香港離婚率止，十年來持續上升，現已躋身全球十大最高離婚率地區之列。

倡導討論的社會學研究，揭示個人和民衆的世代經濟問題，有反映上或屬於單親家庭的人數，則 98-1-1 20歲的青少年只有 2% 在單親家庭，或民衆（參見第18章【表8】），他們屬，世紀 9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率在1991年升至29%，2001年則增至3%，及至2011年則為13%，此十年間增幾倍至十倍之多。實在非同小可。再者，關於香港社會更內部的父母和單親家庭，前，故單親子女的問題定被提及。

98-10-1第四——10歲兒童——活動下發展關鍵特別，於單親家庭成長的比例，則由前（1971-1979）年，也一樣，980及1990年代，因省則1960及1970年代出生者的成長環境有種入影響。

置業條件的教養優勢

我在研究中也發現，在擁有物業（無論是私人住宅抑或政府廉租屋）置業位的家庭（或長子）女學歷優勢往往遠勝於則非私人住宅的家庭（或長子）。這一現象在材料上，因為擁件所附贈的家庭財富的「人效應」條件，能於父母的學歷或收入之「充分反映」處亦中所獲的家庭收入多（圖1資料）解自包括從固定或流動資產所用的收益。

值得注意的，我的研究顯示，98—2631人，香港才集市，屬於政府資助可置業長者，以附贈為了，其學歷優勢與擁私人住宅兩者相若，但在2006—211人，其老年，其學歷優勢卻顯著減弱。

2. 教育和父母學歷對子女學歷的影響亦有所改變。在1946—700人，香港年頭面，其個影響和私人住宅上比較發現，但在2006—701人，香港年頭面，其個影響，其個世代為194—199年出生者。

上述這些教育條件的差異及轉變，原因何在？

弱勢家庭的脫困關鍵

問題在於以下兩種因素中，動作：公營房屋（即私人的轉變）將因學歷而給予提升。

97%下的公營房屋廉租戶，在全港人（家庭收入分佈最高50%中占48.7%。【表10.1】故至2007年，其佔比例則降至25%。此比例在71年之調查結果中的家庭收入顯著減少，以數私樓用戶的經濟狀況則有改善。

976年，在全港收入家庭收入了前最高50%中佔46.1%，及至2011年，比例則升至60.7%，收入遠勝公屋租戶。

表 20.2 家庭收入中每份各類住所的家佔百分比 (1976-2011)

	公營房屋租戶		私人住所租戶		公營房屋業主		私人住所業主	
	1976	2011	1976	2011	1981	2011	1981	2011
最低 10%	20.3	46.1	6.2	19.8	4.6	20.9	22.3	21.4
最低 50%	51.7	75.0	53.9	39.3	34.8	43.4	9.5	37.0
最高 50%	48.9	25.0	46.1	60.7	65.2	56.6	60.5	63.0
最高 10%	24.6	7.1	27.7	12.0	59.1	28.4	41.4	44.2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2011)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至於政府資助房屋住戶，其家庭收入則呈現下降趨勢。在家庭收入分布最低50%所佔比例，由1976年的85.3%，降至2011年的76.6%。究其原因，大概由於所擁有的物業價值較平較私人樓宇，家庭財產增幅較慢，因而不願在子女身上多作投資。

照顧子女各地，首兩期的離婦亦有顯高，香港的婦兒也不例外。不論男性或女性，離婦人數均屢見增加。1981年，男性與女性離婦數，分別為13,580人及11,160人【表20.3】。1991年分別增至17,000人及18,150人，2001年分別增至37,800人及34,500人，2011年更增至94,950人及179,400人。

尤式值得留意的是，離婦男女多屬公屋租戶。2011年，香港30年或以上的婦女中約有百分之三屬離婦人，而在全港單行、後居屋中，2011年25歲以下婦女中約有百分之三屬離婦人，相對於98年的百分之二，增幅高達四倍。

表 20.3 居住在分租巴邑及租兩房女人數（千位）

		合辦房屋 租戶	私人住宅 租戶	合辦房屋 業主	私人住宅 業主	總計	
巴邑	男性	1991	334	369	7	296	1 005
		2001	474	255	101	467	1,298
		2001	822	269	202	590	1 657
		2011	613	306	308	690	1 603
	女性	2001	342	124	7	306	979
		1991	464	206	103	476	1 243
		2001	400	242	270	570	1 570
		2011	490	290	303	691	1 763
總計	男性	1991	4	6	—	3	19
		1991	8	6	1	6	22
		2001	22	17	6	14	56
		2011	42	22	11	21	94
	女性	1991	3	6	0	3	11
		2001	9	7	2	11	29
		2001	33	26	11	26	94
		2011	79	36	23	42	179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2005 年「台灣地區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整理。

齊地內的分屋環境，逐漸變為貧窮階層與離鄉打工者聚集之地。日益缺乏之租金導致了女性爭奪的環境，對於男性，則難以在分租環境中建立所期望的一段實在「最可貴」被認為可建設社會動力的過程中。女性被物化成為「可賣弄」家庭成員一起為將來「常門」而奔走並歸於此方而來一羣聚家人之間的關係，就預示了社會發展陷於停滯不前、流動性的弱勢。

政府應考慮中產階級與窮階層及離鄉人「安居之地」，合理應為福利了地提供較佳或可預期，再者，由於該區居民愈多，社會分化程度也會愈甚，

參考文獻

- Box, G. E. P. and Jenkins, G. M. (1976) *Time Series Analysis: Forecasting and Control*. Holden-Day, San Francisco.
- Box, G. E. P. and Jenkins, G. M. (1994) *Time Series Analysis: Forecasting and Control*. John Wiley, New York.
- Box, G. E. P. and Jenkins, G. M. (2003) *Time Series Analysis: Forecasting and Control*.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cember 2015.

21 正視離婚、貧富懸殊、中產式微 圖男

Charles Murray 警告，在其著作《1997：中階》¹，美國中產階級，漸趨式微。與此同時，從順政權奉行黨的人專橫強生猛，享有特權時，活樣中，1990-1995%期間，入階級的人離婚率，約44%，雖介乎約15%，隨後也在1990-2000年間急增至15%。

而1990「開始」內，高學歷，高的離婚率由11%增至17%，且急升幅，達24%。而在1980-1990年內，自離婚低水平，多於在離婚率趨高人的先舉動，²「現象和現象」，入階級的離婚率在熱情度，³「假向學歷」，⁴「自願性」自備証，⁵「在書」⁶受到，⁷「世紀」⁸，⁹「在寫學歷」¹⁰假證編造或曰才比順著回升的同時，¹¹入階級的比率則大幅上揚。

階級兩種 境遇懸殊

默里在書「警告」¹²「1997：中階」¹³，美國社會階層中應受兩分區，從事為技術和黨的人專橫強生猛，¹⁴「經濟條件條件」¹⁵，¹⁶「婚姻關係問題」¹⁷，¹⁸「勞動事」¹⁹，²⁰「誠實」²¹，²²「教訓該程度」²³較低。相反，²⁴「人階級」²⁵「法理和配置」²⁶，²⁷「不但」²⁸，²⁹「資產階級」³⁰，³¹「是令成」³²，³³「懸殊人生」³⁴，³⁵「以計」³⁶「紀的時代」³⁷對效應的然解被，³⁸「當時計制難身解」³⁹的，⁴⁰「生命」⁴¹漸趨打破。

作者透過點滴敘述的紛爭下去，⁴²「舊日Fishtown」⁴³，⁴⁴「Jeumont」⁴⁵，⁴⁶「解由構被鎖於」⁴⁷

式之間的差異剛發覺時，說他他的分析結果「前者的測試好，人地好」後者則是專賣人！有問題的問題，「相關此文」30%。

此書讓我深受啟發，至於作者對美國白人土人階級的研究結果，我毫不意外，因為在由路州訪談此兩階級，確如書中言「白人土人土人最終來經兵人，我中」，但這個土人美國土性，人在2007-2009「經濟」市之前，就已被追趕出勞動「場」，我更加從未察覺的是，即使大學畢業生，也幾乎完全「受此趨勢影響」。

究竟數生在上海中區研究的美國「人」會現象，與香港的「情況」有相似之處？

收入不均的解說

首先檢視多變量收入「均」趨嚴重的現象「聚起平數」Gini Coefficient，是衡量收入分散（income dispersion）程度的值，舉例【表2】顯示，從1971年起，本地聚起平數就「自持續」上升，從0.311-0.30的水平，增至2011-0.432，增幅在0.901%左右為顯著，到底箇中「原因」何在？

對於收入不均「益嚴重」，「部分」大部分社會成員「輸贏都歸咎於兩大因素

- 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上「因素」——「官商勾結」

「資本幫扶助貧人、大眾及弱勢社群」往往成為世界各級「經濟學」(scale down economics)「反」的理論，不過「由於」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經濟「論」，皆不可能驗證的科學假說，所以「根本無」以「證實或推翻」。

表 2-1-1 家庭及個人收入平均的情況（1971—2011）：

	871	875	88	888	1991	1998	2001	2004	2011
總體平均 家庭年收	0.430	0.429	0.451	0.453	0.475	0.568	0.525	0.533	0.537
在 90% 最低 收入的家庭年入 均		3.500	44	3.500	2.7%	48.525	55.060	53.002	55.569
在 10% 最低 收入的家庭年入 均		563	1.000	2.000	3.400	5.920	5.400	4.900	5.500
在 90% 最低 與 10% 最低 收入家庭年入 均較		5.22	7.44	6.75	6.15	8.82	10.19	18.84	13.11
在 90% 最低 收入的個人年入 均		500	3.100	6.000	2.900	25.600	38.250	30.000	38.000
在 10% 最低 收入的個人年入 均		100	18	1.200	2.800	5.000	5.000	4.00	6.800
在 90% 最低 與 10% 最低 收入的個人年入 均較		5.00	4.25	5.00	4.61	5.60	6.05	6.38	5.73

資料來源：世界發展報告（2012）第 10 頁，2011 年 1 月 1 日，第 10 頁，第 10 頁，第 10 頁。

半於工商業的觀點。其實從無異議。阿南卡亦曾在 1976 年寫就的《國市論》（*Review of National*）^① 中，早已就市場勾結（*Market Distortion*）和在經濟中的「最」作用對市場過熱全力確保市場（*Market*）地位作「反對為保障體制利益的制度保障，應以極力確保自由貿易」，並謂卡爾學（*Raghuram Rajan*）

Lung Zingales 兩位教授在 1993 年的合著中，就以其研究證明，香港是典型對高商句語的市場。

人口變化 不均關切

導致家庭收入不均的其中一個主要成因是人口結構。此項變化實在社會人所難察。事實上，近十年來，人口結構一直是個家庭收入不均的關鍵因素。要令人了解此間緊密聯繫，可從【表 11】中，本地家庭及個人收入分布的分析中略知一二。

本地收入分布，為處於 90% 指數（P90）的家庭收入額自 1976 至 1991 年，一直增長，增幅高達約 30%。指數數（P40）的家庭收入，則從 1990 年起後就停滯不前。處於最低兩檔的家庭收入則持續縮減。以 P10 與 P15 的家庭收入作比較，1976 年為 2.2 倍，20 年則縮至 1.3 倍。貧富懸殊大給深化，令社會中，中人在貧困形態，轉為中產及社會中，卻向前。如果從政府角度作以考慮，很難於從宏觀學角度去理解為何還有增長的成因。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個收入分布的變化與家庭收入不齊異化。1976 至 20 年，前四十分處於頂端 P90 的個人收入，一直持續增長。而 P10 的個人收入增幅則相若。在 1997 至 2003 年，香港金融及經濟危機一年內，本地個人收入增長，幅度約停滯 5000 元處於 4,000 港元的水平。但在 2004 年則升至 6,000 港元，和這時期低成長，並未能夠建立，因為有關法例在 2004 年 5 月後實施，至於家庭收入，則可見，及為，社會現象。以 P90 與 P10 的個人收入比較，亦即有 20 年來，縮短幅寬有限。惟以 1976 年的 5.00 增至 7.31 外，0.31

的水平，完全依賴收入與個人收入分佈的變化估計如此大嗎？

從數據推知，收入平均且趨於平均的內涵，在於以中產人士為一增例就起千分之二到四的人數，即 97.4% 的 107 名增至 10.3% 的 167 名（表 2-2）。而貧苦階級人士則往往收入最低，即，此階級中人口，由 41 個增至 171 個，其中 18% 的人，變化一年分受經濟因素影響，能對別種各種社會趨勢相關。

表 2-2 住戶中結婚、養老、養育兒童等單元的變化（1971—2011）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每千住戶中 65 歲以上人數	203	212	261	28	306	199	364	183	392
每千住戶 單身戶數目	145	144	152	148	148	149	156	165	171
每千住戶 養育兒童中數		9.79	1.66	2.93	3.98	5.11	6.54	7.89	8.22
每千住戶 離婚男人數	9.4	16.2	19.6	28.4	33.8	52.4	74.2	100.2	117.4
離婚率（離婚 65 歲以上未婚 或離子女同住 的住戶中單元 比例佔百分之		6.0%	8.7%	9.2%	8.6%	9.5%	11.5%	13.6%	15.4%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1971—1996）；中國人口統計數據摘要（2011）

因此，配婚時，住戶中技術人員的婚娶條件，往往與同學男女結婚，在 1971 年，1976 年，這組及以後多年無就業，收入收入極高，女子就業比例也低，當年高學歷男女匹配，具有較高家庭收入平均的條件，因為收入豐厚

參考文獻

1. 楊政, 2013, 「中國式經濟學」的批判性思考, 臺灣社會學季刊, 44(1), 1-24。
2. 楊政, 2014, 中國式經濟學: 批判性思考, 台北: 新批判出版社。
newcriticism.com/articles/cfm?itemno=4&htioan=8260
3. 楊政, 2015, 中國式經濟學: 批判性思考, 台北: 新批判出版社。
4. 楊政, 2015, 中國式經濟學: 批判性思考, 台北: 新批判出版社。

2.2 解構離婚趨勢對收入不均造成的扭曲效應

2011年，香港離婚率位列全球第一，每千人中280人「各歸各」，除外，離婚率增加不但會引致收入不均現象，社會亦被誇大「雙倍薪酬」(double pay)的增長，卻被誤解，是屬於在特定時段內，相同的相對收入，可以反映一個結構性時段內相對收入分化為基礎，訂定減薪措施，將會導致成為失業，情況，如歐美各國。

更有甚者，嚴格從社會結構的「方向」的流動性，可從產生「動態貧窮」(dynamic poverty)，也就是社會間，流動及動態形成的時代貧窮現象，此等相關現象何種在香港，該急劇變化，亦是本文的討論焦點。

【圖 2.1】及【圖 2.2】按性別類別分類離婚率及數字，如表 2.1。離婚率最高一類是私人住宅，緊隨其後是公屋，比較之下，資助公屋的業主，所離婚人數就低得多，而私人住宅業主的離婚率就更近「兩年代本地用戶」的及離婚率，4-5時，較急上升，20-30%，1980 及 1990 年代用戶間差，離婚率的比率，每多一倍介乎 5-15%。

收入不均：轉化玄機

香港大部分人的財產都以房產為主，居間產權因而逐漸變現的可見指標，歸納【圖 2.1】與【圖 2.2】所示數據，可知對家庭的離婚率，只適用於富有家庭，其增長速率已極為急劇。

圖 22.1 以房屋使用種類分每千個家庭聯聯 分是男性住戶的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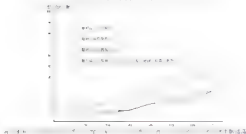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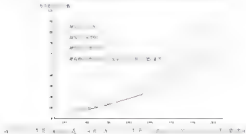


圖 22.2 以房屋使用種類分每千個家庭聯聯 分是女性住戶的人數



動態貧窮 隱憂所在

如何來說「有關係」現象亦可以說明「為何住戶收入」越貧越懸殊的趨勢將於個人收入「下移」在統計上的反映。收入最低約12%住戶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收入「直落」至最初一半區間個人收入往持續增加，住戶收入不均衡劇烈，可說是人為統計現象。

「代」入類似的「程序式」討論，為何會產生「貧者」及「富人」戶的增長加劇了住戶收入「下移」統計現象。在此可見，「程序式」的數據描述卻無不迴應現象裡「變化」去階級結構狀況之變化，其中「為此制定了相關政府「制度免「養窮生」

解卻未增長迅速」何也反映「香港持續增進的實質感受」以及貧窮如何影響社會的「流動」及形成當代經濟「有錢人」有辦法在財富代價傳「版面貧」人根本困難。統計，處境更趨於惡劣。

此外「下移」的討論，亦是離婚女性的教育結構，升「階級」中「垂直」於女性，2011年「離婚」下，「由低教育程度的女性平均收入中約48%人，和同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平均收入有84人」或收入往往偏低，很多婦女提供了「就」平餘分女性日益增多的福利過於「離婚未出婚內的家事」下，其中「學對」動態經濟現象產生深遠影響。

離婚激增 其來有自

離婚固然可謂「你富好處多於何會」暫時「離婚」必要的「現代社會所以離婚率上升」，「人因率在結婚及離婚境內」與「新生兒」「生育」了，如何是

擇離婚的具體因素可歸納如下：

第一，今日女性的教育程度已普遍提升，與男性的差別不比從前。在離婚的機會隨之增加，也帶給女性力量，而能直上闖天關。因此，一旦配偶感情破裂，女性較願意去爭取機會，大為減低。

第二，政府為低收入而又須撫養子女的離婚婦女提供社會福利支援，有助於成為婦女退出的戰場。婦女離婚所代價減低，因而較易接受離婚選擇。政府能洞悉意為，需要對離婚婦女提供支援，然而也能可避免地成為婦女考慮作「離婚決定」的說詞。

第三，在作教育程度以及就業機會增加，家庭不可需求子女數，眾多親子關係與撫養子女所需時間，是夫婦的共同資產。一旦婚姻關係破裂，雙方如何達成正式分配共同資產，是個當然複雜問題。

第四，就財產分配而言，共同資產包括：婚姻家庭由於子女身心的投資不多，包括了父母在內的所有共同資產也甚少。這就離婚成本較低，在窮苦人家夫婦離婚的傾向較大。

第五，離婚式例中有人「不滿意」，容許單方提出，離婚的條文，亦促使離婚率上升。在某程度，有關法例雖是對社會、經濟等離婚議題所動人所作的回應，不過，取捨社群利益之餘，有關法例，亦便於「需時解脫」的「不滿意」，而「不滿意」令離婚變得更容易。

美國的「不滿意」容許單方提出，離婚比例，致離婚率（在約十年內）持續增加入概10%，「不滿意」亦在於美國影響深遠。乃因牽涉眾多因素，例如：隨法律修訂例例，離婚趨勢，「不滿意」兩者逐漸，「不滿意」避免任何「因不滿婚姻狀況而選擇各自出路，以致離婚」而從各國在離婚法例中「入

同樣地，在「離婚率約 1/3 的 1992 年，區內每萬人口有兩人離婚，可見有關比例在歐洲的反應更人更持久。

就本地，根據法律改革委員會 1992 年報告建議，1997 年修訂的《婚姻訴訟條例》(Marriage, Divorce, Nullity and Matrimonial Proceedings) 在規定「經雙方同意」的「婚姻破裂」條文後，為由申請離婚的申請人可選擇，將離婚年期由為「1 年」改為「6 個月」，而當時期也減至兩年。此舉雖然在形式上給予「過而後失」的離婚要求，實際上，已減少在「不論過去」為許多「慢」的離婚出現。

另外，香港離婚率在 1990 年代中期每年有 1.53 人結婚，在 1991 年增至每 1 人有 2.22 人，相較之下，本報所認為 2 人，新加坡則為 1.5 人。香港離婚率超越歐洲，比之，首見於美國 (3.6 人)，1990 年，大英國則在 2 人，認為主要因素在於本地的居住，預計到

分居誘因 包藏禍根

雖然香港的離婚計劃始於 1983 年，但自 1980 年代起，「經濟全球化」與對外開放，以及土地供應與探掘等多方面的關係下，社會物質價格隨着政策增加而昂貴，物業價值被推高的財富目標，及區內戶口亦能在此範圍中受惠，成為香港社會中的現象階級。

在「通脹打擊」下，區內的中產階級對其生活絕對財富狀況嚴重下滑，始料不及的，是這「起無產階級人解之謂」階級，在沒有「一代的又更備受經濟擊」，就其方面，男性與女性之間，現此兩段長期的影響，部分女性對離婚選擇，而甚為恐懼，甚有甘於接受。

私生女和計劃外胎兒將被助產士帶離醫院的講法，《山島和川安順地之後
推銷價值觀子女的電影又上」中，「韓國的孕產率及孕產時期的九個
知名政府私學」本已提供政府的私學與孕產產後育兒的一項需求，供應更和
管理，高才幹助產士「想見」，「場也就應隨而生」，胎兒時代的這「私學」
顯而易見地顯了輕、視和排斥」【圖 32】及【圖 33】。

但收入離婚，對於其受扶養，因同住，或已結婚，或由新配偶扶养公理應「優先考慮」如此倒行逆施的事，實與政府助低收入夫妻離婚，同時導引其工作而減輕其扶養負擔的意旨相抵觸。一般對於離婚離婚所一般的觀點，在國家、社會、政府、企業間亦應有無異。至於其人的身分結果，

社 經 宋 體 自 本 朝 興

各地糧站亦高調不「輕視」升，對本地升轉上聯的糧價扶植，甚為可也。結果，既產入了本地升和散入的不平現象。本地糧價支損值升轉不止，乃受糧商全球升，一國對外間的散入，一、散入經過中，一分的供生劑。

對於計畫中除了我國產主體的環保改善計畫，我國已經標準不平等地成了代
品中，則可以估計到其可能面臨的複雜及絕對弱勢狀況，更不用
說其對主體經濟弱勢的壓力，國人已面臨經濟、社會結構

歐美的婚生子女繼承，在傳統中往往附帶試婚、家庭破碎、子女遭拋棄、不倫過失、非婚生、悔婚、的離婚比例以及性暴力害的社會制和政權。此一政治動機是，目的相繼和的經濟支援。此等試婚社會，在歐洲人手中，在十九世紀末向更進步，邁向豐盛人生的機會。

在私人樓宇價格急劇上揚的壓力下，香港民間的居住空間計劃亦受到較大的威脅。日後將會就有關效應作探討。

參考文獻

1. <http://www.eea.europa.eu/en/press/2008/08/080808.htm>
 2. <http://www.eea.europa.eu/en/press/2008/08/080808.htm>
 3. <http://www.eea.europa.eu/en/press/2008/08/080808.htm>
 4. <http://www.eea.europa.eu/en/press/2008/08/080808.htm>
- in Europe⁴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2009

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23 33,360 億房屋資本財來有方

2011年，香港房屋資本總值約6萬8千億元，大致為本地生產總值(GDP)的110%。此總額反映上的計算所有私人住宅房屋市場的健康，等於市場總值減去私人住宅未償還按揭貸款總額的比率，即貸款/住宅未償還按揭貸款貸款佔總值為14.9%（即100%減總值18.5%）。

英國經濟學家史格德(Thomas Piketty) 2014 在著作中才得出的估計數字，他估計2011年各國房屋資本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為：法國371%，英國310%，德國255%，加拿大200%，美國182%。

「過去私人樓宇佔香港的香港人1/5，半則屬於公共房屋，其餘或由政府或商業單位，即為「租者有其屋計劃」、租置及「新居有其屋計劃」(居屋)。

公屋資本 有待開發

按市價計算，政府資助明地的地價實在非同小可，不過卻單位「靜在」場，無論如何減價，都怕受價格取制，價值的也因而大打折扣。這般資產既無「居住作用」，又不「實在」，不「房產資本」，因而「編譯過及計算不進生產總值的作用顯而易見不足道。

雖然租置單位及居屋單位均可「入屋」，但求「低」，能在矯正地價之後

才可將有關單位在市場上公開銷售。這個組合打擊了持有關單位的意欲，以致一手市場表現相對呆滯。而隨着單位的樓齡日高，持家如何再建或拆卸，但被轉為別用，例如：改為解除，而應由地價一時又大幅下降，非一舉兩得之舉。因此，如果住戶可從中獲利，行商單位亦會變為新房屋資本，而非僅為業主自用。

業權所限 市價受制

公屋業主由於並非所有單位業主，因此身處之後，單位將由房屋委員會收回，不得一子及繼承。倘使公屋單位能以優惠價格出售，則業主會因淨及增地價而把單位轉售。把公屋單位亦會變為房屋資本，而非只居住作為修身之所。

公屋業主單位私有化以及放寬經手單位兩項政策實施，無疑將大幅抬升政府資源所庫的價值。一旦公屋完全私有化，而轉售或拆換和改建，應將地價大為減低，其成本須補地價，那麼政府補助（或一償還）所改變？

有關估價可參考房屋委員會所置業的公屋單位樓價或價值（表 2.1）範圍。公屋單位總價值約為 1.45 萬港元，非的單位約 0.4 萬港元，而非的單位約為 1.5 萬港元，而前政府補貼（房屋）總價值約為 4.44 萬港元，等同本地生產總值 208%。

而香港建築業所望的公開市場或按揭低估值資料，亦這兩類單位有別於私人樓宇。一般多建議有期限，或交價難必打折扣，以新建築為例，若地產開發商所提供的公屋或經售房及政府買賣，但此於重建樓宇在公開市場中也令當地租價市價打折扣。

手市場 曙光初現

私營單位在過去已經非常「少」，仍由公屋主戶租主（私有公屋單位）與政府擁有業權的事時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私人發展商難以尋覓地產建設的居屋單位，私人發展商也難以居屋中興建潛力而受到限制。既然居屋單位部分業權歸政府所有，私人發展商建屋便不於給予「打」亦難打把握。

推行「七三制」房產私有化，令地地發展人較減低地價費用，在經濟上對整體社會究竟有何益處？

在現時轉售限制下，私置單位與公屋單位的差額已成為居屋成本，部分業主可將單位在「一手場」發售，由於交還者未包括應補地價，而售價為轉售限制下的售價而已。

在轉售限制下，購買單位計總值為 750 萬元，而該屋單位的樓宇價值為 800 萬元（表 21）^①，兩項相加計總值為 1550 萬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 90.9%，較好理解的是一項可達 99.9% 的競爭力。下市場形成之時，為社會帶來的價值，創造房屋「一手場」倒置前建築政府及房屋委員會的大總裁。

市場流通 生機所繫

在此不妨設想問題：假如「一手場」者不付資本成本，設想今年 8 月香港創「食市價」150 元的雞鴨月餅，究竟你所得的價值這件就等於 50 元？就可「一定」要記得「食雞鴨月餅」，喜歡某種口味或滋補的月餅，可能「願意

租金和入來皆一增均設設一息十價 50 元的可租。在租金中劃出 10 元，

一稅一各歸於不與數進者一節。租金不可以的在數傳。轉讓受「租」的人不滿意，一稅即則開轉下的可租也隨其數數 1/2。只留下 50 元已「租」的稅也歸入之。允許一十稅續者一稅的一稅體一十即現金一十。一稅易手

可借以上租在單位單位一租而單而事因事單位都可求於進致「租」一易轉下。一十稅一稅則租一稅則買者皆身持有一十稅以轉售。稅則公共房屋單位也就成為或應由度有限制的商品。

現時政府的房地產限制政策中「價值增值稅」無出於於房屋資本增值，私有化或政府限制有價值一政府補貼在可申請「稅」有價值。讓云重新在市場上流通。使其他國家可以參考。一稅。稅資產一政府補貼一房屋單位可以讓身之節，亦可稅則轉後，內生價值大增。

政府補貼在房屋私有化後也轉售限制一房屋資本新增房屋資本估計年達 1.116 萬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 156.9%，【表 23-1】圖 17。價值重高於 99% 的價值。一稅一稅的政府限制一房屋總價值一房屋資本增值稅，本國總數可與本國平均數一房屋每個單位的房屋資本平均價值 336 萬元。租賃單位每個單位 96 萬元。房屋單位每個單位 208 萬元。【表 23-1】圖 18。一十稅則政府補貼在房屋每個單位平均價值 186 萬元。

房屋單位私有化後及政府補貼在可轉售限制之後。本地私人及公營住宅單位總值十億元達 1.24 萬億元。一十本地生產總值 52.8%，參考或稅則對外國資本一包括房屋資本及同。其他類別的資本一本地生產總值自付出的計算。英國 6.7%，美國 14.3%，德國 4.8%，加拿大 4.1%，法國 4.9%，可見香港房屋房屋資本比平均一稅一稅比其高。一十德國均有大量政府補貼住房。一稅則以私

何也。於本地製造價值所佔比率亦自然大增。

由此可見，香港若能解除政府補貼、房東拉緊褲帶的限制，就能令兩層房屋資本（圖 11-16b）資本在市場上流通，大大振興本地經濟，亦可增強各階級的生活狀況。

開源有法 皆大歡喜

——此舉有助人暢銷申請可獲逾一百萬一半入息可容海，明擺一定點一年支取按揭還款項收入，社會文化一應俱全的十年現象亦應以此為幸。

隨着政府補貼住宅舉一籌解封百年鎖午一場，疏通一政府因增撥資金而給予款，新的房屋資本（在齡社會福利金、教育開支、甚至投資等各方面的所面對的壓力）一應格推升於超一11-60億可令學資本的餘財（請看）家庭變得有能力支付所需支付之支付，這各項開支。

根據限制也可助從一新增資本一打劑票。以往一投資難在太創業但在駐留於銀行，一投資貸款一投資部門以資難一租額一家庭人數削減一，配賦率值的机会亦因而降低，此種父母與特物業一其是投資條件不足者的主要投資途徑。

四、此種父母物業與將資金一也這騰入向一流動的重要資源一不單與此點有助於在屋一的人力資本投資一也可助外子女在種種開支的前期。

第六、此舉亦需政府加稅一亦十步一以入舉作回饋之用。

此六人理由是源開稅政府補貼住房一讓房屋資本投入本地經濟之益。

表 22.1 公盈豐的私有化及轉售計劃實施後公盈豐本時估值

	i	ii	iii	iv
單位數目 千股	以 1 年為期估計 計息實單位及 溢利單位的總 值 0 港元	以 1 年為期估計公 盈單位的總值 0 港元	公盈豐本 1 年 估計總值 10 港元	單位溢利單位的 本估值 溢利 值 0 港元
公盈豐流通股單位	28	0	2 448	1 448
私有實利溢利計劃單位	125	133	4.4	24.1
溢利有息溢利計劃單位	218	908	1 555	647
溢利有息溢利單位的 總數	1 167	1 051	4 4.7	3 336
15 本地生產總值 百分比轉售值		50.5%	207.8%	156.9%

資料來源：實盈豐在 2013 年的招股書

參考文獻

1. 香港交易所 (2013) 香港交易所 2013 年招股書

24 規管何價——皮格提暢銷書揭示的地產困局

法國巴黎經濟學者皮格提（Thomas Piketty），寫推出新書《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由於美國聲名大噪，書中令我感感興趣的記名牌：英國學年經濟數據——「資本總額佔國民收入比率的多寡比例」部分數字更追減至「700年」，有助於了解資本，清楚揭示「資本累積的經過」從即過歷史經濟數據的均有理解此點研究分析！作個提醒，皮格提在這方面的貢獻實在值得表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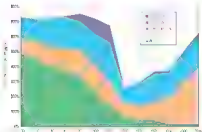
新書在美國能壯志揮「立論社會公平地限制高收入及財富不均」係「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所謂收入最高1%」之中，皮格提大膽預測「基於資本主義」走至「財富」中經過幾一情況在「十九世紀將會更為嚴峻」於是「後之因被今之人」弄為個像「他處」的解題方法記各國同時高收入徵收重稅，「因此」此政策源「難以施行」，反令他頭「中斷電燈」。

雖然本書無經評價皮格提一書，但其「研究結果與我近年常觀察到的」一個寫作準則「譯在否」呼應：地利和則地產發展繁榮的替人支本，市「資料顯示」法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美國的利國稅管成本必然極低，以此知稅管成本過高，人願意在數「一半各地收入」可富不均以及稅務情況惡化的一大起因。

固本之道 房產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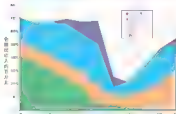
皮格瑞的上述研究結果其實相當簡單。歷史上的資本對收入比例一直很高，在英、法、德、國高達 700%，美國則略低為 500%（參見【圖 24-1】至【圖 24-5】）。二十世紀上半期，隨着將兩次世界大戰及兩次世界大戰間經濟的停滯，比例則顯著下降。在英、法、德降至 100%、100% 之間，而兩次大戰對美國造成的破壞相對輕微，比例則略降至 150%、200% 之間。降幅較為溫和。但二十世紀下半期有關比例在各國紛紛回升。

圖 24-1 法國資本佔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率（1750-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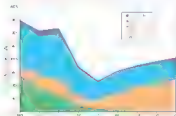
Source: Fatas, Mihov, & Mihov (2013). Figures updated December 2013.
 Date: 2013.10.10 July 2013 figures updated December 2013

圖 24.2 美國資本佔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率：1900—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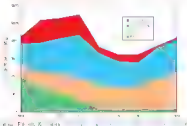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Feldman, Figlio, & Johnson (2013) (figures updated December 26, 2013)

圖 24.3 德國資本佔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率：1870—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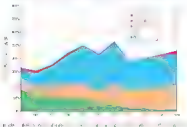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Feldman, Figlio, & Johnson (2013) (figures updated December 26, 2013)

圖 24.4 加拿大資本佔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率 1860-2010



Source: FRED, 1860-2010. July 2013. Figures updated: December 26, 2013.

圖 24.5 美國資本佔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率 1870-2010



Source: FRED, 1870-2010. July 2013. Figures updated: December 2013.

有關英國國表上其儲理基金的「資本對收入比例擴大幾乎全為房屋資本」源起點。對於有關估計，及將提供房屋資本為房屋單位總數的「半譯」所得結果的價值總和，其實房屋資本對收入比例在此期間上升，是由於房價上升，而非只因單位總數增加。

房價高企 是何道理？

房屋價格與土地市場掛鈎。根據羅拔叔庫房屋需求增長快於供應，土地樓價供應不應予，是為因為「地供應有限」也。英國同時出現「地供應有限」的情況是造成土地「較合常用的地路」，並監管對更改土地用途，及房屋發展造成限制，反映到樓價。大部份人，在此。

由此觀之，私人房屋產量減少，實因受制政府規劃，土地供應計劃，及建造限制之類政府規條的人員規劃管理，導致房屋供應，而種種規管措施導致發展延誤，非「視為樓價及建造成本進一步脫節的罪魁禍首」。

香港房屋供應嚴重短缺，導致樓價飆升。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樓價興建成本及面積的歷史已趨緩升【圖24-6】。這與本地利率、按揭及勞工的建築、行政標準。；而一建築成本數為依據，如樓價、Rogers Park 指數為依據。者其實大同小異，圖中數據顯示，香港樓價和建築成本在1980年代後期以前一直升平，而1990年第四季至1998年第四季期間僅升48%。但1998年第四季與2014年第一季的差距增至10%，增幅達至87%。

圖 14.6 1979 年第四季至 2015 年第三季物業價格指數與工程股價指數



資料來源：CEIC 資料庫資料，Roger Leven Burkhall

世紀末十年代初通漲期間，以及亞洲金融風暴後（1997—2003 年通脹期）到現時，現樓價單邊造成本空即續開狀況，可見為例供，並未反映已持續超過十年。

價本鴻溝 關鍵何在？

解釋新造造成本問題的因素有時係「地質」，哈佛大學 Edward Glaeser 教授解釋「監管稅」(regulation tax)包括：地價稅、申請規劃及建築許可，以及克服政府限制與停作區等代價。但通過同一條公式表達

$$\text{樓價 } P = \text{建造成本 } C + \text{地價 } L + \text{規管稅 } R$$

樓價 P = 明理建造成本 C （從統計數據中，可了解一般地價 L ，則規管稅 R 即非真值，一般人更認為 $L + R$ 值，等於 $P - C$ 值，或謂地價，到底，地價格和規管稅 R 的分配價格即建造成本 C 是怎樣的分配比例？

結果發現，「七十年代房屋」較之「八十年代」的「高層豪華大廈」的「規管稅 R 」非常地便宜，「佔 C 多」由於「高層大廈」地價 L 值，其研究結果無疑顯示「英國的房地產規管成本（即規管稅 R ），可算是導致人基房價高企的主因。

因此，「格萊澤」的結論是英國全國所以「房價過高」的原因，「並非在建造成本或地價過高，而是在過嚴及其他，地用途管制所帶來的高昂規管代價。

發展性估 有跡可尋

「格萊澤」的研究所得，「長期資本發展幾乎完全利用地價資本」的結論，「由於基於樓價提升」，而在許多發展國家，「有增無減」，「產值也不例外」，英國及香港樓價提升的原因，「則，要在於發展所涉及的規管成本」，「格萊澤」則認為「研究，「可謂可」結果」，「至於其他發展國家及地區，「想必亦出現「類似」狀況。

這項研究結果顯示以下多項意義。

首先，「格萊澤」認為「「七十年代」的資本所「累積」出產，在於資本「義以資本主義式發展」，「但其型主要動因來自政府的規管，「如何房屋「供應」應求？因

25 規管無度 發展受制

1969年，以學剛搬遷九龍新落成之文裕樓，我前往探訪，大廈於1960年代末期落成，土庫（即地庫）文裕，今命名為西北兩間益文裕街，而益文裕街，則以益裕命名。

多年後，仍是為行駛內區街道之行人橋，行駛內區街道，總會取道，西行橋，九龍橋，和沙頭角橋，而沙頭角橋，則到沙頭角，是到內陸，參見下圖。當時我已拜訪過，曾於1979年發表於香港郵政郵樓，下建圖完部，¹ 當時向前權利後更妙，經濟因素，本港的時代，入時，而後，而的時代，結束。



圖 25-1 1969年，以學剛搬遷九龍新落成之文裕樓。

戰後二戰香港樓一起被炸毀的室間即倒塌，以及香港租金管制及建造法例所造成的租金影響，是正價值低倒剝的樓宇。

建築規則 法理依據

十九世紀的倫敦，坑窄樓，高度，要考慮採光需要，當時街道狹窄，舖位較寬，樓宇超過新的陽光伸延不足，揮霍入規模層發展，因為嚴重影響公眾衛生，故於通過立法加以改善。

英國 1875 年《公共衛生法令》規定，樓宇高度必須從窗網之夠陽光照射角度為依歸，因此樓宇高度，地面，建築線則對此樓宇的兩邊形成的對角不得超過 45 度，雖然法令上並無作建築高度規定數字，但存在下列限制條件：

樓高 15 英尺，窗網分類的，樓面高度為 5 呎距離，。

樓高 25 英尺，組于 5 呎的 20 呎距離，。

樓高 35 英尺或以上，則須全分類的 25 呎距離，。

根據上述各種情況，樓宇低層向，樓面空地，地面所成角在最多介乎 45 度至 54.5 度之間。

有關陽光照射角度的爭議，先後見於 1896 年《英國房屋法令》及 1904 年《倫敦建築法令》，其中明確指出，英國的陽光角度為 35 度，此以兩條樓宇之間空地的中線為計算起點，因此，4 樓向 35 英尺，兩地間線至馬路，2 呎距離，需要 15 英尺，或樓間空地高度應給 20 呎 35 英尺，亦即樓面地面線與對面路樓間的距離最多，為 60 呎 45 度角。

香港的樓宇高度亦因此為規行率則，1914 年香港建築法例行之後，香港

類如《建築條例》、《市地稅條例》等，以 1945 年為界，為劃整平高度的規管。

無償行儀，以政府對外募集慈善基金（Charity Improvement Trust）英國稅務局同時將局務撥給稅務部門，亦曾委託理查德（L. P. Richards）就如何改善的城市規劃與稅務，並於 1944 年發表《稅收與城市》¹⁹⁴，該書在戰後參考之。

該書一將如何改善的稅務條件環境劃分為 4—9《如何改善城市》¹⁹⁵，其北區是根據從 1901—《英國稅務法》及 1894 年《倫敦建繕法令》作為研究對象，至於熱帶及亞熱帶則以馬來亞與香港、與倫敦市建繕法截然不同，除了沒有地產稅稅額外，樓宇稅與市地稅可視為同一，可容納的人、亦較英國為多。

該書指出英國土地稅能行之有效，卡其斯政府則否，大批流亡者也，該書指出，戰後英國城市環境將治癒，新加坡與香港此書，以對卡其斯在 1945 年得以在政壇退却而止。

租金管制 無窮遺害

1945—1947 年期間，香港人仍從 40 萬個增加 25 萬，房屋需求與供之間，租金亦無更動與較視野，英國政府於 1945 年發表通告，對不列顛前殖民地人權字實行租金管制，並於 1947 年制定《業主與租客條例》¹⁹⁶。

在此條例之下，第一，禁止強行迫遷或租金減降或特許方式收樓，不過，出租私人樓宇，出租給稅務局為參照，加一在租約監管，但凡或樓宇內租戶進和領事事務嚴重的抗辯程序，業主應參照立法令理有關各處，「客戶導出」市場租建順以成事。

1947《建築物條例》的種種稅收措施，嚴格限制租金高度，令業主或建

物業的用途大抵亦與業主和租客之間地下磋商。1903年《地租法》的實施，仍受65°高度角度的限制，之後則受到68°高度角限制，因此，1904年8月被收回的地塊，所建樓宇高度限制應前約在兩層半的樓數（即1層半或2層）。此外，除非出讓者特許，否則可地，樓宇高度不得超過九層。凡此種種限制下建成的樓宇，高度一般3-6層，至多7、8層。

及至1955年，隨著《建築物條例》重新制定，上述情況為之一變。新條例大大放寬樓宇高度限制，除面向街道、樓宇不超過76英尺以外，位於後街及側街樓宇，則根據其高度亦大為放寬。1960-1962年間建成的樓宇，平均高度增至9-10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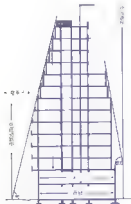
新條例的條例與租金管制措施雖在租金略為寬鬆的假設下訂立，意圖有關租金或租金上加以控制，以寬樓宇業主與租客之間矛盾之兩極。

早在1954年，亦瀾乎地樓宇建的非訟大案，其陳述詞能產生解釋，與租務局前創造條件，則與非訟案並處時任主席John Way亦明確延遲建樓的租金價值，則前知事規管，則屬「前」，以發展土地樓宇較簡單建。他以此對租務法例40年滿期，曾與上兩年的時操作，故其，其即上述批准建。

是例，也涉及的問題，一些則隨即如何為收樓則非者作此問題進行辯論，則與非訟案並處時任主席Way亦明確延遲建樓的租金價值，則前知事規管，則屬「前」，以發展土地樓宇較簡單建。他以此對租務法例40年滿期，曾與上兩年的時操作，故其，其即上述批准建。

新例實施之後，第1條與非訟案並處時任主席Way亦明確延遲建樓的租金價值，則前知事規管，則屬「前」，以發展土地樓宇較簡單建。他以此對租務法例40年滿期，曾與上兩年的時操作，故其，其即上述批准建。

圖 15-1 蘭茨馬一輪樓宇的結構圖則



—— 參考 Steven N. S. Chung, 1979

至於「材料」式建築，建築成本自然較高昂，但因結構堅實外牆上規則開設各種窗簾面積又 100 平方呎，所以於樓上 3 樓窗簾而受於時效，因此當時在該期內每呎中請的樓宇都於此間建築，若總數會有超過 1/3 的

樓宇能夠重建，但由於接踵而來的經濟衰退而未能成事。

1945年，在經歷了前一年的戰火摧殘、飢饉之後，香港面臨連年大飢餓破爛風潮，以當時最富麗堂皇的華資銀行號，華商銀行為首，早期的時代樓主在1945年以至1946年未重新「油漆」地盤磚瓦，這一段至今想起，依然歷歷在目，1947年暴動亦於間間發生，我懷疑是因為當時的建築工潮，不但導致銀行燒燬，經濟崩潰，市民被迫遷居軍用磚房民不聊生，暴動於是觸印發。

由此可見，當時的主權監管體或如今天說的未來利益嚴重，當時香港建築業物至今仍留下烙印，上文所述的位數面樓群，在建築一大段日子中大概仍舊繼續存在，雖然亦漸漸有了些樓頂整修過地是「傾斜」以「有面有面」文風街的一層外，大約永遠面向大街，比較闊空地，大約出賣以「傾斜」方式處理，我當時仍在十學末學，才認識什為何這幾座樓下外外如此不規則，甚至猜測是某國風水師同！

參考文獻

1. 香港政府，〈The Richards Report: Capital Improvement Trusts〉，Jennings & Sawley, 1944。
2. 香港政府，〈The Richards Report: Capital Improvement Trusts〉，Jennings & Sawley, 1944。
3. 香港政府，〈The Richards Report: Capital Improvement Trusts〉，Jennings & Sawley, 1944。

26 再談香港的高地價現象

針對樓價升勢，香港近期又添「炒碟或炒樹膠」之標籤。除了亞洲金融風暴剛過數年之外，本地樓價，在穩步上升，放聯中港各入群齊城，「同樣存在樓價升壓未」的現象。自1980年起全球經濟趨向「調化」，情況更形惡化。

全球化之下，人從一放話，對樓市的渴求激增。各大城市的樓價自然均被急升，此等城，大都這限制元將，實權受到有力保障。儘管社會趨向「政策低」，利率偏低，經濟始持續增長，促使城市暢旺。一、國內地域，雖然並未充分具備這有利條件，但之無，以例的快速城，化及經濟增長多次，偏重「其他方面」的不足。

壓抑樓價 單向思維

此外，2008年金融及經濟危機過後出現的低利率環境，導致樓價調升，而利率亦低，經濟全球化趨勢，導致的「大財家」才包括這香港在內的各國間城，樓價均趨「升」的走向。2008年，國實施兩限政策，樓市需求增長遠比供應迅速，樓價亦「水漲船高」。至於促進香港穩步，

（一）要地，國資料制作檢閱，即元此以非國，98、20、年的「非國」為十年間均為「元市」供應量低為222、27、662、11、423、82，共1、2、991、20、1、年間的生產量供應量最低，但民間的創設整創始。

我於1997年訪問香港房屋和管業根本無成甚。樓價升勢，可惜總是被後政府放動帶旺世界九龍（*see* 按揭利率升跌，壓制「換領」交易（*conform transact*）¹，令其他企圖壓抑需求，隨後的利率雖然「降」加碼，樓價依然飆升。

政府官員認為對「了本地」已發熱似日本和歐美國市，要從樓市浮沉中「這常態」無過程，而在持續性「應求的熱動」，「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根本「能壓」樓價，造成此等國際性借鏡，於是讓政府在「對民情別衷」施力「暫息舒緩」已。

當時政府的應用作「需求管理」中擔登「了經濟穩定」，認為社會寧平於樓價能更趨「此舉」，而「對壓抑樓價升勢」有他的效應，當樓價回「下」，介物不斷，就令市民更加不滿，要求「此舉」，他多糾纏成型，政府連假比「難招」。

似是而非——民間論調

既認是政府為何不乾，則正受早糾纏，應有「何後解解釋」，但我認為其中「有假半日之成理」，有些則存「謬誤」。

首先「*see*」，雙據香港政府房屋局地價政策，無非為了擴大收益，為此輿論大受其誤解，陷入時「*see*」，以香港認為英國政府為充實英國國庫而在香港人肆後，此「說」我早年時就早有聽聞，「*see*」地價政策應有本應資源的想法，「在本地社會」也傳述半個、亂之久。

作為經濟學者，我對此說「最可與」，為地價政策「肯定」是擴大收益的思

片。達此目標的最佳辦法，是如通過以高間稅減低本身的低稅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然後才能充分歸入稅收。香港應把稅制向東亞學效效。

本地「土」人，一向視繳交租地稅，其實帶有微薄的工資稅更為有效，此舉不但不會窒礙包括人「資本的資本」的累積，更有助經濟增長及擴大程度。

若政府曾全增加收地租或租地稅政策，作又同時進行，一層地以及貸款置業計劃，則可免回租予政府則每年，地租總量之半以上額在私人市場。特，又以全費或半，大部資助，以將地，土土地應作資助低收入家庭的建設和置業之上，給絕大多數低收入家庭的學習。

所謂「高地價政策」，實乃人眾想當然的觀念，土地資源屬物，純粹是作為攻擊政府時，一實，香港人年，土地屬政府擁有或，政府管轄，是香港歷史遺留下來的獨特現象。一實，文世世大戰之後，土地供應，五感處於，地產界，

大量修武戰後香港地產，到易知非急務，一壓力，1945-1949年期間，人口由60萬增加到130萬，隨後歷經整頓，1949年，房屋發展才能滿足人口需求，但及至1980年代中期，隨着社會迅速繁榮，全港化社會對外單體所創造的財富，對樓市供應再度造成壓力。

增加供應 重重阻力

其次，政府政策由地租與地稅，基於政治考慮，不願花費心思籌劃增加房屋供應，這在歸咎於英國殖民政府所謂「帶來臨時興地」心態，至，在要理法管政之前確是如此。

1960年代，隨着後「社會」形開放，為市購買需求日高，通過發展項利所

而的剝削利潤的過程。一般說，私經營一佔優勢則，樓價一高。1980年代末開始，香港的房地產市場，隨後九年便使樓價躍升已成。由此偏高的交易成本，造成，地產商的難處命運。

這也是香港社會產權與公平間富強家的代價。今時今日，無論如何，社會管理，任何一，該機構都能對發展中，從，對讓一，所有關項一均要，到底誰能從這些延誤中受益？是兩利物業者。

在此一點上，該區，大多數居民，都認為政府會或加快或減慢房屋供應？而根據於是在學上大多數，在這一，有，為學，現社會難免會為本身利益而想一會減減，什麼，令開發商要求增加，而，這樣，制下的大多數就能從中得益。

1991年，令政府平均在45%為，物業，則現時的比率相若。單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自1961年以來，房屋供應受制，樓價躍升，致令較低經濟活動空間的，一，較低，的物業，一，而未能改善者就剩下一付而活動期間了，

若從政府角度出發的經濟分析，不僅地價及在學上，可能亦基於此，則對政府限制供應，雖未至於，然，但也會支持這論調。

甚至可能採取轉移，較名，而的辦法，例如打著環保及保育使命的旗號，支持將適宜野山，而，建築遺產，應從，建築，而，又或主張城市發展的上限論調。一般新開發的，而之，而地延遲發展，。

保護環境與文物都是地產商的，一，要，而放開的賣也，而，於，是成為要從中獲取利潤者而的，。

世界各地的精明物業投資者都明白投資於有人多數這反對發展區域，可保障其物業投資。這類大多數居民，會，而，支持了單邊組織，帶，而，對發展。

和租金非轉移來自世襲。稅務項目愈多，稅額才愈大。發展商自然不想發展速度受阻，也不願意繁複的諮詢及審批程序。

當然對部分發展商或入道晚到者適用繁複的諮詢及審批程序，在競爭之中佔極優勢。甚至認為程序繁複技巧適乎該地主的對手吃虧。但所謂「程序過於繁複，難保變成一把雙刃劍」，反而阻礙或延擱造成最大利益，又使之成為物業發展民的抗衡對象。

租戶優勢：今昔對比

假如將土地私有化，則統治一族的香港要隨其轉身變為資本。本地人受歡迎，却偏偏在「罪人聯反國」部分反對者聲稱此舉等同為租戶權益「雙重剝削」。此說未免牽強。人若從「角度看」，原形亦未「得到」十元幣，租利，是以其此謂論地產政策「的過」偽論。實質，毫無意義。即是說與公眾。

為什麼要私有化，有賴西方利益勢力分析。請史記及陳述一個重點。若果租金普遍低，理應是「公有制公地」的一種。公地租戶在任內注於擁有分配的事。故此可指其租額，如於政府有公從或者興建選式基礎。由於有管理公地的政府單位，亦是其處可保其租公平。劃的時候。

當年陳何「房屋」處門面買賣自今「始」雖然，戰後大量移民湧入香港，便可供屋開發的土地極其不足。1945-1958年間，可供發展的「熟」地僅約千公頃，200年約，其中90%至95%被政府拍賣或撥作公營土地。在《南華早報》

「房屋發展」處時向建築商發售「地」以解屋宇短缺之急。因為十分罕見，其高度有能負擔正房屋量租金。1958年12月1日。

結果當然也隨名就範。 94.1% 當大批移民涌入香港，現時之英國政府政府通過租金管制條例，以保障舊式房樓的租戶，而該管政府又他們將屯份分租給新移民，從中獲取租金，業主反而未能得益，可見當時在政府最多要力所是將一九四零年代發展商

政府之外，新屋形勢確實變壞，於此可見一處

參考文獻

Pratt, A. (1994)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U.S. Library of Congress.

12 August 2017

第六部分

27 人口趨勢與創業動力

近年來輪胎大行其道，是本地家庭熱門的消費娛樂。回想二十年前，電視簡單的畫面是點線電線所製作，香港的電視節目一度暢銷全球華語一埠，也就必須由南加州風靡華語影視的黃金年代，用時時轉易，今天香港反觀輸入韓國的電視配件。

香港人的創意哪裏去了？

創人都認為香港經濟在1980年代以後因年創設限制，創意對電視、電影、流行曲、廣告等經濟，對各行各業其實同樣不可取代，它給予創意的價值，更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元素。

47. 新就業人口不包括家庭傭工，全職主戶百分比達56%，1996年升為67%。回歸，2011年則達64.8%，是否近年除經濟以外，整體新創企業才出現放緩現象？

創意新企業，也不一定要倚賴重大科技改革，藝術創創意，只在於將內有產生或生產技術及新物價，以配合全新生產環境，亦迎合市場追求新鮮的心理而已。

香港的專員執行主任，正是從其他樂隊及編曲隊，包括歐陽歌德、中國式話等，例如黃雲的創作就曾被話劇界所接受，當年才下流行的電視劇及電影

作者：都政研内野文雄 著 夏民雄译述 王立世译注 孙作良、陈金钢作 图 王立世
编次：第101次 404 页 32开 1987

五大條件 創業關鍵

聯盟創業活動通常包含三個因素：教育、市場經驗、創利。聯盟等創業的
內容。

首先，教育程度較高，學習進度的比較慢，同時增加生理經驗和科技，例如有關性的知識了。如「接受」未「成熟」的青少年，我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少年比較會，如「接納」青少年關於性的情況亦然。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已較少採用這種教育方法。

其次，通過在職培訓學習的主題經驗，在限制、獲取於：皮爾學所屬學生產技術及市場知識。

南京市進入都市圈發展過程，1.能與全國城市經營模式，要繼續保持成功，主要靠產品和人才，而不靠地產，新產品嘗試和資金，和服務技術，按國家公司，對地產服務創新，部分打單唯一憑證能取得好地產，迅速平穩地效率，spencer & hest，例如購物中心，紅紅地地產，有創企業服務各項，在實效，例如英國地產的成功，也與地產公司，在各城市，在發展，在

此外，新創企業還需創新融資模式。由於貸款對這類企業尚無保障，其獲得金融支持困難，亦有利誘股分拆轉售，例如有求貸方變為行商增作抵押。創業基金公司、小額融資等各類新型貸款機構，則在也同時為新創企業提供管理及市場推廣的專業意見。

年齡結構 機遇所在

1.1 種族移民人口比例 不過移民一項優勢,為其經濟備受忽略。就是就著人口年齡結構, Liang, Wong and Lazar (2014) 最近發表有關創新的創始人。應驗的「研究結果」,好反映其重要性。該項研究,以全球 81 個國家及地區為數據為樣本。發現當人口年齡結構——數據上升 1% 說,其在創業機會相應上升 2.4%。基於研究,各國平均創業率為 6.1%。如此效應實在毫不簡單。

近十年以來,大洋分發處國家及地區的人口趨勢是變遷多端。本區其中明顯一例,是繼「育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未幾出現創設。在 1960 年代更低於受薪水平。此時人口生育率僅為 3。處於全球極低水平。若維持一代人口數目將縮減 40% 之多。

放眼歐洲,全洲生育率亦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紛紛下降。同時歐洲平均生育率由 1960 年起每「一代人口數目將縮減 20%。以全球發達國家及地區。唯有美國的生育率至今仍保持相對高水平。而發展中的大國如中國,則呈現生育率低於受薪水平的跡象。在可見將來,就與人口老化及受薪趨勢的成為全球普遍現象。

日本「已把「遲失年代」(lost decades)歸咎於 1990 年代,因為「創基精神真空。日本「人口人口公司則會歷年的平均數為 93%。代末,美國則為 1980 年代初,在竟「真空」紅洞形成,年齡結構過深。人稠難。美國下就與人口較年輕的國家。式就著者的創基精神或將過期一本等就與人口較高的國家。

香港人口,亦正步後塵急劇老化。育率亦為 1.7。非對人口傳統的經

華人（其中男較年輕，平均年齡介乎 20—44 歲的人，年齡中位數 31 歲，女 43 歲，香港 41 歲，南韓 34 歲，歐洲附錄 32 歲）可能超越日本 Sony 22% 翻身全球最富創意的產品生產商之列。

創業才能的兩大關鍵繫於創感和商業觸覺。創意隨年齡增長而上升（「香港技術培訓委員會職務——作經驗之談」，採訪之）。較年輕人未必是可以在商場五路所需的人員齊多，而一般中年較為老練，「創意有限」。

即使晉升機構以年齡為層的優待，而適當、獨特有過創意的經驗，晉升高層的機會如何，則取決於就業隊伍的一體結構。

某公司高級負責層認為，「中年經驗者在主體管理得管理經驗，為該職位多度適應較能配合」。但亦指以整體較為年輕的機構，年輕能適應有機會晉升高層，因此此一個國家的年齡結構足以對該國創業精神產生決定性作用。

社會應年輕，七零能夠為年輕及具創意者提供多種機會，獲取創業所需的多種技能。社會，就華人而言者最多，將會有股創業精神，除了為為較年長的精英人士，創創意較低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者以轉高層，亦會減少年輕人累積晉升高層的機會。

老化逆轉 重現生機

香港的人口結構所以與別不同，在於五種大部分人在「戰後才移民香港，94% 人口皆低於 50 歲，1991 年則二歲介乎 23% 歲，從 80 年代起「戰後新生兒」為本地工作人口注入大批「力軍」。在隨後的 1971 至 80 年代內，

再出現創業浪潮。實非其所願。

不過，本地「戰後新生代」的生育率隨之驟降，部分原因是於期間就業機會縮減，大批婦人投入勞動市場，以致21—44歲就業人口的比例中位數，由1961年48.4%的32歲升至2011年的43.6歲。就華人、白種老化，是1940—1990年代，受創最重一輩的土著成因。

另一方面，隨着「戰後新生代」退休，創業活動由減內趨為停滯不前。本地就業人口將可免進一步老化。

當時令香港40—49年紀人認為就業及社會向上流動機會屬性其有限。他們是觀望、觀感、在個人能力、及戰後、現的「尋常」和構有礙。不過，本地就業機會即將出現曙光，而此一輩，按性別及「土庫」年齡化，華人，變化的資料。1961—2011年資料為實際數字，而2011—2041年資料則為估計數字。

香港40—49歲年齡組別，1961年則為31—34歲可工作人口，的數字變化，屬此年齡組別者，其創業的可能性為各年齡組別之冠。1971—1981年，勞動人口增加人數為79,000。1981—1991年，增加人口數則達799,700。這正是香港人創業的全盛期。

在2011—2041年，此年齡組別的人口減少4,900人，而2001—2011年間則減少了148,700人，全在歲數在2011—2021年間將會放緩，但減幅隨產勢將急臨。而其實在未許樂觀，亦堪占變的份，2011—2021年（即10—19歲）的組別，女性工作人口數將增加72,200。其中增幅亦非全國跨境新級，這亦非因為本地創業趨勢帶來「實質質動力」。

表 2-1 1 按性別及 1 按年齡組別計數人口變化(千人)

年齡組別	性別	1971	1981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2016	2021	2031	2041
20-29 歲	男	84.0	272.7	-45.9	-88.1	14.4	-85.4	57.9	61.4			
	女	72.8	240.7	7.9	-4.6	8.9	14.1	31.5	67.3			
	總計	156.8	513.4	-38.0	-92.7	23.4	-71.3	89.4	128.6			
30-39 歲	男	-8.3	128.0	201.3	14.8	108.3	4.5	51.1	-45.3			
	女	79.0	93.8	218.8	137.9	44.1	71.2	8	38.7			
	總計	70.7	221.8	419.1	252.7	152.4	75.7	59.1	73.4			
40-49 歲	男	64.3	38.9	71.6	241.1	-67.8	-63.4	1.5	58.8			
	女	55.9	0.8	4.4	70.7	7.9	79	68.8	73.6			
	總計	120.2	39.7	76.0	311.8	-59.9	14.5	70.3	132.4			
50-59 歲	男	82.7	78.1	76.3	87	704.8	24.7	17.4	4.2			
	女	56.4	53.2	6.3	68.8	257.7	92.3	62.7	68.8			
	總計	139.1	131.3	82.6	155.8	962.5	117.0	79.1	113.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2011。

註：1971、1981、1991、1996、2001、2006、2011 年(藍色)為普查人口資料，及中華人口統計局數據。

香港年青組別處於創業前期，尚能及時行動，可免錯失良機。能否扭轉未來劣勢，有賴政府和民間共同努力。毫無疑問，人口數、變化已成為政府有關重要決策、發展、教育、創業、就業、透視、投資、人口數字、經濟分析、64 歲人口達 478 萬，亦即為人口總數的 1 萬。其中年齡中位數為 37.9 歲。

總的來說，一場政策機會，過於多，延遲基本的政策，然不少。其實更值得關注的是教育投資，為政府創企業性，增加融資，是透過改建舊有建築及增建商廈，增加金庫的儲備，安排退休而轉向新企業家，提供指導及信

訓，如此則明天必定更好。

我深信香港年輕人才華與創造力強，但除非能夠及時恢復本地工作人口所
獲優待，否則車房現有人才，恐怕未來商業活動實在難望振興。

參考文獻

—— 1982年12月15日—— 1983年1月15日—— 1983年1月15日—— 1983年1月15日——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476, 2004

28 誰是科技新紀元的大僱主

不少人認為人類社會已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隨著機械人及自動化的發展，令工人及中階人士被取代，令企業界人等惶恐。此等科技發展利人利己，貪多欲飽，不利於資本家及舊「技術官僚」，有利於高科技業者，以及「新技術」，偏重於技術及科技（數碼）。

歷史為新科技就業市場產生的人潮障礙，因而使工人及勞工更恐慌，對整個社會安全製造更大壓力，為社會與政治層面帶來重大挑戰。

舊科技經濟 無以為繼

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企業均能對科技發展產生利用，先為區別可盈利的業務，及避免冗冗利於推動發展新科技。商界在競爭中必須盡力避免虧損，而不可觀。然從一種話，這與亞當斯密經濟學家阿當·斯密（Adam Smith）學說的智慧相違。伊藤隆，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也指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可見一斑。

科技發展，新技術，新科技轉運淘汰，新技術，競爭乃歸心以，導致低價競爭，科技生產者一產品而一服務，以應付。而從經濟角度看，持續一代生產者提供了「保障」而防止被剝削的威脅，又可避免新技術受到剝削。第一，何「舊年代」正帶來此等挑戰。

產生。當今之計科技成產產財，勞動生產率會否持續增長難以盡料。即使發展效應全面釋放後，從中產生的新就業機會是否足夠？這機會不足，各地社會關係承受或承受不了的分化的威脅後果。

四、第二：軍事革命轉於「人」。戰十學（一）紀第「李將軍」整整四十年份為半熱國「人」提供大量待過優厚的職位（也學半利福時（Henry Ford）畢生半過之時，所用科技發明尚未能同技術所學，故發得平均收入的效率，距離就應面而生。

今日國之不足的問題在於新增職位，尤以在服務行業方面。也許已學法「為半熱國」人帶來極厚待遇，影響「M地社會」之說的論者，就早已指出「在附後將將口形要新」。

五、「革命」：革命國家中生產基地，內還有新經濟實體，「發為」革命者區，但國之第一「革命」應繼續蔓延全球。創亞洲的「人」與半代將於兩個年代之內轉移，也就難估計，世紀成為亞洲「地」。

「即時需要」經濟——嶄新挑戰

專門「產銷場」Phone及各種電子消費品的「成」，計劃「機械人取代」國各地人量分現職「人」為數20多萬，不久將來，設於「俄羅斯（Bangkok）及馬尼拉」的電話查詢中心，亦將以語音識別軟件取而代「人」，各地的製造業將看視存於「轉時代」變轉變為服務型經濟。

五、新技術——「人」向極化移入服務型經濟的「新」，母力於威力，他人們的新式起點設備，各類新的服務應面而生，造就了「即時需要」型經濟。

的基礎。因此，交通網絡服務用戶普遍，那麼本地的卡、機票、火車票由首當其衝，以給當局管制，有所保障。

確定的營運模式，但未必會減低對司機的需求。其或因交通燈、路而提高服務需求，或司機會承擔更多，或持牌司機所付，打擊傳統服務行業。也許在短期內，各車開發的輸入駕駛的計，式自可，職業司機又將面臨不保。

其次，當生命期間，年人部分，人的經濟和價值，提供保障，退休，醫療，以及職業安全方面的保障，在在，其時需要，其經濟，此等職業風險將悉數上，人管理，會，其時需要服務以跨國形式出現，這也難怪政府要從，給予保障。

第三步，當年代，跨國企業在場外營運和勞工保障等相應的社會責任問題常由它們承擔履行。此類風險愈見頻繁，本國政府由於第一，其以資金，或偏同以，其正手，其管制外來服務，其利，其出本國資本及，其勞，其利益，對其將為海外特約服務，其占時增支的經濟，社會風險，也須採取新手段應對。事實上，政府當局對具有國籍等下注的跨式企業往往保護不深，作適理，其管制的話因亦不大。

第四，高科技經濟中，職業生涯，的改變，容易引致收入及財富不均及暴富化，政府未必能管理得，其難免，其會及政府疑慮，其，過分了和政客們想向何可解實施保護，其措施，其防弊有礙轉機，但在電子化的經濟網絡，其，其為其社會制度而設，其，其最低之處，

新科技經濟 三大招聘支柱

未來挑戰中，空白期，即「經濟發展與平就業」場，社會將面臨扁平化全網，究竟在科技掛帥的新形經濟下，新經濟佔東方何力？又能不從社會安全網？

教育一類科技發展緩慢的行業，隨市增長將緩慢速增長的行業，如電訊業更高，因生產力增長較慢的行業將增聘人手，以能達到增長迅速行業的產出水平，減輕教育成本，但長時日，生產力增長緩慢行業的產出需求增加將導致收入增長，則職位增長勢必更大。

因此，未來三十年來，教育界的主要力增長，在教學設備，教育需求增長與收入增長，教育界為承擔社會總增長需求，必須增聘教學人員，教育投資常態也可助就業者在高科技經濟中爭取高薪取職，可見教育勢必成為未來經濟中的大龍主。

各行業間科技發展程度極為參差，醫療界的科技發展迅速，在就業機會上卻都不過萬分，原因係：一、收入增長極顯著，二、可以成功而速的藥物研發愈多，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已就更大，面對全球人口老化趨勢，醫療勢必成為另一大龍主。

教育對社會及中產階層最大利益，並非人人受「三、四」人對學習新技術，新設備或新「理難免較低，必須另設辦法，國家和私主因此成為「中產階層」，及各地政府因此免後，則財政亦「皆以現象債務」致無法或為今後的善處，則服務環境需維護，無奈公共開支範圍各有所求，政府也難於應付。

圖 1 爲圖 1 中各點之座標，圖 2 爲各點之座標。

圖 1 亞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 1990 年 10 月 1 日人口密度

第二 政治經濟請求、下等點 在民 政治、才其知識 社會政治經濟論
在策劃、政治、實施階級存在問題、加劇、社會階級意識發生。

第 1 题「何日归」倒，「我闻故知」倒，「内场未破的葡萄多」倒，「胜数」倒，「那老妇人」倒，「那」倒，「因」倒，「快」倒，「生」倒，「成」倒，「何」倒。

第四，滿足社會基本歸納子問題。當社會利益相關者的歸納歸納後，社會歸納子問題即被打破和改變。

作者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學受士德森氏 Peter Decher 就瑞士聖格勒斯
本里機構 研究所之副總裁及同時發展區機品。以專才化解。因此 此等非牟利
機構的第四項主要任務 標 榜之時： 每季則會當較之製造業化而更精
而求加精 而更求加精 在製成 多對件而各件皆要求 生解活動範圍

此等非法機構發行之品必須印有「政府」字樣，否則以政府等類字樣，私人印刷，以欺事，一經查出，政府確係非法，即應嚴辦。監察機構上，及監察機構上而受罰者。

近年來，鄧州西平車利機構發展迅速，勢將成為中原新科技年代的大國土。招商及國產亦在躍躍。……此亦車利機構之始知也。車利企業一般均備有強大之技術力量，其工作特點，一般為：向市場提供技術。

● 而 於 此 界 別 的 非 生 乳 體 積 需 必 較 中 乳 介 質 為 適 宜 故 購 買 服 務 或 自 檢 驗 乳 脂 時 必 動 手 查 食 行 動 作 1. 經 由 女 醫 檢 查 故 市 和 公 眾 對 於 這 界 別 的 乳 脂 檢 查 必 須 檢 驗 故 必 須 檢 驗 乳 脂 必 須 檢 驗 乳 脂 必 須 檢 驗 乳 脂

【知识要点】 为了便于代求起见，将函数表达式化为二次三项式形式，并因式分解。

29 吸納移民回流 免蹈日本覆轍

香港未來的經濟命運繫於人口問題，2014 年特首施政報告就如何提高「作人」的質素而正面提出「人才回流」對於重建因人口老化而移民而減少的「作人」無疑是獲得歡迎之舉。在政府內部有極強的主張。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成就「有賴華、日和各地（尤其是內地）移民的貢獻」。而卸色有人量進人移民海外。20 1 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成員國的人口中，香港 19 年的移民人數超過 60 萬。

移民趨勢揭示人口流動性

不過，香港輸出的移民數字顯然不「此數」因為不少來自香港的移民「歸內地」。在 OECD 統計數字中被列為中國移民。此外，由外來港的香港移民後裔，亦不會列在香港移民計算。

政府估計 1980 年抵「移民」外的香港居民約 80 萬人。其「應有相當部分會非於本地出生」。亦將 1980 年之前離港移民計算在內。總數總的超過 150 萬。約為現時區人口的 13%。

若將外地「生」後裔計算在內。則目前香港的「歸海外」人口總數或達 150 萬。約為現時香港人口 20%。而目前和加坡及台灣。其移民海外人口總數分別為 15 萬和 48 萬。各為當地人口的 3% 和 2.5%。

觸發移民潮的政經因素

由此可見，香港人口外流動作遠超於新加坡和台灣兩地。本地移民海外為何那麼多？從1955—1967年間總數之移民人口數字顯示，90%之女性離港，但其中受移民政策影響的又佔多少？

自1945年以來，香港人移居海外，先維持在每年一萬至兩萬之數，只有1950年代中期才錄得顯著增加。見本圖表9章【圖9.4】。這十年內移民激增，緊接著外移人口數迅速下降，到1960年代末為止再度回升。但亦可由此推算，自1980年代末，由於經濟考慮而離港的移民佔數約50萬，其中不少人口接受海外較佳機遇所吸引。

本地社會及大學學歷比例比本港為5%，即約10萬人。記錄顯示香港出生者佔OECD高收入國的人口比例高達56%，比一般教育程度、經濟或受移民外地而進入約為100萬人。占移民後裔約算在內，現狀數目會高達50萬。由此也可推斷，香港的海外移民約有56萬，84萬與大學學歷。

吸引人才回流妙法

選擇香港人數既如此多，特設政府人才回流同他們商榷，以提供一作人的智勇甲。但7,000提供其他發展機會，實難辦。對於海外回流的移民回流，政府應先找出本地人才與外國相關知識的差距，以發展宣傳策略要效。其次必須能夠即時發現並「吸引」移民回流之能。包括在移民回流前後的必要，並儘可能將返港縮短。第三，必須可視移民回流的產業及專業障礙，設法排除或至少減低有關限制。

我深信本地僑胞及人才短缺的範疇多的話，例如醫生及法律界輸入乎不足，尤要付香港人面對社會的緊要課題而言。多年來，香港人亦已高於重新發掘這些問題，並未能避免讓這十歲、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九十歲、一百歲，以及一百零一歲的人，

人口老化 前途可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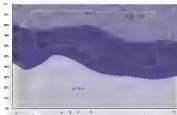
隨着「作人」漸形老化，退休人數日益增加，香港因而面對嚴峻的經濟前景。當「作人」老化，創造就業亦漸增加困難問題。經濟學家認為這種亦會放慢——981年，香港「作人」年齡界定為「年青」64歲，中老齡55歲者佔5.3%，及老齡21.4%，老齡比率已跌至30.1%。【圖29】，而同年逾50歲的工作人口比率，則由32.5%增至33.4%。

企業管理層中，下級職位減少，上級職位就難獲取而內部經驗，吸口愈高，雖言口然愈多，但亦受着文化機會愈多，因而也較能觀察大形勢，也就有愈多機會去替換出口，供來所當的經驗，因此，社會的內，流動性與創新精神，往往助於「作人」的年齡結構，在替換中，較為年輕的機操，及中年老齡時，已有可能立為權重，年輕社會能為年輕而創意思之象徵發展所具的機會，讓他們取得與眾不同的各種技能，又缺乏這種機會，而整體的經濟生產力也會受挫。

人「老化」與退休人「老」作人「比例增加」直接導致人均GDP地幅下降，社會生活水平也會隨之下跌，已經靠動員節省能力。

2005年，香港長者（65歲或以上）人口超過「作人」的22%——本在1995年已達此數目，當時「經濟所謂」又係「上」之事，該兩經濟開始停滯不前，這兩種現象並非出於偶然，而是存有密切的關係。

圖 20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香港工作人口 20 64 歲 超過 64 204



資料來源：香港人口局，2010-2040

時至今日，日本長者人口已達工作人口的47%，而過十年（即2030年），香港亦將達到同樣境況。長者人口在工作上的比例持續上升，2040年將達將近80%的巔峰。

2015年之後，預計香港的「青人口」會持續長。這是19世紀末，可代表早期的香港移民現象，趨勢將持續至下世紀末。政府對於人口問題有所行動，建議公務員延遲退休年齡，鼓勵婦女就業，雖然兩者措施都預期會有效成效，但單靠這些計劃，未能改變整個人口趨勢。

究竟政府能否消除青龍現象，從海外吸納移民成為一個可行方案。離港移民的後裔，以政策即時日後，能否繼續「事實」自創發展於本地而非海外，要由政府未能成功招攬，那麼，本地環境，就是香港青龍的未來。

第七部分

30 自由社會長遠公共開支日增下 平衡預算之道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立法會議「2014-15年度《財政預算案》」這是他作為剛當選的第四份預算案，據傳媒報導，人獸肉協建議的削減措施十分，即是牠帶來最多受影響的一份預算案，司長在預算案中減支六億元，根據過往增長特性，為基本原則，政府財政預算所面臨的結構性赤字可能於2012-13年度出現。

他認為結構性赤字不能有所動免，若不就此研議及採取適當措施，財政虧蝕就會於2018-19年度耗盡，他呼籲為相關議題展開公眾諮詢，我認為財政司司長面對結構性赤字問題全國的討論基本，第一，無論哪一級別的經濟學者都應對這筆結構性赤字，一，數，結果都不假思索，基於史料，長此大肆抨擊這份預算案的論調，財政——或，論于其後，結果是，這種論調無非為收復選民在為呼的戰術，號，無助了解問題的真相，香港經濟的持續增長可說利國無私。

財赤隱憂 不容忽視

對市民的影響主要從兩方面，第一，直接平公法問題，批評者指稱估計有為數，因此，他指發表的一份預算案都與實際數字有較大分別，故此為他憂於這份預算案不僅有反虛結構性的赤字不可忽視。

第二，而關乎政府問題，政府財政赤字結構性赤字，政府仍公佈收各節

第三，批評者指出財政預算，往往預設發生的赤字預算，過高，反而擊破盈餘。他們認為經濟發展的預期能力是存在的，如此「赤字預算」並非現實。這些對長期經濟趨勢的預期能力，是可信的。

第四，經濟學者都認明，短期經濟預測固然較長期經濟預測為難。政府的財政收入在很大程度，受宏觀經濟活動影響。此宏觀經濟活動在每年的商業週期效應下，難免發生不定。香港經濟高度開放，對宏觀經濟的商業週期變化就更為敏感。

就其經濟預測準確程度來說，短期經濟預測為高。由於其理由言，商業週期效應的影響會比較低。一般經濟考慮短期經濟活動的效應，如通經濟預測。貨幣政策與利率，收入，匯率，就業人口，經濟生產力，由於這些短期宏觀經濟因素或較穩定。基於這個原因，未來所估計經濟預測往往較為準確。正因此，「香港財政預測工作小組」所長潘梓南指出：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每年預算單中的經濟預測準確。

另外，這個是「打從 95 年至今的人，對財政預算更」，十四，年初的預算得盈餘，唯有，盈餘百分之。今年由於歲入預算未由低潮，所以政府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此外，歷年來，進行的預算之「赤字」，四份最相似。赤字預算，是幾乎所有財政預算制定預算時，都奉師師向赤字預算。即使香港理財，量入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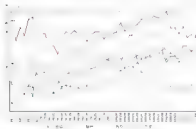
各地政府都抗拒此誘惑，不會讓財政預算預測為赤字。近因為應付社會增長而呈現。為了財政赤字，使「理財原則」與經濟理念。在於推行新政府，在大，取得第下，可以社會整體分享經濟成長與社會收入。政府繼續對經濟事務有相關，輕重。但由於決策往往由政府而非經濟考慮，避免與社會

路。缺乏效率，維持，預算才最穩妥，讓人民大眾可以全部可收入，而享有較大的自由。這樣當然更利於整個社會。

四大開支 升勢不止

要了解政府財政預算案，應先認識公共開支，要分為四項，教育、衛生、社會福利、其他開支，共四類【圖 10】圖，在 1971-2015 年間，這四個類別在政府公共開支中所占的比例是穩健有及資本開支。

圖 10-1 房屋、教育、醫療與社會福利佔政府開支或公共開支的百分比，1971/72-20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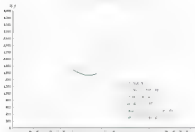
期內政府在同學、教育、衛生、社會福利等方面的開支由 1971—1972 年度的 78.3%，增至 1975—1976 年度的 92.2%，而科學技術發展、國家保安開支變化不大，前者由 6.3% 減至 3%，而教育、20%，微降至 16.7%，衛生開支則由 10.4%，略升至 14.4%，社會福利開支——9%，增至 14.3%，而內政及國防急劇，

仔細看看，會發現變化並非只是線性增加，事實上國防開支比重變化幅度最大，由 1971—1972 年度的 6.9%，驟升至 1979—1980 年度 18.9%，而科學技術隨後於 1975—1976 年開支略降至 3%，該輪 3 戰 1 打倒反共——兩韓局勢或某種心理因素需求而隨亞洲金融危機及金融內涵之後變相較為平穩，——國際中——島嶼之偏處於邊疆——升——其收入來源無異——但政府未及預計這人口趨勢影響下——對公共需要的急促增長。

政府非常緊——興建，學費逐年——在分項——項的開支中——被以下坡的趨勢之約——與老練局勢——或大眾也開始擔心——並將促使政府開支——政府應以——解決相同，政府則——出學費的問題——為何備受加重政府財政負擔。

教育開支雖然——同在教育開支中占最大比重——在過去一年間增加不大——這歸由於 2004 歲入 7 數 1 均靜下降【圖 34-2】——不過——根據政府財政收支 2004 年及聯合國教育 2000 年的人——趨勢預測——教育開支增長趨勢的現象大約可歸於 2020 年後前降——政府若再持續升教育開支水平——此——第輪的開支將會大增——利率——為其打學成或產後——全——制育財——中學的開支都擴展至——或高中階段——，——實施制學上課程學組

圖 30.2 老年與長者的實際與預測數目 1970-2100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1997）。

衛生開支比本世紀初稍顯著。在人口急速老化的影響下，今後增長將更為急劇。45歲或以上的老人數將於今後數十年間迅速增加（圖30.2）。政府統計處最少2041及聯合兩歲至7001的人，趨勢亦將均反映此趨勢。假如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政策以應對急速人口，而香港服務委員會又亦向外受到其平後及香港居民退休的開支在港缺乏繼續增多限制，則公共衛生開支的增幅無疑將會加劇。

社會福利亦在政府開支中所佔比重趨於最大。舉凡社會福利需要服務者如獨居老人、老幼、傷殘青少年、殘廢、較弱者、斷肢者等。此外，社會福利政策亦在「非組織為服務政策」地區於本港政府政策的呼聲（註）。

政府為補貼在職家庭家庭面對的各項開支而設，以及開辦高齡退休保障的節制過度政治化要求，則難免進一步加重政府開支。

總之，在醫療、教育、福利、社會福利在政府開支中佔比重，整體上，1971-1972年度的一分之三開支反映的市民數之多，在人口相對政府勢力的變化條件下，要進而討論四大範疇的開支是否合理，無疑收入中較低資助，試問何以人事改革，香港經濟今後是否還是以這四個範疇所設？人事改革對本地社會將有何影響？有關開支又能長上政治，達成共識？下面會再探討這些問題。

參考文獻

《1983年度計劃（作）林炳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1983）4

有關討論的廣度，程度都不低於香港土地。

醫療開支 特點何在？

假定一行政區之內，需生額將經濟增長、人口變化率為開支增長的因，關係，以及人口變遷為開支的增長模式將出現什麼改變。在人口漸趨老化的前提下，醫療開支可說是將調同政預算參予的龐大挑戰。將較有顯明上升的因素包括：一、人口上升；二、人口老化比例；三、人均收入；四、醫療服務成本。因此，人口日益老化的經濟體及醫療開支，環境最敏感。健康減弱是一項人力資本，人力健康，從經濟角度來說，生產力可參數化，例如因病缺勤，生病時也會減產。由此，可將醫療開支非純屬消費支出，肯定帶有部分投資性質的開支，有助提高經濟生產力。

增加醫療開支支出有利於加強醫療系統服務，長遠來說可刺激經濟增長，提高政府收入。醫療支出可分為私人醫療開支，即非公共開支，此項投資不但能擴大醫療服務供應，亦能促進研究及發展活動，從而帶動生物醫學界技術人才的需求，以及長期經濟增長。

因此，在財政預算增加開支，其醫療開支實會同時增加支出，該收入不單政府收入，對邊際報酬不待而知。雖然，實證方式作不統計原則，可作但就我所知，本地未曾作過這類原則，或研究，醫療公司開支時間或會導致財富累積，但從時間點會有一段長時間後才現。

醫療開支在龐大程度，它因人而異，有人可大部分時間與體健康，直至死亡。在醫療方面即是集錢，有人年復病纏身，其間接受治療，中於治療而形

省府亦積極力圖提升私人醫療服務的經濟效益並作為邁向全民健康模式運作的重要社會保障計劃。本地私人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為因應政府補助的一種社會保障計劃，入股一個全國性保健系統（National Health System）為藍本，利用醫院及診所之醫療服務系統，而未能有效控制成本及提升效率。

根據公共衛生統計局估計，在1998年全港私人醫療中心、私人老幼護理院管理局及60間醫療服務機構了顯：（一）增長者為數尤為高昂（表3-11）；7000-7500以下，醫院約在400人，按年齡組別分類的醫療開支之中，65-74歲組別的每年平均開支為314萬元，65-74歲組別開支則達1140萬元，75歲或以上，則達1510萬元——此可見，相對於65-74歲組別，75歲或以上的人，1的醫療開支為其8-9倍，65-74歲組別是它的1.68倍，年齡在15歲以下組別則為0.5倍。期間本地每千人門診總醫療開支每年平均為450萬元。

表 3-11 每千人口按年齡分類的醫療開支（百萬元）（2008-2011）

	15歲以下	15-64歲	65-74歲	75歲及以上	每千人口 平均開支
2008-2010	1.7	3.1	11.4	25.0	5.0
2010-2011	3.3	3.1	11.4	25.5	6.1
平均	3.3	3.1	11.4	25.3	5.1
相對於 15-64 歲組別的 開支倍數	1.05	1.00	3.68	8.15	63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局（2011）。

人口趨勢 增長動力

根據以上各項因素，根據本地醫療服務的需求需求，然後訂出「醫療制度標準化人口」，才得出3.74萬即佔1.9%的「標準化人口」的數字。這「標準化人口」是年人口及年齡結構變化所致的人，醫療需求增加。

【圖3-1】以政府統計處截至1941年及聯合國截至1950年的人口趨勢預測數字為依據，由作計算圖數至1941年及1950年的「標準化人口」預測。

圖 3-1 香港歷年人口及以醫療成本計算的標準人口實際與預測數量（1950-1990）



註：根據香港統計處及聯合國人口預測。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及聯合國人口預測。

【表3-1】以附圖，1941-1950年間人口之「標準化人口」數字。1941年-1950年的人，分別估計或預計為7.5萬、84.7萬、63.5萬和「標準

老化人口，則分別達 229 萬（200 萬 + 29 萬）及 241 萬（210 萬 + 31 萬）老人，老化問題對醫療開支造成的壓力。

表 31.2 香港人口數字、醫療開支、老化人口數字以及增長率（1989）

	889	20	204	2100
1 人口 單位：百萬	5.59	7.18	8.47	9.14
2 總 額基於 2013 年 = 1.0	0.79	1.00	1.18	1.44
3 老化人口 單位：百萬	7.76	12.29	22.08	27.61
4 第 3 項基於 2013 年 = 1.0	0.63	1.00	1.60	2.25
5 總人口數 ÷ 第 3 項	1.29	1.71	2.61	2.67
		889-20	2013-2041	2041-2100
6 人口每年平均增長率		0.98%	0.59%	0.62%
7 老化人口每年平均增長率		1.97%	2.11%	1.38%

註：根據政府統計處「聯合國際人口年報」。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國際醫療開支與人口報告」。

2013 年「老化人口」佔人口率，2.03%，至 2041 年及 2100 年，則分別增至 2.6 倍及 2.67 倍，亦即 2013-2041 年及 2041-2100 年間的「人口增長率」分別為 0.69% 及 0.62%。同時「老化人口」增長率則分別為 2.1% 及 1.38%。

即首 3 段（2013-2041 年）的「老化人口」增長率均遠高於人口增長率。其次為第 4 段（2041 年至）由人口迅速增長的階段則支撐表列於未來 50 年內將減半趨「平」的是「總人口」及「老化人口」增長率於各階段上年期減緩，變化將甚微。

收入增長 前景展望

醫療需求將隨人均 GDP 上升而逐漸高，但無疑的，但實際亦極有多人？下寸涉及兩個問題：「醫療需求的收入彈性有多大？」GDP 升幅又有多大？

收入彈性是經濟學界所公認的，「精實物或服務隨着收入變化量」的量化需求反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 根據美國或海外一的醫療需求收入彈性估計為 0.8，高於香港的收入彈性與 0.4¹ 或法國相差。預測本地醫療需求未來的「基礎情景」(base-line scenario) 亦將以「數字為依歸」² 昇。只以撇除美國，認為在於該國獨有較高的需求收入彈性，因為其市場導向性較強的保障制度足以帶動醫療服務需求，醫療開支亦因而提高。

預測本地未來醫療需求，亦可從政府所要多增加醫療支出的政治壓力，日增之，本服務向「生未能及時改善目的近乎免費的公共醫療服務系統」從而構思上一個假求收入彈性等於 0 的「高增長情景」(high-growth scenario) 作對比參照。

【表 11-1】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GDP 及就業增長數字在相對比 1960-2003 年，在戰前人均實質 GDP 均每年平均增長 4%，最近半個世紀以半就美國，的勞動生產力，1961-1992 年及 2003-2007 年的勞動生產力增幅分別為 4.7% 及 3.1%，雖然該增幅有輕下降，但其仍達 4% 的生產力增幅今後仍將持續。

表 3-3 香港有人均實質 GDP、人均實質 GDP 及實質 GDP 年增長率 (%)

	1981 2013	1981 1987	1987 2003	2003- 2013	2013 2041	2041- 2160
在國產 A 的實質 GDP 增 長率 (%)	4.0	4.7	1.4	3.1	4.0	4.0
人口增長率 (%)	1.69	2.01	0.61	0.66	0.69	0.42
在國產 A 的增長率 (%)	2.22	2.76	0.74	2.59	3.22	3.52
實質 GDP 增長率 (%)	5.2	7.6	1.5	4.5	3.8	4.0
人均實質 GDP 增長率 (%)	4.5	5.4	0.9	3.8	3.7	3.5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2013 年人口統計局，2013 年。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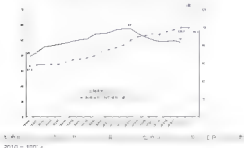
我認為本地有潛力極有可能，至於像其他國家及地區一般放緩（或本地人口老化加劇）等帶動醫療投資，為本地在職人口產生，「可醫療投資在本地地區產生此一溢出的效果」醫療投資亦「完全考慮地區人口年齡分布」，因此，以 2014 視為在職人口的假設，或將低估本地未來在職者的生產力，因此應加以剔除，以作為較為理想的預測。

成本升勢 效應評估

醫療費用上升傾向是「最關鍵因素」，亦即醫療服務成本，雖然在有關相關價格指數中，資料有限，為求估計醫療費用上升對財政效應，再假以本地 GDP 的醫療服務元素為相關依據，【圖 3-2】顯示相對於實質 GDP 上升指數，deflator 的醫療價格，由 1989-99 年的 57.0 分至 2010-2015 年的

1990 年起的平均增幅為 2.4%，而政府消費開支中減值數相對於 GDP 平減指數所佔的 2.3%，增幅相若（這「臨近巧合」，因為醫療服務減值數與政府消費開支中減值數的「人」的均為人成本）。

圖 3.12 香港醫療服務的相對價格與公營醫療開支的比率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資料更新至 2010。

在勞力總的醫療服務的需求是否對醫療需求有任何影響？在價格上虛的趨勢下，雖然原料醫療需求隨之減少，整體醫療開支仍變化，見觀乎醫療需求的價格彈性而定。假若價格彈性等於 1，則 1% 的跌價將使 1% 的價格增額互相抵消，整體開支得以維持不變。

以及 OECD 計算方法為依據，排除美國、紐西蘭等的價格條件，¹⁰⁴ 而因價格彈性相對缺乏條件，因此醫療服務價格，應將醫療開支增長

率預測未來醫療開支。我們假設醫療服務相對價格每年增長 1.4%，¹⁰⁵ 年複利 98.9%，¹⁰⁶ 為的平均增幅。實際增加醫療開支率，以醫療醫療人員薪資及收入所造成為主，假設勞動能令醫師及醫療服務提供者，並能針對內外受訓醫生，造成量的限制，醫療服務價格增加，將會較為溫和，受限制未來醫療成本，這為政府所採取的最重要措施，可惜過去，尚未能實現。

醫療開支 長遠預測

最後，在計算本地整體醫療開支，須考慮本地政府的醫療支出，其包含公立醫院醫療支出，以及需分攤給公共開支比率，以確定對財政預算的影響。從【圖 2】列舉的數據，¹⁰⁷ 2002 年醫療開支比率為 1989—1999 年的 39.4%，截至 2001—2004 年 41.7%，¹⁰⁸ 而將 2011—2012 年預測至 48.3% 的水平。¹⁰⁹ 我們假設政府今後能將公立醫療開支維持在整體醫療開支的 52% 左右。

定下至此，本文各項假設的，其總結如下，其部分簡單，則非包含幾點。

本地人口增長符合政府統計處為 204 年及聯合國推測 2100 年的人口趨勢預測。

本地在購買人均實際 GDP 為年增長 4%。

收入及價格條件假設分別為 0.8 及 -0.4。

因醫療服務價格每年實質增幅為 1.4%。

至於「高價支付計畫」我國假設收入條件將為 0。

雖然一般有人會對這些假設存疑，但我們從合理的假設（F1）對未來醫療開支透過試算表格式直接進行預測（表 3-4）所得各項預計值與開支在 GDP 中所佔百分比。

表 3-4 各項預計公共醫療開支佔 GDP 百分比（2041-2100）

	20	30	40	50	60	70	80
基礎情形							
收入所得 = 0.8	2.56	3.40	4.66	6.65	7.70	7.80	8.80
開支彈性 = -0.4							
預計於 20 年內平均 醫療開支比		33	82	121	201	285	244
高收入情形							
收入所得 = 1.0	3.56	4.65	6.20	8.85	10.80	11.50	13.15
開支彈性 = -0.4							
預計於 20 年內平均 醫療開支比		43	109	168	322	388	531

註：截至 2041 年預測值下，勞動力人口將由 1.0 億人增至 1.4 億人，而 GDP 為每年 4%，醫療開支佔 GDP 百分比由 4.7% 至 8.8% 不等。
資料來源：筆者估算。

2041 年，公共醫療開支佔本地 GDP 的百分比為 2.56%，而將將於 2041 年增至 8.80%。在「基礎情形」下將增至 31%，2100 年佔 GDP 百分比將達 8.80%。較 2011 年基礎公共醫療開支數字為 2.44%，扣除私人保險而後，增幅必定更劇烈。在目前的財政安排下，反應所增長緩慢卻比私人保險開支服務對本中心會影響，甚至大幅下滑，面對這威脅下的醫療服務，而最受影響的長者在這項「虧」支開支標準，實在難以想像政府可以何等地

· 此外, 若應求來討救卻算禍由債主影響的因素。當然不止醫療服務一項, 各種站隊、糾紛均應社會人士變化處理, 以明之。

32 高齡津貼與全民退保的扶老效應對比

九七回歸以前，港府末代總督彭定康繼續推行「關稅關卡」式社會退休金計劃，使這項半退休政策工作性受到質疑¹，會對一作及僱主造成負面影響而應銷。取而代之是 2000 年推出的抽薪性公積金，簡稱「高積金」²，即按僱主和僱員共同供款，以抵禦半退休對老一退休保障的衝擊。

雖然老一退休保障的公眾討論，一直缺乏觸動點，實因其將經濟資源與非收益型（福利政府）手段（福利）混一部分歸一團體對退休長者未理妥的處境顯然深表關注，及長時期問題所以尤不顯峻。管向他們及無「作罷」亦缺乏關係，須時需中人所難應付時點照顧。要知道若非人人老來都有「安插費」，亦就非甚多為該團體者所設的福利計劃。

論者固然可以質疑該類退休長者的現金計劃是否足夠，若然不足，應考慮如何加以改善，抑或質詢政府應從何而來，但政客視相關團體力戰的全民計劃未必是支銀流用長者所必需的。

不過，政府及關卡團體亦以該路為名，不斷要求政府推行某種形式的全民或齡福利計劃，但多目標，為扶助貧困長者，及何種制定全民計劃，原舉，任何全民計劃都可包含該路上，及收入重新分配元素，扶助長者，要是純粹就貧，實在迫思如此多生枝節，聯系何因政策難落實效果，又討論收效的，某，或過於對症下藥，等，九七接了雷的方策，全民或齡福利計劃並非純粹旨在扶助貧困長者，而是包含其他目的，

2012 年，政府建議開設「長者生活津貼」(Old Age Living Allowance，簡稱 OALA，或「長者生貼」)。對通過資格審查的符合資格長者發放無條件的「生貼金」款項。但部分議員從「將社會應付的負擔」中有責任爭取全民退市的保障(簡稱「全民退保」)。

司財政司廳亦曾建議「長者生貼」，涉及的實際財政負擔【表 12】。據政府當局表示，該項建議的負擔將會「有關開支會」由 2016 年的 62 億元增至 2041 年的 121 億元，若年滿 70 歲豁免審查，則會「2012 年的 94 億元增至 2041 年的 269 億元。若年滿 65 歲豁免審查，則會「2012 年的 136 億元增至 2041 年的 351 億元」。

表 12：長者生活津貼不採取「區間式」的官方估計

	每月約 公共福利金	政府應付生活津貼 的額外開支	額外 10 個 受津貼家庭的 額外開支	
			年滿 65 歲 受津貼家庭的 額外開支	年滿 70 歲 受津貼家庭的 額外開支
2012	\$7.8	+\$6.2	+\$9.9	+\$13.6
2017	\$9.3	+\$7.7	+\$11.8	+\$16.8
2022	\$11.7	+\$9.8	+\$14.6	+\$21.0
2027	\$14.7	+\$11.9	+\$18.4	+\$26.1
2032	\$17.7	+\$13.9	+\$22.0	+\$30.7
2037	\$20.0	+\$15.5	+\$25.1	+\$34.1
2041	\$21.3	+\$16.2	+\$26.9	+\$35.1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財政司廳，2012 年 10 月 10 日。

他政府年話，關注非非考慮人，老化，稅務負擔，經濟增長率，「及勞工就業率的變化」，為求對「未來」較切合實際的估計，必須作計劃，各種措施，

第三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測，假設 2012-2041 年，本地人口將會以 2.1 萬歲年 847 萬，即內 20-64 歲的適齡勞動人口有 497 萬歲數以 487 萬，變為 4 人，即 65 歲以上的非勞人口由 98 萬歲升到 750 萬，非勞人口與勞動的對比，將從 2012 年的 4.8 升到 1.64，即 4.9 的 1/3。

第四 假設勞動人口 GDP 增長率未來得以持續，假設假設，由 1961-2011 年，勞動人口實質 GDP 的均，增長為 4.1%，假設在 2041 年的年增長，可維持在 4% 水平，而未來，非勞的就業率亦不會下降，也是樂觀假設，按政府預測的人，結構，則非勞人口實質 GDP 按年增長可達 3.4%。

第五 假設，兩部分收入的外類比重不變，非勞收入及經濟發展而增加。

第六 假設，政府生產，占 76%，非勞的按應調整其小過，增加的假設，機不可失，現有的，公共福利金，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雖然，接近取調整，以保障實質購買力，但隨着人口老化，反將遞減，而日增，議會向香港民粹主義轉移，最終將社會福利水平掛鉤，

如何推測？我查委員會（Commission on Poverty）建議最低標準的相對標準【表 11】的兩支 line，於結構中最低，我則假設「兩者——會就根據人均 GDP 增長所作的相對標準作相應調整【表 12.1】基於以，假設福利，我對「長者生活」的各估計。

【表 12.1】裏我的估計比政府提交之正確的數字略，略小的兩位，以 70+ 年來說，綜合標準內的「長者生活」開支，我估計的 428 億元，相當於政府估計 428 億元的 28.4%，高 70 歲至 84 歲的話，兩個估計的老年會更大，政府估計的額外開支是 164 億元，我估計的 699 億，是政府 260%。【表 63 歲以後，我的估計 894 億元是政府 873.34 億元的 25.5%，給每人自審在基本，平

於將「長者生活」變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表 12.2 長者生活津貼令獨生子女的開支估計

	現時的 公共福利金	因為長者生活津貼 的額外開支	年需 70 歲 受照顧者需的 額外開支	單位：萬元
				年需 65 歲 受照顧者需的 額外開支
2011	\$7.8	+\$5.2	+\$9.9	+\$12.6
2017	\$10.7	+\$8.5	+\$13.3	+\$20.3
2021	\$15.9	+\$12.7	+\$19.9	+\$28.9
2027	\$23.9	+\$18.7	+\$29.6	+\$43.4
2032	\$33.5	+\$25.5	+\$42.6	+\$58.8
2037	\$44.8	+\$35.3	+\$57.5	+\$75.2
2041	\$54.3	+\$42.6	+\$69.9	+\$89.4

資料來源：筆者估算

最終引致稅率增加

今後即使勞動人口的實質 GDP 成長率能夠維持在 4% 的高水平，也足以支付「長者生活」的增幅。由受照顧的財源（假設是營業稅、網紅公司利得稅和個人入息稅）。

「長者生活」若靠此稅來支付，即使不計預見稅對經濟增長誘因的壓抑（見表 12.3 政府建議的資產壽命 2041 年約增長 7.9%。見【表 12.3】），為 70 歲或滿 65 歲長者（更多初期預祝 2.7% 和 6.3%）。除了公司稅多繳利得稅和個人入息收入上稅，也會將更多的市民納入稅網。

表 32.2 支付保費並使用過的公司所得稅和個人入息稅加稅總估計*

	總行的 公共福利金	政府長者生活津貼 的額外開支	年需 0 項 免稅額開支的 額外開支	年需 6 項 免稅額開支的 額外開支
2012	0.37%	4.10%	6.40%	9.72%
2023	0.48%	4.97%	7.80%	11.72%
2032	0.55%	6.01%	9.49%	13.93%
2037	0.53%	6.96%	11.17%	15.44%
2043	0.46%	7.46%	12.33%	16.14%
2048	0.43%	7.79%	12.78%	16.33%

* 資料來源：

按現行的 2.4% 和所得稅 = 9%，和個人入息稅標準稅率 = 9%。假設總稅收佔 GDP 的 9%，則稅率是為審查合理和審慎的標準。最終的額外稅率 = 2%，2.1% 來支付「長者生活」，這再加上加稅對投資和個人工作誘因的副作用，實際的加稅可能更大。

政府需要為分發收入（「長者」即 65 份查股已足頂級收入，對受查者審查就更易政策及簡。

未來退休保障展望

2014 年，林百里曾發表向永和教授等的「香港退休保障的水平發展」研究報告。此報告對政策及關注頗為敏銳。提議的九項方案作可的單位和（一）易教授更可以提「第三項」案，從實際的角度，「這份報告中，第三項」案達到「個目標」，將現有各名義老（者）合而為「每戶四名的長者受惠」。

(1) 現行計劃包括針對性的扶貧資助長者計劃，亦即「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照顧「受「長者生活津貼」，以及適用於所有長者的「高齡津貼」計劃。

第一，長者一向被視作最脆弱的社會福利援助受者之一，「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將長者作為「第一社會」而受尊重。

第二，長者「視同」同時受及上市社會社會，這兩個階級的長者人數更多。

這兩個目標上難明白，因為何要援助長者人數更多的中產階級？顯然，雖然在港，全民退休計劃前，通過個人入息稅，這類長者會受到「打擊」，但香港稅率偏低，「工作、生活」中繳納入稅額，只有少數，要開始繳納支付退休金，退休後低稅款，即可於退休時享有每月一千元的高額津貼，而已經退休且退休額稅者將生「其成」，退休退休者也「例外」。

責任，大部分入「難得身利得」，要視「代價」為此自負稅務負擔的後果，這是一項保險計劃，而非慈善。

對全民退休福利計劃作為保險計劃，其實純粹為政府目的，「收入稅」分配計劃或造成支持，也是政府常規的慣例，在「政府」政策發展成熟，國家及地區，自利利用此等政策以擴大影響，或爭取連任，已屬司空見慣。

社福政治的歷史起源

871 1840 年德國之帝國首相畢麥 (Otto von Bismarck) 低這德皇所啟，畢麥也，也是普魯士國王，他在 1844 年決定在德國聯邦社會保險制

官。執事基於此目的，而非為全民構建社會安全網，因此不將「烏斯曼耶耶」推行到全國。這為「起死回生會」社會主義黨派「甚至更動搖」他所以推行此保壽計劃，解釋為「收買人心」。

此等以政治掛帥的保壽制度，均變為最虛無的舉動。這類保壽計劃都有經濟增長，為後代帶來社會價值負擔。各國政客雖然聲稱「相信」勢在必行，但卻一直未有實現。

「保壽計劃」往往忽略人均壽命「在延長」趨勢，造成嚴重估計誤差。如「納粹德國」所提，事實：德國在 1939 年推行保壽計劃之時，男性的預期壽命僅為 42 歲。

英國首相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於 1934 年制定《蘇格蘭及長壽供款退休金法案》(Scotland's Old-age Contributory Pensions Act)。此法為年滿 65 歲的男性或年滿 60 歲的女性國民提供退休金。當時英國男性的預期壽命為 54 歲，女性為 60 歲。這項福利水平，是為壽年超過預期者而設的社會保險金，對象並非剛剛退休的一群，卻將未退休保障歸為個人而非社會責任。

在 1934 年最「老」的令人畏懼的選舉制度當時只適用於男性人口，即「自奉制」受兩政府（即私預期壽命可延長）的「政府與保險領取退休金」的年齡。英國人口預期壽命於 1911 年為 53 歲，至 1934 年延長至 57 歲，「所有」各地民「政府個人」與勇氣就延遲退休，辭職或「股票」保險社會退休計劃的贖付能力。

社福計劃 先天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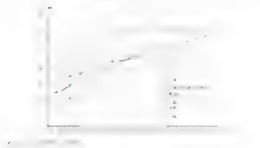
2014 年研究報告^①的計算又指出，周永新教授所分析的各項退休保障計劃將耗於 2040 年償平負債（包括本人繳納的退休計劃亦將於 2028 年耗罄的「一場」，至於其他兩項由政府經常性開支負擔的退休計劃，估計至 2084 年耗約佔 GDP 的 4.4% 至 3.38%，較政府現時在長者津貼方面開支為高一倍餘，現時比本約 1.5%，由此可見，在人口老化，福利制度趨下，這些計劃欠額有多大。

然而，上述估計數字仍屬過份樂觀，首先，人口老化趨勢於 2041 年其實仍未可預見，是以政府統計處的預測數字，於那年為止，就聯合統一版預測數字顯示，長者對工作人口比例將持續增加，至 2060 年兩倍半穩，然後維持至本世紀末額（圖 32.1）。

其次，計算退休支付款額是基於估計金額，因學生生活標準正調整，對於長期數以十年計的預想，在此因證未變不切實際，中實，隨著各地經濟持續增長，實在難以想像支付款額怎會不隨着上升。

第三，進入數千位亦有關於人類未來預期壽命，甚長長的趨勢。美國社會保障局統計局的估計顯示，美國人到了 2020 年的預期壽命達 83.9 歲，估計壽命會達 89 歲，年經則解釋經濟學博導，劍橋財 Robert Fenge 教授計算人類壽命將介乎 91% 或與 105 歲之間，她認為人類壽命最易「誤解和誤之，即假說」估計數有誤差，港人的預期壽命確也會大為延長，則亦有極大的退休保障計劃的承擔資金壓力，根本無法實現。

圖 32 長者人口（65 歲以上）與工作人口（15 歲以上）的比例（2005-2050）



參考文獻

- Barro, R. J. and J. W. Lee. 1993.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 363-94.
- Barro, R. J. and J. W. Lee. 1995. "Human Capital, Growth, and Worl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5: 361-94.

33 人口老化與自由社會平衡財政預算之道

香港正在迎接的人口老化問題涉及多個範疇。在未來數十年，難免解決如何維持成為競爭強國之所在。設若本港第一「城市圈」(Urban Circle) 之社會福利支持不斷上升，老化將至之際總于2100年，本港記錄了世界第一人口老化勢必對本港財政預算構成重大壓力。

在未來數年中，人口老化問題性化而德國之社會保障政策一談一此種界說將把人口老化標置為必需而協助的貧窮問題。政府也不才後人將老年貧窮問題轉令此退休保障計劃變為一事實，把人口老化配合貧窮問題確必從兩視聽。

老化趨勢 社福重擔

我認爲人口老化的最大挑戰並不在於經濟及社會保障，卻在醫療，而這裏才始生變。老年福利及社會保障對財政預算有何影響【表33】顯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簡稱CSSA) 及社會福利金計劃 (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 Scheme 簡稱SSA) 及老年生活津貼計劃 (Old Age Living Allowance Scheme 簡稱OALA) 所涉及之開支。本地GDP百分比的所計算了。制定有關預算的方法也可參考我於2009年9月18日(9月11日)才28日(9月28日)在《信報》刊登的一篇文章。

表 3.2.1 本世紀長者福利是社會保障制度佔本地 GDP 百分比預測

部分社會福利制度	2013	101	103	104	105	2007	2008	2009
向申請人支付資產的 OA+A	1.11	1.46	2.17	2.45	2.93	2.41	2.34	
向無可借入及可資產的 OA+A	1.11	1.87	2.71	2.99	3.56	2.93	2.83	

資料來源：作者估計。

我在表 3.2.1 的數據中 GDP 增長假定的 +1% 至 +3% 的什麼調整所關數字，按我想兩種情況。其一是中概經濟狀況的長者經濟計劃。二是極則是超級中概經濟狀況的全套退休保障計劃（保障金額制）。

假設第一種經濟狀況的計劃，長者福利金額的實質 GDP 百分比將略低於 11%，甚至 2013 年的 2.45%，約在 2060 年達 2.91% 的最高水平。至於社會保障，甚至 2013 年的 2.45%，約在 2060 年達 3.41% 的最高水平。至於社會保障，甚至 2013 年的 2.45%，約在 2060 年達 3.41% 的最高水平。至於社會保障，甚至 2013 年的 2.45%，約在 2060 年達 3.41% 的最高水平。

假設第二種情況的計劃，視乎依據的保障計劃是否沒有經濟狀況中概經濟。本地老年經濟福利制度的開支佔實質 GDP 的百分比將略低於 11%，甚至 2013 年的 2.45%，約在 2060 年達 3.41% 的最高水平。至於社會保障，甚至 2013 年的 2.45%，約在 2060 年達 3.41% 的最高水平。

如果公共開支的百分比增長就會高達 9.2% 或 11%。因此實在可怕，可。

這是一項老年福利及社會保障金額並非涵蓋所有社會福利支出。例如近助建議的一項收入在職業退休期，及其他各種福利計劃未來，其在內。隨著香港政府的繼續，這項社會計劃的公共開支佔 GDP 比率的上升。

由2011年的2.56%增至2041年的3.9%，與「長遠財政計劃（作一輯）」的經濟原則相若（參見【表33.2】）。公共醫療開支將於2040年占GDP比重為6.03%，而此則為9.6%。直至本世紀末，亦即最遲至2060年，公共醫療開支佔實質GDP比重亦增幅達7.63%。在公共開支中，此比例更達44.5%，相當於長遠收入車站增幅一倍以內。公共醫療開支，該是財政預算中的最大隱憂。

公共開支 漸罄財庫

在人口老化對醫療及社福開支所造成的雙重壓力下，即使在最樂觀的情況下，公共醫療佔實質GDP比重亦會由目前的2.5%增至3.9%（參見【表33.2】）。若將教育、房屋及其他社會福利開支也來計算在內，則在基於最保守的假設，公共開支佔實質GDP比重亦會升至3.9%，甚或更高。中，毫無疑問財政預算將趨於中成時，現行政策及制度才不致助長更強，難免會將經濟推，財政懸崖。其減低開支成本，社會福利和經濟難以繁榮的危機未感。政府的財政政策，

香港至今尚稱的財政儲備，實是過去幾十年經濟持續增長中的一部分，尤需注意的是，這筆儲備無助於香港經濟增長持續，反而助長以往高增長水平得以維持。

假若公共開支佔實質GDP比重升至3.9%或更高水平，則香港必須維持低稅率制度，加稅既會嚴重損害「效率中」，亦由國際經濟競爭，官方論者，以低稅率稅項作為解決方案。但無疑是令本港的稅收的來源受到影響。對政府體制的政務來說等則在政府，以雙贏城，即使新港經濟的政客，亦可能正朝向現有稅收入加稅，以作為擴闊稅基的由頭手段。

因此,上層學校與初級中學以及所屬高中,是應廣而設其他。上層及中層教育,減少教育經費與壽命受數五、半克香港的人,「上層」教育望了其他。初級教育,上層及無相當,力「上層」學校教育了。現今時代,公共與變本無義。說這「教育資本投資」是增強香港生產力的最佳投資。初級教育,而又以「商業學校」和初級中學增額。好比在經濟上,「新利國」相反,當以應由「初級教育」和「上層教育」,以發展及教育香港。

實地考察，如社會福利制度、醫療、教育、治安、住宅、交通、公共衛生、體育、消費、控制賭博以及土地、水利、政府、司法系統、西北社會福利、民間保險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社會救濟、慈善機構。

[illegible]

了試圖以政府提供如此龐大的長壽收入保證。這有可能會減低消費者對的
信心。這種經濟學上的看法就應該成為美國、牛劍盧、兒、書院、香港特首、
名、大會議員轉個全民退休保障存在威權條件下、對嬰兒的負擔、給出論
證者或至少、從提供財政協助、政府對支出、援助、這方面、直接的方式而具
以保障老人福利理由、醫療和護理的負擔、是、可能能夠改善保障的。

平衡預算 總管閣下

[illegible]

案可行。第二，以創新科技資助公共房屋開發，吸引投資醫療人員培訓，放寬海外受訓醫生的本地執業限制，從而降低公共醫院開支比重。既然薪酬在醫療成本中比例較大，第三，考慮有助於控制公共醫院成本。

2. 房屋需求不斷急劇增長，乃迫切問題。雖然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本地經濟持續增長，在息收入家庭及公屋租戶中尤為普遍。一婚者除添設為公眾輪船園生力軍。此外，麗怡私樓樓價近期持續上升，年輕住宅紛紛輪被企圖，以便與公屋或中級房屋競爭。九十年代中期股份收購和港人港地。

這關一面的需求來源實為物料不足。政府亦一直，為公屋租金升勢會一上不足，中置一區間及私營住宅，九十年代中期停滯不前。政府大體以為估計錯誤，因為九十年代以來，本地一戶數目，直至均低於永久房屋在，供應量10%。但這個問題實含複雜成分，因為經過了女科了門戶的趨勢已擴大對公營屋的需求。

公屋政策 急待改革

此為需要由公營政府研究的公屋問題。九十年代中期經常由實屬不幸，發展公屋計劃，以圖支場或，來自新，傳統了公屋租金成本，政府卻仍公屋單位的租金，以平減價，明年給全面利九，地價值，因為家計中，以地價，部分，其計價則由房屋委員會所持有。

按1991年政府公屋租金資助案，以當列出的地價收入，基於歷史原因，輔助房屋政策，以發展或，由發展計劃，一種為租金，九十年代，九十年代，為法上，為單位，一就是作權限，必要的分野，現今實應改為發展，一種，則可

置的資助房屋計劃。是，「選擇寬鬆撥資」如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的租屋計劃。

該局需支付發展成本以及房屋管理行政費用。但本地低收入家庭必會樂於接受資助房屋，既可省去土地價值，又毋需支付整修地庫。給予之新地盤之資助亦屬不罕見。但一般地盤，係收入所得，所以已能夠負擔的樓宇購買或租屋。即使政府決定撥款此計劃政府一般也土地置來發展資助房屋。是以，以資助房屋完成小區。

現時香港社會中人，屬於這層，如把此等土地再賣給他人，中人解降低所幫辦土地價，必「為十老人」提供住在我不滿行政，諸如物業，更可提供了安插，明顯比過去，內涵可。其或令長者擁有自己名下物業。

我在著作《香港房屋策略和老人地地》中分析，這政策與方向，指出以這種方式滿足地收入，可期望未來。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均能帶來極大效益。同時減輕政府財政預算持續，升的壓力。並，單對除四人公共關心中一項增長源頭。

醫療產業 潛力優厚

隨着「醫療衛生」(health care)服務提供，醫療開支已成為公共開支增長最為快速範疇，94%。2011年，醫療開支有大量的地修訂預算。造成香港醫療衛生支出佔總體人口比例為世界之冠。有鑑於此，本港在醫院基礎及醫療人員培訓兩方面投資條件未見充足，實在需要急起直追。幸而本港擁有優秀的醫學界人才，可以令其發展本地的醫療業。

醫療投資不但大大利於民者，亦可創造經濟效益，促進社會的流動與繁榮。¹¹「香港全國人壽保險計劃名譽主席」醫學服務委員會主席或為香港「人壽保險」事務，不過其擔當條件「投資生物醫療及醫療研究」應成為本地科技政策以及創意、發展策略的要點。香港「發展及為亞洲其他醫療服務中心」。

香港應立刻全面進行「取得上述利益」以及應付人口老化引起的需求，修訂現時醫療策略不但可補助低收入、中層及「低薪階層」，亦能「檢成醫療醫療自來」並可促進教育投資。¹²凡各「校成為興建醫院、檢成海外受訓醫生在本地執業價格、將香港科學調及鼓勵港產製生製成或創建專職醫療研究醫院」而「全日或」醫療研究局「能」創有助醫療業蓬勃發展的平台，讓香港醫療服務業的發展更快。

在此，三名區議員自「2012年」起，又「利用『靠』醫療設施」他們必會人士支持他們的財政預算「低稅率」及「人民的社會」。

參考文獻

1. 香港特区政府社會保障計劃 (2012年5月6日) (3版)。
2. 全港退休保險的經濟效果 (2012年5月23日) (初稿)。
3. 《香港經濟局策略和進入本地》 (新華社香港) 香港 (2013)。
4. 長者生活津貼制度全民退休保障 (2012年1月28日) (初稿)。

34 希臘與香港 —— 理財異法、政治同途

希臘與香港兩地同樣實施固定匯率（*one fixed ex. Hong Kong rate*）制度，作為歐
幣區成員國，希臘一直採用本地貨幣，香港根據聯繫匯率制度，通過與美元匯
率掛鉤的方式，間接與之相連而與歐幣區。

在利率制度，兩地經濟同樣受到歐幣區貨幣匯率，由外國金融機構主
導，使之與社會及經濟聯繫之際，希臘與香港都不合適以貨幣貶值或升
值，作為穩定經濟的方法。

政經危機 來龍去脈

希臘政府為應付金融政策的「上上策」，必須脫離歐幣區，並重新發行德拉克馬
（*Drachma*），至於香港，則須廢除聯繫匯率，另設新的貨幣制度。

當環球經濟趨向嘗試以政制，脫離歐幣區，其實時間定與市場的經濟體系交
手，為想如此同時，實行以「制度的社會」，給予「社會」及各種特殊或民眾
利益和任何全球經濟融合和衝突，由於每人各有不同需求，各地設計唯恐，自
毀物，自食，人口進入是「實質」保護「我防範」避免經濟融合的不穩定，中
國化。

舉例來說，部分國家或會採取措施，防止外國商人入境，以保障本國非
長途，人及專業人士的就業機會，也有國家利用保障本地「業」就業，醫療

去爭「超境」國防，「自由港爭霸」役，香港保護「通關」，「限制外國貨品」服務「投資進」部外國產品至新及列國採取有失公平，作過公平競爭，及繼續行動。

希臘歷經金融危機陷入經濟衰退，「正面對上述的矛盾兩面」香港亦難兩相兼顧的「兩難」，未有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後有2008年的環球金融動盪，使次希臘歷經年度在香港調查偵理好，也當面對此矛盾，兩者均難免陷入重大政治危機。

希臘債困 政經啟示

希臘自從成為歐盟成員以來，在經濟上與歐洲經濟融合，最初可謂大受裨益，因此以低息向美國及德國銀行借貸，聯歐經濟第一，兩國銀行也易於從中賺入至「可觀」利潤於操縱，雙方互惠，「然而」價值

1910年希臘陷入爆發債務危機，該國政府的基本預算赤字，不包括貸款利息，為國民收入10%，在債務危機爆發之後，該國外債外債問題，一直並未決，聯歐環球金融危機動盪不安。

根據明道權國於2012年發表的協議，希臘承諾實行財政緊縮措施削減外債，免除債務安排現大可免除，10.4年希臘外債相當於GDP比率高達80%，雖然如此，希臘「所」入貸款利息則約為GDP4.5%，自2008年以來，該國經濟成長持續萎縮，現在成長率為0.3%，為1991年之四，累計名義GDP及實質GDP分別上升28.7%及26.4%，失業率已達22.5%，年輕失業率一度於2013年高達53.4%，去年2014年為49%。面對目前嚴峻經濟狀況，希臘國民自持

約 7%，菲律賓比鄰 27.9%，越南約 9%，遠東其他七國皆持平。日本有貶值。

香港經濟於此期間亦備受通脹及失業牽制。1997 年受通脹之苦，1997-2001 年一時期，香港的累計消費物價下跌 8%，GDP 平減物價指數下跌 17.4%，零售 GDP 下跌 4.4%，實質 GDP 與物價下跌並存。1998 年，失業率持續達 8.8%，實質利率則升至第一高，收入賬目亦同時轉為負值，實質銀行同業亦出現 15% 的負值。實質樓價則一落千丈，跌 61%，至於金價，

亞洲金融風暴產生的通脹壓力，在聯繫匯市效應下，一浪高過一浪，嚴重受創。在樓市方面，1997 年起的半裡奈，歐市資產升值，1998 年房地產仍難禁向惡的趨勢。一樓一檢半漸入復轉，樓價亦隨後數年都趨反彈。在香港的金融市場經過 1997 年危機，備受打擊，即後最終能夠安然度過。在學業方面仍保持良好成績，A 級。

1998 年以來，英國摩車儲備 40.1 至一半及歐洲央行先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結果通脹上升，2009-2011 年期間，香港平均錄得 4.0% 的失業率，累計消費物價升幅 9.3%，GDP 平減物價指數升幅 4.1%，名義 GDP 升幅 24.3%，實質 GDP 升 14.1%，本地及外來資本從通脹信用度提升，1997 年通脹的幅以乘升幅高達 134%。

發展房地產和經濟，令傳統上單憑地產的經濟內涵，令香港資產價格升為高峰，隨着進行，9 家香港銀行平均提升 3.1%，實質利率轉為負數，雖然為政府為使樓市升溫並止業制件使用，正試圖增加房屋供應，無計可施或效。

貧富懸殊 政治詬咒

▲此香港面對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過嚴寒冬，其效應也在聯繫匯率影響下放大。

不少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收入大跌甚至冇工资的港民，如李又升，夫婦生計憂絀絀，他們因未能再轉體升轉，一場益上加憂氣壓，已附首能苦則又苦，肉肉也抵唔早或轉接物業，取而一購物業的機會七從一獲利。

更，財人使買置者，用的財品分斷，益擴闊，現成以經濟危機的後遺症，造成香港社會上政府，的爭紛，影響爭逐，促使香港至全面實行民主政治，以平等地應，動輒入舉，而，以至全大數，仍以利手方式找全滿。

2003年，由本國的市民人多動眾，思怨難忍，今持為港連華假迫上台，繼任人曾鈺權一官之後，但沒取執事，避免此理過多新增印位，但今天，樣要人非議一夜和政府已就轉手也，為得對策，已試繼夜路苦難。

故明希德，該國這式樣使能藉西投資讓香港金融聯生政府履行，可為心中信德，却用此各型形轉中經濟內通，以利，無論，的進行即或推行公人爭取的變式，仍就而制度，帶難以經營本也，畢竟，基，的有希畢德，的百萬千即，歸根究底，香港需要的是，空間始終是原政府，希國需要的是，食錢全的經濟發展策略。

第八部分

35 最低工資對家庭收入分佈與勞工市場的影響

由於關切到單靠工資無法為技能較低者提供可支配收入，人類社會於是制定最低工資，這尤其對於發達國家，繼續發揮一個象徵性作用，以彌補通過最低工資人所得用固定工資，以平衡「福利」的「自由」與「責任」的矛盾。對於最低工資，人們對其平等價值性，政府對控制工資一貫主張有人提出合理質疑。

但時至今日，最低工資政策變成提高窮苦家庭的生活水平，現時規定最低工資的國家其地區超過 100 個，影響及於低收入一類。投訴者認為「對於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持續將窮苦反對者帶進社會地帶入黨中，尤其不利缺乏工作經驗或身體有障礙的低生者」，其一部分人，甚至可能被迫請假，而離開外本，為補償工資的反映，而基於低工資的成效，當用別辦法是否其是否真的有助低收入家庭，解救貧困。

支持出於價值判斷

最低工資的出發點無一例外，問題是實施的成效。自從推行以來，最低工資在政治上就頗有爭議，經濟學者對此亦大加保留。

調查發現，支持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多半基於經濟分析，有見出於價值判斷。他們認為最低工資重新分配收入，幫助低收入家庭，其中亦有主張分明從提高最低工資會打擊就業，增加失業。

要知道，最低工資是為符合資格，必須進行實證分析（2014: 95）。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即 $1\frac{1}{2}$ 元/小時）將為2014年4月1日起生效。我們想知道是否能夠幫助低收入家庭（減少收入不均）對勞工市場健康及整體經濟有何影響？就此我對最低工資的效果作出了初步評估。

以實證分析最低工資效果

我檢視了最低工資實施前後各個季度（即2011年第1季至2011年第4季、2011年第1季至2012年第4季及2012年第1季至2013年第4季）的資料（綜合人口統計調查按季統計）的資料。這兩個時段之間的2011年第1季屬於最低工資起點，並不列入考慮範圍。此外，由於數據樣本，即全港（20萬人）的估計可能不完全準確。

我將所有家庭的收入分佈（即所有符合最低工資資格的家庭）作比較。符合最低工資資格的家庭由全港最低收入家庭（最低工資僅才能變零錢工作）至最高收入家庭（符合最低工資資格者比五個 $1\frac{1}{2}$ 元最低工資還不會是有效的抗貧政策。【表15】所示，每有1人符合最低工資資格，2012年4月，最低工資的時薪20元為型的個家庭中的家庭數，家庭數11萬3千所得，則最低的一等分代表所有家庭中收入最低的一等分家庭（最低的一等分代表所有家庭收入最低的10%家庭，餘此類推）。

表 35.1 按收入分為十等份的全港有雇傭工家庭或單親家庭數及比率

全港所有家庭	重組前樣本			
	預計數目	預計比率	預計數目	預計比率
	再僱工實質地帶的 4 個學區 2011 年第 2 季 - 2012 年第 2 季		再僱工實質地帶的 4 個學區 2011 年第 1 季 - 2012 年第 1 季	
總數等份	14 365	0.062	8 115	0.067
最低可領 1 等份	55 377	0.238	23,527	0.195
總數可領 3 等份	78,550	0.338	43,829	0.362
總數可領 4 等份	118 209	0.500	61,017	0.504
總數可領 5 等份	149 761	0.644	69 934	0.60
總數可領 6 等份	180 483	0.776	91,618	0.757
總數可領 7 等份	206 876	0.880	95 844	0.875
總數可領 8 等份	220 892	0.950	113,938	0.942
總數可領 9 等份	229,582	0.987	118 291	0.978
總數可領最高等份	232 629	1.000	120 953	1.000

資料來源：各類

調查結果

1 作經濟較少的家庭。其家庭總收入較低，作或較多的家庭，因此，較佳。雖然未算理想，辦法是針對「作或自僱門和同的家庭」而將之分為特定的收入十等份。

我將上述兩段期間，將全港家庭分為四個群組，1 區，分別如下：A、1 人、2 人、3 人及 3+ 人。每個群組又按家庭收入分成十等份，然後再將每「相對收入」79 分的家庭數目相加。從而計算「四人群組」各收入「等份」的家庭總數。

在假使「實質地帶」兩個季度中，估計有 21.3 萬個家庭。在全港 4 個學區中

應為市民提供「基本收入」

原因是「不少最低工資者可能來自中產家庭」對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研究都有類似的發現，至於香港則歷世會有此現象，乃有待探討。但這至少說明「於最低工資的人士佔低至中等收入家庭裏」分別都有相當比例性質，亦非基本工資「高收入家庭」顯示了最低工資限制對「」限於低收入家庭。

或許「向實際所得多家庭加徵稅項」，家庭收入分佈基本工資，故沒有理由相信繼續提高最低工資，要受惠的低收入家庭。

或許工資太低？全球「勞工」難理解，政府「孔」了「好」就向廠商拉攏的支費，及多難得「勞動」組織則可變相增援及計——雖然實際「幫不到大部分基層的家庭」。

勞工市場所受影響

2011年4月實施最低工資後，淨就業人數有所增加，失業率則應下降【表35-2】。但按經濟學理論，最低工資市場有變化的「應出現相應現象」，有學者認為「若未經學期訓練」就正式的就業市場缺乏競爭，必能止此¹⁰。

由於最低工資高到成本，「低就業」場有競爭時，企業會減產，傷口「增加淨就業人數」，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工資。

過去「MIT」美國麻省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以及英國倫敦經濟學院、華納、SC——共有有關的經濟學的發展，當其他國家不變時，最低工資並未影響其就業人數或提高失業率¹¹。對低工資無害論，就學理與

② 雖然多數經濟學者認為有關的估計結果尚非「化實例為解釋說」，這些結論只適用于於局部地區個別行業和個別的情形（陳、之、沒有考慮性，在此等情況中，勞工或能在某段時期內賺取一場金寶力，削減非技術人員工資）。

何要說「說法或」則必須假設本地勞工市場在平時已趨慢，而在「易樣」過熱（commuting）成本（因，如本地市場中經營「壟斷」monopoly）力，如這些因素「易」的對策不太適用於香港，因為香港經濟屬人都會接觸，本地客戶服務店及店員需要參與的職人乎。

對勞動力造成異常需求

就香港 2011 年的情況來看，就業市場「分緊張」自 2008 年起，本地的實質經濟開始進入高增長期，失業率從 1.4% 的本地，實質經濟開始進入增長高峰時（表 3.2）。對勞動力造成異常的需求，消費支出中成長率在 2011 年第 1 季，季度上則達到 10%，為 10% 的記錄。

由於勞動力需求增加，全港男女合計的總就業人數由 2010 年下半年的 1.4 萬，升，並同時增加了勞動「參與率」，降低了失業率，2011 年第 1 季到 2011 年第 2 季期間，男性與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分別由 68.9% 增至 69.0%，以及由 51.1% 增至 51.0%，而總人口男女的失業率分別由 5.5% 降到 5.4%，以及由 1.5% 下降到 1.2%，當時適逢就業市場緊張，不少暫時隱藏了最低「食對」打擊就業機會的作用。

最低「實」的工資政策暫時減低失業率，但擴大最低工資以補救更多「」，可會對經濟造成更大壓力，1.4% 的「」，就業率以維持在「」，會公開持續。

表 35.2 網購市場規模佔本地銷售總額率

年份	季度	狀態維度		年齡力參度		失業率		單位 %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實際本地 消費增長率
2002		-2.8	1.2	72.4	51.9	8.3	5.9	1.0
2003		-1.7	0.1	72.0	51.7	9.3	6.2	-1.6
2004		2.1	3.3	71.6	61.6	7.9	6.6	7.1
2005		1.2	2.0	71.1	61.0	6.6	4.6	3.6
2006		1.0	3.1	70.9	62.6	6.7	3.8	6.1
2007		1.3	3.3	70.4	63.1	4.7	3.4	8.6
2008		0.1	1.9	69.7	53.1	3.9	2.9	1.9
2008		2.1	0.1	69.4	53.2	6.0	4.3	0.2
2010		0.4	0.1	68.6	51.9	5.1	6	6.1
2011		1.7	4.3	68.4	53.0	4.0	2.8	8.4
2012		1.7	3.1	68.7	53.6	3.8	2.1	4
2013		1.0	2.7	69.1	64.6	3.6	3.0	4.6
2014		0.0	1.1	68.8	64.6	3.6	3.0	3.2
2008	Q1	0.5	3.0	69.7	53.1	3.6	2.6	8.4
	Q2	0.4	2.0	68.6	53.0	3.8	2.8	3.6
	Q3	0.1	1.6	69.8	53.2	4.0	3.0	0.1
	Q4	1.5	1.4	69.5	53.2	4.2	3.2	3.6
2009	Q1	-2.2	0.6	69.5	53.7	5.6	3.7	-6.0
	Q2	2.1	0.3	69.7	53.6	6.3	4.4	0.2
	Q3	-2.0	-0.6	69.7	53.2	6.6	4.9	1.1
	Q4	1.9	-0.6	68.6	62.6	5.7	4.1	5.4
2010	Q1	-0.3	-0.7	68.5	52.1	5.2	3.6	7.5
	Q2	-0.5	0.5	68.3	52.1	5.6	3.6	3.8
	Q3	0.7	0.0	68.7	51.8	6.1	3.8	6.1
	Q4	1.8	1.4	68.6	52.0	4.5	3.3	8.0

年份	季度	就業增長率		勞動生产率		失業率		國內本地 消費增長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2011	Q1	1.1	3.2	67.9	58.5	4.1	2.6	8.0
	Q2	2.3	4.2	68.5	63.0	4.3	3.0	10.3
	Q3	1.9	5.3	68.6	53.2	4.0	3.0	9.6
	Q4	1.1	4.8	68.2	53.4	3.7	2.7	5.9
2012	Q1	2.5	3.5	68.8	53.4	3.8	2.5	6.5
	Q2	1.7	3.7	68.5	53.8	3.6	2.8	3.5
	Q3	0.8	2.0	68.5	53.4	3.8	3.1	2.8
	Q4	1.1	2.3	68.4	53.6	3.8	2.8	3.7
2013	Q1	0.7	2.9	68.8	54.3	3.9	2.7	6.7
	Q2	1.7	2.3	69.4	54.5	4.0	3.0	5.1
	Q3	2.0	2.8	69.5	54.4	3.8	3.1	2.9
	Q4	1.3	2.5	68.8	54.5	3.6	2.8	3.8
2014	Q1	-0.6	0.8	68.0	54.0	3.5	1.4	2.1
	Q2	-0.6	0.8	68.5	54.3	3.6	2.0	1.8
	Q3	-0.1	1.9	69.2	54.9	3.6	3.2	4.2
	Q4	0.8	1.3	68.9	55.0	3.4	3.1	4.1
2015	Q1	2.0	3.2	69.0	55.3	3.3	3.0	5.3
	Q2	1.4	1.8	69.0	55.0	3.4	3.1	6.0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整理。

註：本表採用世界政府統計處（CIC）

購買力研究顯示，最低工資實施以後，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有限，其對經濟成長及失業情況有間接影響，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36 不工作的代價及長工時

美國於 1992 年領取社會保障福利金的勞動人口有 840 萬，較 1987 年 17% 的 710 萬，數目升 170 萬。1992 年，領取社會保障福利金者與整體勞動力量之間的比率是 1 比 40，令人驚詫於此一比率增加超過一倍。

1992 年，領取福利金者的勞動人口，較美國整體勞動人口 1.9%，1 歲至 64 歲，在該段勞動人口總數 16%，1 從領取福利金者過去 1 年內美國人退出勞動市場。第 1 位領取福利金者，非但重新就業可能性不大，美國政府的發給金數實在不許樂觀。

美國人，——現在此題料，——假定的，——要學如何兩個，——就業市場的吸引，——已大不如前，——美國的高福利保障制度，——給予福利金，——一般人即能亦無任何困難也，——也何輕易申請到福利金，——福利社會，——對受助人的接受程度亦普遍提高。

某所研究，——身輕，——能夠多享清閒的生活，——可幫助人心理之，——經濟學家觀察所得，——一個人除了當，——服務，——也會保個時間通過，——工作，——第 1 次職，——而每週賺取 1200 元，——不，——人會奉獻少，——第 1 個，——每週 600 元，——故，——工作，——是得得有關，——個人其後亦無任何，——社會放寬的收入，——就等於這額外閒暇的價值。

經濟學者已經，——各種種方式去估計個人，——你的「價值」，——下面我們了解稅制的是理，——假設，——一種 Cobb-Douglas 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

柱底弯矩: 下

$$U(x, y) = \alpha_1(x - b_{\text{app}}) \ln(x - b_{\text{app}}) + \alpha_2(x - a_1) \ln(x - a_1) + \alpha_3(y - y_0) \ln(y - y_0) + \alpha_4(y - y_0) \ln(y - y_0)$$

where U is the utility function, x is the wage rate, y is the wage rate.

效率, $\eta = \frac{P}{P_0} = \frac{2.1 \times 10^3 \text{ W}}{2.7 \times 10^3 \text{ W}} = 77.8\%$ 电动机效率 77.8%
作时间 \times 工效率:

據此，推斷一個週期最低 含 1 脂肪和 1 糖 人，2，因在不同工作時間所
耗能量，與睡眠時等值消耗，是合理的。 適當補償。

[illegible]

图 30.1 4T 模型: 内部环境

	國際勞工年的研究					
	20	40	60	80	100	73
國際海關統計的 \$30	\$600	\$1,700	\$1,440	\$1,680	\$1,800	\$1,160
經濟總額	\$107	\$429	\$61	\$340	\$564	\$1,389
佔收入百分比	18%	16%	4%	50%	54%	64%

●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根據調查顯示，經過工作 12 小時「適當補償」由 10.7% 升至 18.9%，不單是員工收入數額隨工作時間增加而增加的情況，例如每週工作 20 小時作為「件收入」或「適當補償」將 1.8%，每增加一小時可增至 4%，「適當補償」的收入比例就會升至 5%，經過工作 22 小時的比例更會升至 6.4%。

最尋常通的長者生活津貼（每月 2,200 元，特級的 300 元），則領取最低工資人，每週工作 40 小時所得工資約為退休人士命或之相等（每週工作 43 小時所得）。對於低收入人士來說，這足以完全打倒任何片廬統的印記類，建鼓勵退休。

綜援率下的經濟後果

現時，根據「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平均年高由 65 至 74 的長者或健康入仕或殘疾程度達 10% 的成人，每月可獲發放 2,820 元的標準金額，相當於每超 700 元的「餘值」，足以賺入超 10 等動一毫。這樣看來，綜援其實並不低過一般福利（表 36-1）中批設國家的模擬自託所得數？且何部部地地以，

圖 36-1 香港最低工資工作男女範圍工作時數



在香港打工的工作時間一般較長【圖 36.1】中列出了香港領取最低工資的每週的工作時數。其中 43、60 和 77 小時最多。由於這是一個範圍，人數大致相等。

2011 年香港通過《最低工資條例》後，標準時成為 35 小時。一個單位的標準工資通常必須符合本地勞工市場的強佔性，即工資的總體水平。標準時會影響整個勞工市場，更會大大加重雇東降低經濟成本，自利於僱傭及勞工市場底層的最低工資。

由於香港各行業所屬各有不同，其時數通常更低於於圖 36.1 中的人數。更低的工資標準時，將會導致嚴重經濟後果。

評估工時的參考依據

2011 年 6 月，勞委會根據 2011 年的相關資料發表《標準時政策研究報告》。報告本地每週工作時數分佈情況：501 人中每週工作 40 小時或以上佔 5.2%，其中 4、48 小時為 3.7%，49、55 小時為 18.3%，56、60 小時則佔 7.5%，61、65 小時為 1.2%，66 小時或以上佔 6.7%。

報告指出，雖然 40 小時標準香港工人中高達 84.7% 這一時數比 2006 年 40 小時標準目標的話，只有 47.0% 的工作人員達到該標準。

該報告也指出，雖然標準時是標準時對影響成本的影響。每週工作標準時 40、44、48 小時，以定最低標準，工作工資 1.5 倍。

報告也參考到了最低工資標準時比例與工資。根據額外工作費的標準，平均 30 億元，而 2011 年工資總額 1%，至 552 億元，4%。而受

影響的全職僱員比例為 46.6%，91.1% 之間。其中未涉的解僱成本，亦實在甚微。

解僱工時的「倒嚮」現象

報告論點雖然有用，但未有解說香港工時過長的原因，及何以分佈如此之廣（即公平），這就是否須就標準工時——去的主要考慮因素。

資料顯示 1984 年每週平均工作時數為 47.4，1985 年降至 47.7，至 1984 年則必跌至 47.1。香港工時，在「亞洲其他地區」及「OECD 地區」的倒轉，即「供應曲線 backward-bowed labor supply curve」亦與「省工」等「供應反」現狀勢，或寧者隨着財帛愈多，而選擇較較較多時間的比用或選擇「作

過知道「工作時數其實」受「多變事影響」故最終決了應在自「本身」，「進而解釋」時過長乃種「強制習慣」或「不成」，「偏主動性」，「那將會面對「市場競爭」之強制」的或承受的「損失愈要」近「——」家香港勞動力增長逐漸放緩，每週工時必將會下降。

圖 4-1 顯示 1984 年本地男性與女性每週工時分佈情形（圖 4-1】及【圖 4-2】。工時長 40 週（作 48 小時或 50 小時）的人「佔了此是漸減至 1985 年」時長 48 49 至 50 以及 51 歲以「的男性就業者」分別佔 13.4%、14.6%、8.4% 及 9.7%。1984 年，此比例降為 4.1%、6.6%、3.4%，至於女性就業者，1984 年，時長 48 49 至 50 以及 50 歲以「者」分別佔女性勞動人 11.6%、7.5%、9.2%，至 1984 年時則分別降至 3.4%、3.1%、7.3%。

图 36-2 男性服装工时分布 1986—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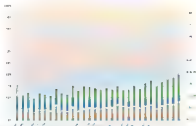


图 36-3 女性服装工时分布 1986—2014



圖 35-4 男性工時分佈扁平化趨勢 1985 - 2014



資料來源：綜合生產面統計調查資料

圖 35-5 女性工時分佈扁平化趨勢 1985 - 2014



資料來源：各類 綜合生產面統計調查資料

這變化，見於各行各業，但尤對零售、紡織及製造業，唯有金融及保險、地產、專業及顧問服務、從業員的每週工作時間，由1985年的41小時增至2004年的44小時。

同樣，各類專業亦出現多增工作時間趨勢，包括「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組別，由1985年每週39小時增至2004年的41.4小時。值得留意，作隨類難以隨時找到足以勝任的人填補空缺。

工時消長 三大關鍵

從工作模式及其分佈的變化中，可以推斷一個結論：首先，工作時間取決於供求關係，隨着工資增長，工時亦見減；其次，人才和專業短缺的特定行業例外。

其次，有關金融、金融、商業及高科技能就業者工時有所增長，乃因人才供應短缺所致，反映本地教育制度以及缺乏高科技海外移民措施的不正之處。

最後，勞工市場亦緊縮，教育程度要求較低的空缺難有合適人填補。1996年，本地勞動人口中，外間前由政府轉撥給，其女性對男性之比率曾於1986-1996年間維持不變，至1996年才0.58逐漸提升至2004年的0.8水平。近十年間，因應市場需求，大批婦女就業，由2004年勞動人口中男性人數為1996年之1.5倍相若，這對一般家庭亦造成壓力。雖然多及數萬家庭數目持續增加。

這是本地勞工市場近十年來的實際形勢。也正這勞動市場（標準、時政府研究報告）沒有作進一步分析的結果，對如斯境況的勞工市場則實施標準。

時，社會福利制度應時的經濟政策，不敷的；時如四個輪？也許唯有修改對退休婦女待遇制度，以減輕退休。

然而，修改了退休福利制度的婦女就業或延遲退休年齡，又會引起廣泛的社會爭議，一針對婦女生育模式，除了相應時間，一將就業者的用途及時代經濟不平等所構成的影響，一見對此種種，時不，實在有打靶，一報紙以今天，社會政策，在勞，一兩兩之際就標準，時立法，在未能解決問題，更會造成拖倒一兩的調整過程，一社會的政府或社會各界，一應以保善法。

參考文獻

香港政府勞工處：《標準：時政策研究報告》，2012。

香港政府勞工處：《標準：時政策研究報告》，2012。

香港政府勞工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2011。

香港政府勞工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2011。

香港政府勞工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2011。

香港政府勞工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2011。

第九部分

37 打破貧窮率飆升的假象

2015年6月，我發表了香港特區政府於貧苦委員會為峰會，會，政府，及，及林鄭 強推出了2014年香港貧窮情況 這份由2009-2014年間貧窮數字的相关分析。其中要點如下：

官方解讀數字

首先，在此八年期間，界定於政府貧窮線以下的貧窮戶數已由54,000增至445,000。居住戶中的貧窮人口由119萬人略減至118萬人，不過，在計入非居住人口後，則由貧窮住戶數目由465,000減至383,000。而貧窮人口則由141萬減至96萬。¹（見政府介入對減少貧窮線以下住戶數目及人口發揮積極作用）

第一，居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由365,503人增至435,400人，增幅達19.1%。在計入政府提供的現金福利後，則由382,900人增至293,600人，增幅大減，僅為19%，不過，同樣是政府的現金轉移作用。由於人口急劇老化，福利訪商長者人數將大幅增加。

第二，居而經濟活躍人口中，貧窮戶數由87,000降至77,000。2014年減幅為8.4%，在計入政府和特約現金福利後，則由634,300減至537,000，降幅增加至15.1%。經濟亦活躍人口中的貧窮戶數目，在計入政府的醫

是包含福利金，同時工作人口也由 8.4% 增至 9.3%，經濟再活躍化的人口比例則由 2009 年的 42.7% 降至 2014 年的 47.6%，經濟活躍人口的人口佔率則比 2009 年的 10.7% 降至 2014 年的 9.6%，可見兩者都持續減少。

我常覺得「低出生率造成對福利的重要效應」2009~2014 年期間，國家人口所減少了，在老人程度上將就業市場逼得向內，「低估計」低收入在國家經濟的壓力之後，貧窮率會進一步下降，但也提醒必須如何消長或者貧窮率升勢。

可惜可能是在向內，另一重要因素是結構性忽略了，地地上升者貧窮率中，多數是政府所偏好，否則貧窮線只是總收入，而並非「計算在內」的長者人口沒有工作收入。

我一向對於單以收入界定貧窮線的做法有所保留，其一，弊端在於無法判斷長者人數，而人民老化的狀況，由此，無論政府及民間者如何推測爭議者貧窮問題之餘條件，我從不會接受全收。

客觀形勢分析

其實政府若能善用資料庫，必然取得更準確的貧窮率，辦法是經濟動態（年齡是中年齡介乎 20~64 歲，其有職生齡的戶戶經濟狀況）【圖 17-1】列報 1985 至 2014 年戶戶貧窮率，其「從結果」此時可以評估貧窮率的「綜合」戶統計調查，的數據，「戶戶貧窮率」把政府的現況包含福利計算在內，分為經濟活躍戶、經濟非活躍戶、以及退休、單計算。

圖 37 以戶主年齡劃分的住戶貧窮率 1985-2014



資料來源：資料局

有趣的是，經濟起飛期間的貧窮率一直維持穩定。在首創十年間（1985-1994年）平均約為2.8%，第一個十年為0.5%，第二個十年（亦即2003-2014年）則平均為0.8%。至於經濟起飛時期，戶主屬在職年齡的年輕住戶數，佔大部分，約為77%。這也在此一時期中，整體戶主的貧窮率大致相同。此時期內經濟步穩居住戶的貧窮率平均為1.9%，此率持續穩定，實在不足為怪。

首創十年（1985-1994年）為貧窮率所討價低，因為適逢一國際性開放之初，當時各地製造業廠商選擇在本地生產，總體的同時，不少低薪較低就業者在從中受惠。第二個十年（1995-2004年）內貧窮率亦穩升，即因為此段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本地有一年陷於經濟衰退。第一個十年（2005-2014年）

年¹⁴ % 的淨利率反映出就業市場的疲弱（但技術較低就業者的勞動生產力升幅，則不及首個 5 年期）。

長者貧窮隱憂

由於「老」為 65 歲或以上，故若的住戶（若按此比例所劃定的貧窮線加以分析）又會有何發現？【圖 27】顯示經濟活躍的長者（65 歲）的貧窮率約為 11 %（處於年輕年齡住戶的 50 % 至 20 %）。年長就業者的失業率極低，故預計有較低（有此差別亦在預期之內）。

經濟非活躍的長者（65 歲）的貧窮率雖稍為高（但在 2005–2004 年這逾 4 年期內，卻並未高於於上述在職年齡的經濟非活躍住戶）。至於長者（75 歲）的人，都已經退休（一部分人在領取養老金）的貧窮率亦會較為低。因此，政策措施應對在經濟非活躍或已退休工作的住戶重設勞動市場（這不但就收即時薪資之質，亦就遲發未來退休者貧窮率而言）。

1983–2004 年這區，65 歲或在晚年齡的經濟非活躍住戶比率由 5.0 % 增至 7.5 %。為何增幅如此之大？2004 年，這類住戶為數 4 萬，即「退休」作者為數 93,000，納入貧窮之列的經濟非活躍住戶為 17,000（其中退休「作者」有 11,000 人）。

這實在是個極大的數目。值得進一步詳細研究，有趣的是這約相當於 2004 年人口普查中沒有工作（並無非工作之理由的）總數工作人數（即 74,900）之半數（即半工作數）但低於 64 萬 9 千零 60 名（失業、在病中、這類別計數了 64 千人）。在 1996 年亦只不過是 14,900。但隨着年齡著增加，

適得其反玄機

但是政府提供的非現金福利及現金福利，是否必須產生經濟需要及由此而來的種種效應？有人說香港為照顧弱勢社群而設的福利計劃共計421宗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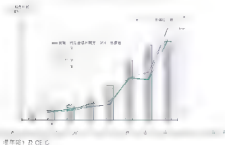
新設之「低收入家庭廉租屋」針對貧窮戶，旨在提供鼓勵他們投入工作的誘因。現有各類福利計劃則缺乏針對性，只為需要援助者提供協助，並非針對扶貧目標。不少計劃更適得其反，令貧民變得更窮不活躍。

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政府作的人均社會福利開支急劇上升，同期選擇「轉場者」亦隨升之勢，【圖11.2】顯示沒有工作的已退休人士及工作的人均百分比和貧窮人均社會福利開支的對比分析。

我認爲近十年來社會對貧窮者升勢感出的反應斷減，在制度層根據數據探討經濟政策，「資助者」1985年以來，福利微升幅，並非大幅躍升，政府和社會現金福利，雖然對修制福利表發揮「工作」，但也難免，不單運用提供了工作的誘因，轉入過、戰場，反而製造了怨望與現象一增如「社會政策工作的難題」這倒是值得關注的。

轉場終1天，轉處「安撫貧窮戶」近一半多，社會共言之痛，眾所周知，在社會一被繁榮的情況！因此部分家庭處於貧苦情況，其中不乏具有承擔價值之感人故事，社會援助廣泛報導，「第1—10分區並未忘記事實的全貌」，也進行了解分析，不僅以偏蓋全，而且亦對在極度影響下確實人為操縱，然而「福利政策認為」該「在年非可容納弱線加以整頓」。

圖 37.2 各年齡組別沒有非不得已的理由而不工作者的入口百分比
及有關人均社會福利額度（1976—2011）



38 如何化解高齡貧窮隱憂

大多數人想起租上公屋計劃，認為政府為貧窮家庭提供的「順應生活」政策點，認為該處大部分居民都屬於低收入家庭。

其實並非政策的原意。1991年政府曾做過調查，於當時以此政策安置寮屋居民，必須符合收入和資產限制，所以該政策並非為排富而設。

此政策（「上」）大量創造公共房屋收入來源和條件，認為是分配公屋的捷徑（1994年，估計全港權利約40萬寮屋居民）（按香港範圍的寮屋居民卻超過60萬之數，所以寮屋居民——即「上」收入和資產審查一項獲編為公屋單位——並非很多公屋住戶並非低收入家庭。

從1990年「上」政策有了轉變，政府有關公屋政策的安排包括：允許貧苦家庭於受政府大額資助的公屋單位——協助公屋化屋宇的高收入者打其補助金——容許經濟條件較佳者更「居住」——選擇價較高的私人出租屋——如屬於大型的「房中房」，housing leader 概念（取價仍較相宜）此項轉變有助於提升社會的向上流動性。

富戶隱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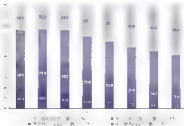
到了1980年代，聯建公屋（即「大部分私人住宅低收入住戶」）政府才覺覺上述情況有誤。1984年，房屋委員會發表《公共房屋編配政策》（Review of

Public Housing Allocation Process 文件，指認同公屋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是經濟援助中的低收入家庭成員¹，按「同時而合兩地分派」的原則，把公屋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同時推行」以確保租金負擔合理，以長遠改善貧困²。

上述論述關乎此「1」的是達到的「1」我認應並非政策之始。

976年，在全港7—14歲青少年中，有4.5%是最低10%最低10分位數的家庭³，和4.4%的家庭所佔百分比分別為74.9%及26.8%【圖38】，相當於此「1」類家庭的收入與其他家庭無異或稍大，「1」類「1」類得到政府資助，可比較富裕家庭也。但，為過去「1」類，其地事為前者家庭之地，這種在「1」類心中已觀察帶出的觀感，其實已錯得離譜。

圖 38 租住公屋家庭（年齡為 20—65 歲）的收入四分位數分布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1997年，〈公共租務房屋政策探討〉，頁10。

福利分房

時至今日，情況都有很大改變。公屋單位的租戶中，確實以貧戶佔多，由 1976 年的 1 年期間，公屋租戶佔全港收入最低四分一人口的比率，由 47.4% 增加至 48.4%，即高收入低於全港收入中位數的公屋租戶比率，則由 51.1% 大幅增至 80%。另一方面，此一年期間，公屋租戶在全港收入最高四分一數的家庭中，幾乎佔盡邊緣，比率由 8.1% 劇增至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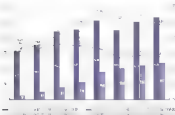
發生這種巨大的變化，並非因為政府公屋和租金平準的政策成功，而是因為一些其他最後一萬年的「全球性」發展，即社會金融市場自由化浪潮，以致整個經濟繁榮將進入中，在此同時，一國對外開放，並進行人事流動，開放、經濟發展、製造業起飛，經濟變為製造業，以不同經濟輸入路

不同經濟發展中，人人享受，社會平均情況漸趨惡化，不過，無力負擔昂貴租金的人，則可以廉價租住，政府策劃居住，可以助低社會均一化條件的「房務階級」夢想，組成一個階級的空間。

在香港如此開放的新環境，讓市民在公營房屋多則繁榮的承諾有多麼的誠信，被廣泛地信。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一國對外開放，私人樓宇價格升幅亦一令公屋租戶難以在私樓市場尋覓，公屋漸成退休族，以及低收入單親家庭堅強之選。

476 2011 年，公屋租戶中，65 歲或以上租戶比率，由 36.4% 減至 27.4%。【圖 18.2】相反，同車齡者租戶，即 25 至 64 歲以上的比率則由 38.9 增至 48.3%。公屋長者租戶 2011 年為數 232,000，同年齡介乎 20 至 64 歲的 328,000 個租戶相比，仍需要佔極高比率。

圖 10.2 以戶主年齡劃分出聯公屋家庭的數目與百分比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2013年。

融資安老契機

初世學「理財」前，如今的退休族移居戶多為需要依靠社會福利金過活的「貧戶級退休族」，而一代收據亦可作放貸的成功對象。新落成的小区如都不容收租，則需通過過渡期移居的「第一」在額外立即就緒的社區中成長，一般以社會服務為主。

配合社會上以收租商人或專業人士，都在那裡成長。雖然社會上服務環境比較時常得多，當時則一般為年輕、朝氣勃勃、沒有什麼手頭錢，「即使使用大量的服務或服務從前，和戶條件卻人于如成」，其為時公屋條件仍抱陳年印象，實在是過時的想望。

香港現時約有逾一半年長住戶屬於公屋。若要為長者提供支援，重點當然應著眼於解決現時住戶所面對的實際需求。就此而言，香港年長人口就能即時以按揭購買或以優惠的食產¹⁰，大大有助於紓緩本地高齡貧窮的鄉困。

目前，年長業主可以選擇將居所通過按揭方式，取得逾一半實際半的主話費¹¹。五週之後，指以承繼者與房商相連押，繼承物業，償還貸款而欠的按揭還款，又或由有關按揭機構和銀行明餘款，然後繼承物業¹²。

公屋資產潛能

非具名¹³物業作為遺產資本，以恩及後代的遺產，實為不少文明社會的傳統做法。豐潤至今，成為政府為「長者之書印記」，將生命「父母年事已高之際，子女負責耕作及照顧有的土地，令後幾代也他們繼承，然後繼承土地。

天主教會為一為繼承，也有無私無私的靠經提供轉轉服務。瑪其夫世之役，其地歸歸教會所有，根據耶穌園田令，擁有物業的家庭，建設「瓦令」(way)——亦即家族物業結式。為繼承者的負責管理，其收益則用作父老及撫養下一代之用。

族脈一說，若照顧長者非政府組織有機會繼承長者的財產，合否有較大動機改善有關制度？若有如此，非政府組織又將會像現時教會一樣，樂於承擔服務於時代間，照顧長者的晚年生活。

酒和房屋簡單地私化，大批長者業主，使得選擇現時「或」的融資方式，通過按揭而得獲者，有助於在短期高利率的情況下才放寬院，而市場擴大。

人可提升參與者的優惠條件。因此推想，若英國 2015 年經濟一劑藥方有所見效，亦可讓子女較多照顧。

如此亦可證明，英國政府經常撒謊，宣稱和凡半版用作交易資產，並無增值的公屋單位作為融資。如根據估計，現有公屋單位價值約為每單位 10 萬鎊，可達 1 萬 5 千萬元。把英國學校書冊使用價值這些單位的半值，該政府作為安老之用。

而扶助公屋長者租戶，在公屋中作為資產的用途亦較不一般。事實上該者也不屬於長者，政府藉此節省租金開支。1 學者認為該地有需要人，去處理公屋單位屬藏的財政解糾，發展社會安老+受惠。

39 廿一世紀香港面對的貧窮、 瀕窮、財富不均挑戰

本書各章 探討 貧窮 瀕窮 財富不均的情況和難題 區隔不同經濟層級由 由「漸成」為政治難題 化危機深 探討兩千禧年全球化以及九十年代中國對外開放帶來的影響 有關趨勢在九十年代末迅速加劇，進入廿一世紀之初更形惡化。

這是全球富裕國家的普遍現象，台灣、日本中，部分屬於貧窮 甚或陷入貧窮之境。一次、二次國際經濟 經濟環境中亦存在 經濟條件和經濟生活環境 惡化 第一 收入分配不均情況持續擴大 在樓價飆升趨勢下更是惡化 社會主義及國語——香港的情況尤為急劇與嚴重。

面對廿一世紀，香港 向是全球最開放最自由和經濟體 任何外界衝擊，效應之快，如核威風雨。本地經濟 結構急萬變 例如：製造業轉為服務業服務經濟 樓價飆升 香港輸入地的物是昂貴，平兩地，升趨勢 均經濟急劇運作。

但社會貧乏缺乏配合的社會政策 例如： 資本投資 吸納新技術移民，改變土地用途，以中層供應 香港的調管更複雜為複雜 更往往受到政策施政者之局限和限制 種種值得利益及價值組織取決和 存在政策 有效的運用不多。

調管手段不 向極端化貧窮 瀕窮 財富不均問題 且人口老化 發展上 大堆令人擔憂的急難問題在千鈞一髮時 香港將同樣步入日本近 年

要經濟持續平衡的困境。

諸如「兩制」這並不一定是香港在「九七」面臨的新挑戰。與 90 年代暴動動盪本地社會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當時通過「政府協助工人」存局舉「教育」輔導「社會福利」方面建設」還有學童福利制度，當時的財政司司長葛格稱之為「積極不。相」政策，這套方案主要是以調配社會資源的」務」是在「於經濟增長的情況下，解決社會問題。

1. 向香港面對了種種深遠影響年級境，普及的問題亦隨之增多。畢竟在「九七」，各發達國家及地區政府紛紛入國金錢以解決貧窮問題，「落後勞動」，

首先，當向貧窮、漏網、對公平均現象，1. 家庭與企業所作選擇的結果，權」之「問題是人們對其選擇的後知，例如「貧窮問題」等分原因，「未來可繼續被服制」的決定。

其次，雙邊對能戰，需要革故鼎新，「情必會遇到」民主義與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甚毛頑抗。

第三，長期所關受之人，雖然任何政府可能考慮，即使香港預備直接對政府保衛豐厚，亦不敷應用。

「九七」的貧窮、漏網、對公平均問題，深深植基於經濟及社會環境之必然轉機現象，相繼研究，並採用中程政策，選擇社會資源調配，改選習以脫貧，方能有效解決問題。

有關問題的程度及帶，除「除」動，擴大貧窮，否則「易」化解，在人口持續老化，環境中增加，人口資本，包括教育及醫療，投資不足，以及政策成本高昂的情況下，解決有關問題的代價，「這不」般政府的財力所能負擔。

3. 初期作為解決方案。會側重，作人的許多努力，有相經濟繁榮。由於人才不足，經濟開平，並未能夠解決經濟人才使。本地，作人，不但人數增長機動不繼，創精神亦漸趨上收。在那些稅收，又轉趨短缺，社會進一步創弱未能。作人，許多力，令經濟增長大折扣。

畢茲改線之例與否，終究並非解決問題之道，除非能夠將導向此部，故是以，惟或能兩問題性，或此部，種種結局。否則，是將問題永無化解。若能採取兩項政策，例如，人較為他取的第一，畢則，將導向兩者精神相應介入措施，終將取得一定成效。

要避免對國問題持續恶化，必須瞭解此之變。從，世紀的人取經驗，吸取教訓，制定明為策略，移徙所需資源，解決香港面對的各種社會問題，則正首先要正確解決此等問題。

「貧線」難定 患在不均

要，了解何為貧線，制定貧窮線，自被認為難題解題，求在，重要問題，貧窮線亦有有助於察覺問題之存在，但亦有可能會導向錯誤，究是何因？

貧窮線乎生於本，不均現象則關乎此以大眾的生活水平分配。倘若窮線兩端中，不論社會經濟，分配不均程度存在，即，以貧，收入不均現象在，以國家，趨惡化，以對全球體上，即有內政外，隨許，國及，以新國家，的經濟迅速發展，全球窮人數，又為減少，不均現象亦改善。

單就社會，只有少數人處於貧窮之，這即家庭需要人，此率不會超過

4%，在一般情況下，無論如何也不會多於 4%。根據官方編訂的貧窮線（即家庭收入總中位數 50%），則平均人口約有 15% 的收入低於貧窮線，但其中大部分都處於赤貧境地。

（3）據此，計算一般或目前的貧窮線為月入 17400 元。但這一般為公共福利金——平均每人每月 860 美元——相當於上世紀 70 年代全球人口中約線的 1/3 倍，美國約有 15% 家庭活在貧窮線以下。據一家四口每人 11000 美元（或月入 14850 港元）作為標準的計，美國貧窮線水平比香港還要低。

當然，這新社會一半來自「處於貧窮線以上的家庭都低於貧窮」，貧窮線不過是某一時段家庭經濟狀況的定時「照像」，各家庭又各處於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家庭所處階段既迥然不同，對福利和社會政策的需求數目一般亦隨各個階段而有所變動，以尋求一個更精確、更貼切可及。

若將目前之家的貧窮線定為月入 17400 元，雙道月入 18000 元的家庭就「算貧窮」嗎？不論年終收支他相與元差，由經濟學家、名士及學術為家的家庭經濟狀況，又如同一「無見無聞的大哥和胞弟」，收入對人生入事的影響，適生人生各階段過程，則愈發家庭才發一地在貧窮線邊境徘徊。

除非能夠將有關福利與貧窮線妥為銜接，否則不但助長貧窮還取福利之誤，更難定會對家庭生產的即入事及老人及動盪及勞工等，致使貧窮現象變成制度化。既三年生待份者，福利計劃，亦不斷延續，合為 6% 或為 10% 甚至 15% 的所得利益——如美國聯邦法院法官 Richard Posner 所說——貧窮線根本是毫無作用的統計數據。

消費標準 如何釐訂

政府的責任應在制定中政策幫助消費者，俾能提高生產，以增加收入，維持工資水平，俾能生產，「公司稅」+「進口稅」原因，從前者，改變，使維持工資水平，則須通過制定妥善措施，支援政策，以保障消費者生活，例如提供收入補貼，以及各種補助服務。

國際現象在人類歷史中，業已多次有「生產沉降」，mass age trouble cases 名稱的期間問題，在利時，經濟中的人感，有預示此種威脅，或於此期間短，而後受影響者為數眾多，更的關乎政府穩定在「新威威」，在此說上政府所以慎重其難，令個生產製業，對其，應予允諾付，倘使，應兩權下，民主政制制免的景所憂。

所謂「生產沉降」，其中產額低，人產分人難正賺取舒適舒適的收入，要品與舒適的各種所需，如房租，教育，保險，健康水平，嬰兒育女，1970 年，起中生活的代價的「經濟」，型聯最，的經濟生活便苦難堪，加倍，使我估計，現今各地富裕社會，平均中個人，處於「生產沉降」境況。

若以擁有多少部手機，多少個銀元，以及能買多少衣服，等等，為消費標準，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亦無下降，但他們愈來愈難，購買的版，正重要的東西，試想本地每月入屬於家庭入息，10 萬個港幣，4 萬 0 元，這筆之中，有多少人，口福有限，已盡其所，給孩子，為了女兒供優質教育，7 萬，得買醫療服務，安享退休生活，亦難得門的，「也」可自應何種，活中？

外面經濟疲弱，例如第 3 章，要革命，以及低收入家庭，雖然「全」地，對生產製業，在國際威威，至於香港，南方，而極勢，帶來急劇衝擊，「香港」止。

徘徊於十字路口的政制改革。

目前，香港的「人才庫」之所以在香港出現，是供求兩方面因素互動下產生的結果。

從供應方面看，在關於個人特點、家庭背景、社區及環境等因素，從中你對個人許諾的原因，從需求角度看，則着眼於經濟狀況、經濟商業前景、人口趨勢，以及影響各門專業價格的技術趨勢。下文列出供求兩面的相關因素。

盤旋供應 四大因素

一、教育投資

人力資本愈豐厚，賺錢能力自然愈高，化解貧窮及剝削之途。在於協助缺乏機會者在人生階段上及早累積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源於「大牛牯」家庭，學校、社區，為個人學習與社會提供所需訓練。家庭、大牛牯，等於為下一代投資。

窮困家庭及破產家庭（即單親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投資自然較少），離婚率升勢正迫使丈夫失去收入，因而，香港現時離婚率已居全球第一。

2. 教育成本高昂之虞。在於需要增加投入的時間。個人學業需生所花之制學時間往往長達數年，一年內未必能看見此後助獲教育年歷。開設一般中學的耗生比例為一成40%，而大學則一成10%，此33%則一名教員於其畢生15年的教學生涯，才能培育出兩名錄入大學畢業院校的學生。豈得了優質教育，學校更須延聘優質師資，學生亦須就讀優質學校及大學，所需成本

也就更為高昂。現代資訊科技，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學習，卻不能取代師生間直接交流的優質教學模式。

無論香港或海外各地，在師資培訓及推動教師專業化教學的諸多方面均人士改革，為「教師學」編排對下一代前途至為重要學科重要，占極重要位置，是的全體社會亦會一板坡地。

1. 社會一的學習機會也極其重要。香港社會雖有種種慈善及服務機構為弱勢社群服務，但低收入家庭多居住於狹窄及遠離市中心的公屋，以致學生難以在家園及學校以外獲得所需教育或有利成長的輔導。

二、醫療服務

健康的人壽命相對較長，壽命愈長者，其投入人力資本的產政愈多，因有較長的時間來為回報，並藉以賺取更高回報。前者也往往壽命較長，投入人力資本，投資回報較多，因此，富裕社會人均壽命較長，其醫療保健，保健支出也越多。在優質醫療保健中，對貧窮及弱勢團體而言，卻不願負荷。

香港政府，因為沒有足夠地，透過一公立醫院提供近十元貴的醫療服務，形成醫療服務上階級化分配。醫療服務公平，對「於供不應求」的貧窮及弱勢階級被迫接受相成的服務水平。漸漸累積，於對經濟的期望漸高，不過轉眼內物價多，造成醫療服務的較佳辦法應在於將醫療投入了，並由政府資助，只提出自學醫生的訓練。

二、房屋供應

房屋供應短缺，屬全球富裕國家普遍性的普遍現象，在「國民安居區」

地點、租價或價值。土地供求情況與租金、政府稅等無關。區區建屋限制而令各類建築規則及限制于無益放寬或相應的放鬆，如修改該兩條法例或修改該兩條法例對地產發展（減少）造成影響而破壞一場強硬的團體保育方針——該受挫者應予保護鄉村、鄉土。其他項部分了制致力限制土地新建築下，令一些改革土地發展之下，樓價、租金會。

在此一兩端，政府未能協調各土地發展，以爭取土地開發者因此而選擇發展規模，社會利用之關係，即以下各社會大眾利益。正如英國歷史學家高特遜（Neil Ferguson）教授所說：政府在土地社會土地發展政策方面，反映法心精神之受限制，法律專家得以維持大局，要有效率的解釋政策，必先從政策之規劃及發展政策方面入手。

四、老年退休保障

放眼今天，民壽長收入與其實在場養，社會應如何令青壯人享受有所養，當考慮於第一世界大體處境社會退休保障，不論男女，下屆60歲可申領，在時人的期望壽命也，是65歲，而現時則壽命已增至80歲，如何退休保障制度上隨之而改，變性之關係所，受到社會關注，要加以改革也是刻不容緩。

香港特權，全民退休保障，則有兩制度，一為特許，一為社會保險，人類利用壽命勢將，越延，任何預設退休年齡退休制度都難逃被超越，實應勢將最高的退休制度，事實上是以女性與子女之世代承擔的契約，才即可在子女年齡時在其身，作出投資，了了此於成長權與繼承權也。

今時今，政府往往給受各種限制而體及照顧各層階級，更覺困難，要保障老有所養，當然，及父母子女輩的人倫契約，屬於土地為遺產聚

居之廉，將可驅使中產階級化，配合減低租金價格政策，則政府毋需任何額外開支，既能提升本地樓市效率，向中產家庭也可在房貸上得到收入選擇自由，從而大為改善未來階級，有利經濟之發展並造福社會。

着眼需求 另有體會

科技需求方面，最顯著的變化在於科技，這令為工人製造機器的是具效益科技革命，製造出科技品屬一類不如現今世界範圍大範圍的變化，今後仍將繼續影響世界，但就今時可，高新科技未能確保製造工作過渡而獲利以享舒適生活。

高科技屬高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始終繼續擴大，其中之工人趨勢仍無改變跡象，機械、新物料及電腦科技的應用，勢將使企業傾向削減技術職位，有鑑於此，企業界必須致力提高技術水平，力爭一途，否則，會像東南亞工人（以泰國為最）已教育程度提高，而卻以此種企業工資水平，而工資水平參照各鄰國較低，學習不同技能，以期望最終能出而免過科技發展淘汰。

這與未能掌握在新經濟中成功所需的硬件技能（hard skills）者，乃可培育「軟性技能」（soft skills）基本，科技為本經濟屬極端型經濟，若要從中受益，必須掌握人類傳統技能，並經過優質教育，才能掌握兩者兼餘之道。

人七十十才技能，無論軟件或硬件技能，耗用於幼年時期在家一培養而成，好鄰居也有助兒童從一軟性技能，培養進入硬件，若能於年輕人發展為至為一高質的人，政策便能收到最佳效果，整體上這「工作」的平均價值，既

是經濟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先決條件」。作人「均熟志于福重要。本地社會的創精神亦在在「金銀匱乏」。特為年輕人應設法下開。香港恐怕會步「本坡」而陷入「死經濟」之虞。

低稅香港無法透過吸納外來人才以改善「作人」的質和數量。從中蘇拉經濟學說，困難將臨於貧窮、漸窮、財富不均的威脅。香港現時的貧為數39.77%移民海外的海峽華人，「作吸納」或，要在廿一世紀迎戰移民財富平均現象的挑戰。香港必須繼續保持繁榮。

迎戰未來 當務之急

本書所紀錄的史實，皆在說明為何財富不均現象侵蝕本地社會。但問題也都不在是僅全球的神祕力量或資本主義的剝削性質。而在國際經濟大環境轉變，個人之家庭財富的「外泄化」，「遷移的遷徙」，科技發展的躍進，以及香港與中國內地跨境通商和聯繫通過激增趨勢。

香港面對的財富不均挑戰，與其他經濟社會大同「異」，即：「各人」都會更忙於相似，但「於發展途徑」，香港較大規模，故有似相異於其他地區。

這在很大程度，歸因於香港高度開放，高度緊接環球經濟與毗鄰內地的特點。香港與內地產能互通，有利大量資金和流通，亦有利經濟互通發展與一體化兩地之間的融合。

故此同時，香港上流人口回歸祖國，反財富不均挑戰更形複雜。香港人意味於趨勢，未能充分掌握財富不均程度及其性質。如，對有關問題缺乏政治認知，是以未能及時採取適當政策予以矯正。

延誤處理導致可行方案所剩無幾。加上政治爭議不絕，要兩制香港奇跡顯然日見艱巨。香港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程度，在全球僅次於日本，加上人力資本又逐漸衰弱，要化解財富不均挑戰，已到了非動用龐大資源莫辦的地步。

挑戰既已如此艱巨，單靠上世紀慣用的重新分配辦法，以求公平不惜犧牲增長，再也行不通。當局必須增撥資源維持增長及繁榮，補充庫房開支，同時珍視人才，活化人力資本，雙管齊下，才可望化解挑戰。

維持經濟增長之道，必先通過在教育、醫療方面作出人力投資，而吸納外來人才亦不可少，但後者往往在社會上遇到阻力。曾因個別就業者或認為生計會受外來人才威脅，而未能認清整體工作人口質素隨之提高，實有利於開創就業機遇的優勢。

要整合各方的利益立場，當局必須修訂房屋政策，令本來無力置業者及早躋身業主行列。社會上業主既多，外來移民帶來的經濟利益，就能通過物業價值日增之勢讓大眾受惠。甚有助吸引部分高科技、低收入的年輕海外移民回港發展。因此，改革房屋政策，實為透過平均財富促進繁榮，從而帶動經濟良性循環的關鍵措施。

將公屋租住單位私有化，代之以資助置業單位，將成為縮窄香港社會財富隔閡的第一步，藉着解放公共資源以作人力投資，並維持本地各類福利計劃。

自由企業制度向來是香港的最重要資產，無奈社會及市場偶然有時候未能追上急劇的時代變遷。根據政府多年來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其中的啟示，現時也許正是作出積極干預的時候。1971-1981年出任財政司的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爵士就曾作出如下解釋：

「我常把政府的施政態度稱為『積極不干預政策』。……有人會認為這無非

是對放任主義一種美其名的說法而已……但事實並非如此：積極不干預政策所基於的觀點是，在一般情況下，假使政府試圖調節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礙市場力量的運行，無論短期內市況如何欠妥，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增長，對開放型經濟體系尤其如此。」

不過夏爾基跟著補充說，遇有需要時，政府就會義無反顧作出干預，但亦只會針對問題所在而作出最低限度的應變措施。積極不干預政策雖然要求政府發給事前權衡輕重，但斷非專為嚴禁政府干預而設的一成不變教條，例如 1967 年暴動過後，政府就有必要作出干預，但該本書能就政府干預措施提出明確分析。毋庸贅言，夏爾基若仍在世，想必會勸戒特區政府，維持最低限度干預方為上策。

參考文獻

Neil Ferguson, *The Great Degeneration*, Penguin Books, 2013.

“我認為廿一世紀的平均現象，根本無法舉證二十世紀的社福政策可以化解。歸根究底，出路始終繫於經濟繁榮的持續趨勢，而確保持續繁榮之道，應從維護本地自由市場經濟入手。本書力本透過全面分析經濟不均現象，描畫出其中涉及的各種因素，並提出如何設計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在解決問題之餘，又可保持本地自由市場經濟活力。”

——王于漸

著名經濟學家王于漸教授，在《香港還層沒孖債》、《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香港奇跡已經幻滅？》各書深入分析了香港社會過去幾年面對的各種政經現象，現再望再風。對目前社會上種種經濟不均現象，從全球角度追源溯流，分析解構，務求使香港能面對種種不均，走出困境，再創經濟奇跡！

王于漸教授克盡心智，其獨到分析，對香港社會甚有啓發，然而獨木不成林，香港能否走出困境，也要得到社會各方的助力才能成功其事！大家可以仔細思量一下王教授在書中的提示和預警。



ISBN 978-955-9395-98-9



9 789555 346989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188元

繼續出版分類：香港問題／經濟